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战略对话

- 3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 / 21 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

俄罗斯与欧亚能源

- 40 久保庭真彰 / 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
92 夏启明 刘贵洲 / 浅析俄罗斯新税制：石油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106 侯敏跃 韩冬涛 /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
125 J·库兹涅尔 / 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

斯拉夫·欧亚

- 154 吕 鹏 / 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177 郭 洁 / 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2 年 2 月 23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年第 1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Центр по изучению России Восточн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в 21 век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Тезисы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российской сек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3)

Масааки Кубонива

Поворотный момент в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болезнь» (40)

Ся Цимин Лю Гуэйчжоу

Анализ новой налог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развитие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92)

Хоу Миньюэ Хань Дунта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анализ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106)

Юлия Кушнир

Нефтяные элит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ую политику (125)

Люй Пэн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ые пу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а» на примере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154)

Го Цз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Польш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20 лет (177)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1 期 (双月刊)

Contents

Center for Russia studies of ECNU & Russian 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Region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utline for Russian-Chinese section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3)

Masaaki Kuboniwa

Turning Point of Russian Economy and “Russian Disease”..... (40)

Xia Qiming, Liu Guizhou

On Russian New Tax System: Crossroads for Evolution of Oil Industry..... (92)

Hou Minyue, Han Dongtao

Comparative Studies on Sino-Russian and Sino-Australian Energy Cooperation:
Analysis of Rationality,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106)

J. Kuszniir

Elites in Energy Sector of Kazakhstan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Energy Policies (125)

Lu Peng

Diverse Paths of “Post-Communism” Studies---Perspective through East Asian Instance (154)

Guo Jie

On Poland Diplomacy Transition since 1989..... (177)

战略对话

【编者按】“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会第二次会议——“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于2011年12月3-4日在上海举行。此会由俄罗斯新闻通讯社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3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中方出席人员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于洪君、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前驻俄陆海空三军武官王海运、中联部六局副局长钱乃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邢广程、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瓦尔代”常务理事冯绍雷等。外方出席人员主要有俄著名智囊机构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卡拉加诺夫（С.А. Караганов）、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С.Г.Лузянин）、俄外交部所属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盟中心主任苏姆斯基（В.В.Сумский）、印度社会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昆都（Nivedita Das Kundu）、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教授岩下明裕（Iwashita Akihiro）、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靖等。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各自准备了讨论提纲。会议以务实和工作性讨论为基本原则，就国际权力转移的新态势、亚太地区一体化、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开发等问题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对话。经授权，本刊现刊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为本次讨论准备的讨论提纲。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03）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

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

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

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

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

【关键词】 亚太格局 亚太安全秩序 中俄亚太合作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
中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22.3(51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2)
01-0003-(37)

共同参与地区的发展与治理： 中俄关系与未来的亚洲地区秩序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中方提纲*

一、导言

1.1 亚太地区正在经历着多层次、多架构、多内涵的一体化进程。国际权力结构和该地区权力结构正在同时发生变动，新的地区秩序在逐渐形成过程之中。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形势也正在经历新的复杂变化，机遇与挑战同步增加。尤其是在安全领域，依然保留着冷战残余，不稳定乃至危险因素甚多，明显滞后于该地区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态势。

1.2 亚太地区是中俄两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的重点地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的形势需要中俄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共担责任。

1.3 中俄在亚太地区应具有双重角色定位：一方面，两国是亚太地区安全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两国是亚太区域合作的推进者和服务者。中俄两

* 本报告由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集体完成，冯绍雷教授牵头，杨成副教授执笔起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所长李凤林大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于洪君、中国前驻俄使馆陆海空军武官王海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新华社世界研究中心盛世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研究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朱显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马嫒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潘兴明教授、王海燕副教授等提交了背景报告或参加了讨论。

国有必要主动提出并推动亚太地区的国际议程设定，担负起“服务型大国”的责任，共同参与地区发展与地区治理，给地区稳定和繁荣带来更多的公共产品。这种议程设定并非仅着眼于两国的国家利益，而是基于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共同协调以实现共同利益。

二、国际权力转移的新态势与亚太地区新秩序的轮廓

2.1 百余年来亚太地区秩序经历了四次转型，分别为一百年多年前的世纪之交经由一系列战争与政治变动建立起的东北亚地区格局，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争霸，冷战后初期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亚太地区的主导，以及新世纪初以来正在形成中的权力多元化格局。目前至今后 10-20 年时间内，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将加快重组，地区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将加速转型。

2.1.1 准确地讲，不是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重心，而是国际权力竞争的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同时，一个全新的国际现象是，国际关系和亚太地区格局日益扁平化，一批新兴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分散权力，这在成为国际和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新特征。

2.1.2 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直线衰落。历史地看，关于美国衰退论的说法每隔 10-15 年就会循环出现。这种论调忽视了美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拥有的智力资源及创新体系和应对危机与挑战的自我调节能力。

2.1.3 两至三个十年之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 and 势力。在未来的亚太地区治理格局中，美国虽不再是享有绝对权威的领导角色，但仍是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

2.1.4 国际权力转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中美日益增加且看似不可避免的对抗性。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变化更大程度上不是中国的成长所导致，而更多是美国自身在新世纪以来因为采取单边主义、致力于推进反恐和防扩散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亚洲事务的忽视。换言之，当前中国在亚洲地区权力结构中影响力的增强不在于中国采取了某种有意识的战略行动，或者中国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而在于美国的举措失当。

2.1.5 美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理反恐战争、防扩散事务以及应对 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对亚洲事务仅仅给予了相对有限的关注。这种局面似乎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中国影响力在亚洲地区单方面地快速攀升。实际上，中国没有尝试过也不会去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谋求取代，而追求一种共存共荣。

2.2 如果当下和未来中美两国不能正确、理性处理双边关系，首先是中国在国际和亚太地区格局中的作用将会受到挑战，同时，美国旨在恢复国内经济及维系在亚洲影响力的努力也会被削弱，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发展与繁荣都会受到影响。

2.2.1 中美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合作的一面。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竞争；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共赢的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较有可能发展成一种竞争性合作关系，在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大背景下，不大可能演变为“非此即彼”的完全敌对关系。

2.2.2 虽然，中美两国间潜在的和现实的抗衡更多是由双方对一些结构性问题的不同认知造成的，短期内尚无妥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相互适应与调整，但是，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度愈来愈高，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集合体。两国可以用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睿智的方式方法化解彼此间的分歧和矛盾，消弭可能由偶然因素引发的危机。

2.2.3 如果不发生重大的意外事件，中国有可能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间之后在经济总量方面接近于美国。在之后的几十年内，中美的经济规模和整体影响力有可能远超其他国家，两国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和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避免两者之间的冲突，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和亚太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样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2.2.4 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讲，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只要美国遏制不了中国的成长，中国没有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野心和能力，这一双边关系格局就可以维持下去。这种关系具有相当的可预见性。

2.2.5 把美国再次加强亚太战略视为其放弃合作、准备应对中国挑战；

或者就此证明这是中国战略意图遇挫，这样的认识与事实相距甚远。其一，亚洲国家不太可能会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其二，美国再次将战略重点投入到亚太只是对其东亚安全主导地位的寻求确认和巩固。美对华“战略围堵”至少已存在 60 余年，但中国成长的步伐并未因此而放缓。第三，中美之间深刻而广泛的经济互利基础，以及多年形成的合作共识，使得中美在利益镶嵌格局的背景下，势必要寻求长期共存，并共同维护亚洲安全繁荣稳定的局面。这不是任何危机形势、或者战略谋划可以取代的。

2.3 目前，亚太地区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开始进入由东亚和东南亚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但仍存在不同模式的制度性竞争。整体而言，亚太地区一体化呈现出不同速率，且覆盖整个地区的一体化议程仍很遥远。

2.3.1 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的亚洲，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即出现过“太平洋共同体”的呼声。1990 年马来西亚首倡“东亚经济集团”（EAEG）。正式成立于 1989 年的 APEC 自冷战结束以来逐步发展，其模式主要是市场引导型区域经济一体化。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基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制度引导型区域一体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2.3.2 当下，亚太地区秩序机制的两重性日益明显。在经济方面，亚太区内生的经济一体化框架逐步发展，但美国试图以 TPP 主导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在安全领域，美国加强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同时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及美竭力推动的新战略伙伴关系形成成员重叠、议题重复的局面。同时，美似要以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以及双边安排作为本地区安全合作的基础框架。

2.3.3 亚太未来地区秩序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的能力和有效性。这些传统和非传统问题主要包括：以朝核、伊朗核问题为代表的防扩散问题；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亚太地区范围内，包括西亚国家在内的体制安全与民族和解；部分“失败”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2.3.4 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未来本质上取决于如何解决一个共同的挑战，

即能否摆脱对西方单一市场的依赖，能否从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出内生的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循环的“协商一致型”亚太发展机制。

三、亚太地区格局中的中国与俄罗斯

3.1 亚洲国家对于中国成长的反应是复杂多样的，且日益呈现出政经二元化的特征，即这些国家积极利用中国稳定而持续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机遇，但同时因为中国成长的速度而感到忧虑，从而在安全上更多地向美国倾斜。这一地区权力分配路径有可能维持相当长时期。

3.1.1 过去 10 多年，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美国与日本、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越南等亚太地区大国和中等国家的军事联系大幅增强。

3.1.2 更关键的是，中国经济的规模总量和开放程度已经使得其国内因素能对全球形成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国际投资和先进科技的吸纳能力及规模、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给亚太地区国家构成了机遇的同时也形成了心理压力。可以预计，中国的发展给全球和亚太地区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冲击会远远大于日本曾经造成的冲击。

3.1.3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快速成长而外溢的经济冲击有可能因中国未来 20 年内国内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国内持续的城市化过程而得到缓解。更深层次上，中国与美国等西方经济大国以及亚太地区国家可以通过共享这一过程，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持续发展过程。这样一种局面的中长期前景很可能不仅单纯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国内体制以及国际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3.1.4 亚太地区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中美可能的冲突中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方。亚洲多年来的区域合作成就，以及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长期合作机制，会大大限制无序竞争带来的祸患。这也会是中美即便有冲突，但也将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的重要原因。

3.1.5 亚太地区的不少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容忍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亚洲保持一定数量的军事存在，也接受其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而亚洲各国

也欢迎中国的经济成长，认同中国新近承担的角色，但不希望被中国所主导，也不希望被日本或印度所主导。中小国家都认为，作为大国谨慎而理性地参与亚洲事务，将会有利于国际平衡和保持稳定，有利于增加活动空间和提供更多战略选择。

3.2 中国的成长及其对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但是，即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在于外交战略的正确选择。而中国外交的核心内容正在于中国国力上升和全方位和谐友好关系的同时推进。这种外交定位的基础首先在于合作。

3.2.1 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只有当中国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提升学习与创新能力，协调好与周边以及大国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在推动区域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同时，确保自身走向进步与繁荣。

3.2.3 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受惠者和推动者，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乐于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成果。短期内这可能使中国的成长速度放缓，但长期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

3.2.4 中国无意建立全球和地区霸权。中国将在借鉴既有国际善治的经验、克服相关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参与合作构建亚太地区新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3.2.5 即便是在久拖不决的领海争端问题上，中国也将始终奉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等国际法规定的基本准则，本着对话、合作的原则，与相关邻国不断增加互信互谅，争取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妥善解决方案。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会在这些争议问题上放弃原则。

3.3 俄罗斯国内事务有望取得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局面，这对其对外战略的发展是一个有力推动和保障。当前的全球权力转移与亚太地区格局的新变化，又是俄内部事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有利条件。因此，近来俄方人士一再表明将以更积极的态度、更大程度地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改变目前在参与亚太事务方面不够活跃和缺乏战略规划的局面，乃是明智之举。

3.3.1 不可否认，俄目前在亚太地区格局中的作用较为有限，与其所拥有的雄厚潜力极不相称。俄对亚太事务的进一步参与，显然将对俄的大国地位有所抬升，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进程中拓展空间有所裨益，而且也将使俄罗斯的“现代化”战略实施获得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3.3.2 在俄经济手段的影响力尚有待拓展的情况下，安全与战略存在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充当俄维系地区影响力的核心工具，但从长远看，必须最大限度地促进俄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

3.3.3 俄罗斯已经证明自身并不缺乏将外交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能力。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将主办 2012 年 APEC 峰会。俄近年来还制定了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应的联邦专项规划。这表明俄罗斯参与亚洲事务的战略意愿已经凸显。

3.3.4 当前关键的障碍因素在于俄相当一部分精英和大众尚未在心理上建立起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太平洋沿岸国家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应的是，俄罗斯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意愿至今尚未成体系地转化为事实上的对亚太地区战略，已有的零碎政策的执行依然有着不少阻力。

3.3.5 尽管俄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强调实施追求东西方平衡的全方位外交，但客观地说，亚太地区或者说东向与西向相比，始终是西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东方从来都是西方因素的配角，是次优选择，是在发展与西方关系难以如愿情况下的一张战略牌。这种局面短期内很难改进。

3.3.6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亚洲问题的内部和外部对话”机制，以推动战略的实施。俄对亚洲的看法与中国或东南亚等国看待亚洲的方式有所不同。对外，俄需要证明，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内，俄需要优化精英和大众的智慧体系，充分认识到俄的未来发展需要真正意义上更为多元、更为平衡的“东向”转变。

四、中俄关系与亚太地区一体化前景

4.1 中俄关系应着眼两国未来中长期的战略需要，适应亚太地区形势变化，以及双方国内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以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和新的路径

将其推动深入发展。

4.1.1 与俄美关系需要“重启”不同，中俄关系更需要的是“加至全速”和“提高质量”。在亚太地区尤其需要进一步“对表”，推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4.1.2 中俄双方都愿意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一起，努力构筑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维护和加强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4.1.3 中国不仅不会阻碍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会积极推动和支持一切俄罗斯旨在维护亚太地区繁荣、稳定和发展的努力。

4.1.4 当下的一个悖论在于，中俄经济合作仍停留在传统思路，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国际潮流尚未能内化到中俄关系中去。一方面，中俄双方都在积极倡导或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两国连彼此之间的“一体化”都成为一个禁忌或敏感词汇，甚至连“自由贸易区”都未提上日程。

4.1.5 可能的努力方向是，中俄将继续把在亚太地区的合作设定为不限于简单双边关系的合作，亦即，在就地区公共事务协调立场的同时，将致力于探索双边关系框架内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作为未来 20 年内的远景目标。

4.1.6 最终目标是建立起中俄“利益和认知共同体”，使得中俄两国的发展内在地相互嵌入，并使其同时和谐地成为亚欧大陆史无前例的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中俄在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同时，主动推动从东亚、东南亚到大中亚、甚至于其影响延伸到欧盟的“大欧亚”合作。

4.2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间合作将是审视中俄关系实现战略升级至“认知与利益共同体”的关键指标。而对俄罗斯东部地区的“重新开发”以及建成为真正有效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可作为最核心的要素。中国方面充分认识到，中俄两国的合作真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恐怕今后也再难遇到、因而绝不容忽视的历史性机遇。

4.2.1 鉴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但其发展日益受到人口减少、人口经济密度较低、基础设施不发达、创新成果应用推广缓慢、当地人对未来发展悲观情绪较重等因素的制约，俄罗斯方面已经非常有远见地表示，大力引进本土及外来投资，发展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及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只有现代化了的东部地区才能成为俄经济新的增长极。

4.2.2 俄可以为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政策引入一种新的有效结合资源潜力、人力资源、生产能力和对新技术积极运用的整合式发展模式，刺激当地经济增长。

4.2.3 俄不必害怕中俄贸易中的不平衡。全世界都在进口中国的机电产品，俄完全不必担心在这一领域落后于中国的现实；当前两国贸易关系和贸易水平符合两国经济情况。只有俄经济获得更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带来贸易额的大幅提升；就目前而言，2010年第一次瓦尔代中俄分组会中，俄方部分学者建议向中国出口粮食、肉类、木材加工品等“水”密集产品，可能是打破当前困境的一条好思路。

4.2.4 中俄毗邻地区合作还应建立起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中方要充分考虑俄的关切，在俄境内开展深加工合作和非战略性资源的广泛合作，加强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中俄边境地区的合作远不止是局限于边境地区，需要集中双方各自的全国规模和层次上的资源与智力加以支持。

4.2.5 上述合作欢迎而且应该有第三方的参与。未来中长期时段内，应努力将中俄双边关系进一步走向“多边化”，尤其是在俄东部开发问题上。中国并不追求“自私”的发展，希望中俄双边的合作同样可以给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带来同样的“红利”，进一步促进“大欧亚”地区合作。事实上，中俄在毗邻地区的合作必然会带来外溢效应，可以作为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新动力，长远看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推手。

4.3 在中部欧亚地区，中俄应更加密切地协调彼此立场，争取形成共生、共处、共赢、共荣的格局，而不是演变为战略竞争。

4.3.1 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建设，也是在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支持之下，中国自然地、也历史性地获得了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俄国内各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在继续充当俄的战略伙伴的同时已成为俄地区利益的竞争者。一言以蔽之，中国发展的态势越来越引起其他国家的忧虑，其中也包括俄罗斯。

4.3.2 作为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俄显然在战略的设计、推进乃至最终实施方面经验丰富。而且，俄善于在劣势中通过灵活的外交实现自己的战略

目标。与美国一样，俄非常擅长运用国际倡议、国际机制的方式影响中长期的大国关系格局，包括对华关系。如何改变上合组织目前的状态，积极发挥其潜在的功能，为成员国和地区发展获得更大机遇，乃是本地区的当务之急。

4.3.3 近年来，俄罗斯一直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未来印度之可能加入又势必导致巴基斯坦提出加入的申请。由此，上海合作组织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在扩员之后的工作效率以及相应的各种问题。中国真诚欢迎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深化、合作扩大、成员增加，同时，也希望成员国和伙伴国家之间通过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进一步加深相互的理解和合作。此外，欧亚联盟的建立，从长期看，有利于提升欧亚地区的一体化水平。但是，中期和近期之内，这一机构将如何影响已经在当地存在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有效合作，这是一个值得双方研究人员共同思考的问题。

4.3.4 在中亚地区，存在着一系列功能相近、地域交错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上合组织，俄罗斯主导的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到新近的欧亚联盟等机构。这些机构相互之间的活动如何相互协调，上合组织如何与之协调。这些问题如不解决，上合组织被日益“虚化”并非毫无可能。

4.3.5 中方注意到俄最近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中俄双方理应在合作与竞争这两个向度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坚信，中俄两国之间不应该也不会互相妨碍，而且，一定会克服各种物质性的以及认知方面的困难，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中俄之间也不值得仅仅为某一方面的局部利益发生不合时宜的竞争，中俄之间有着远为广阔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共同努力去进行合作与开发。也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在合适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平等加入俄方倡导的在该地区的一体化组织。

4.3.6 在这一背景下，中俄关系应表现出双方共同解决亚太，包括中亚地区的中长期问题，以及开诚布公地讨论可能伴随着两国“双崛起”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分歧的政治意愿，亦即，在更宏大的格局和视野中处理两国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域影响和成员国的适当扩大，可能是上海合作组织解决有效工作问题的一条途径。

4.3.7 中亚地区不断增长的潜在不稳定性是中俄两国几乎无法逃避的挑战。在美国和北约撤离阿富汗以及阿富汗明显沦为地区不稳定的源头后，

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明显加剧。但无论是 2014 年前的“过渡时期”，还是其后的“后美国时代”，阿富汗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不是中俄两国所能主导的。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合作重点仍应是提供更多的地区公共产品，真心实意地促进本地区各国在提高人民福祉等领域不断进步。

4.3.8 中俄作为大国，应充分考虑中亚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现实，深入研究中亚国家的需求和利益关切，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伙伴。

4.4 中俄两国有必要主动提出并推动亚太地区的国际议程设定，建设性地介入亚太治理和发展问题。

4.4.1 中俄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安全框架以及经济合作等制度化建设。亚洲现有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架构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中俄双方要连同其他国家使其形成新的网络，并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4.4.2 以 2012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 APEC 峰会为背景，以下议程值得纳入中俄联合倡导的视野：

——以俄罗斯能源资源为基础的亚太地区能源合作体系，包括东北亚三国（中、日、韩）多边油气储备等内容

——亚太地区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亚太地区的金融稳定与合作机制

——亚太地区的生态、环境、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通过俄罗斯国土、连通欧盟和亚太间的大欧亚运输走廊

4.4.3 中俄共同或单独倡导建立新的多边安全和发展对话机制，如“中—俄—美”、“中—俄—日”、“中—俄—欧”、“俄—日—美”等新的多边机制。倡议举行类似于俄罗斯—北约对话机制的“中（俄）—美日同盟”的对话等。中方欢迎俄加入亚欧会议进程，使之在大欧亚一体化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4.4.4 中俄必须意识到，美国式单边主导的地区安全和发展格局将为多边合作共治格局所取代。作为一个远景目标，亚太更需要一个包括中、美、俄和众多亚洲中小国家在内的多边体系，而不仅仅是东盟等次区域合作机制，也非中美 G2 机制，更不是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式的安全同盟。这一体系必须包括政治、经贸、安全和外交等多方面有利于所有成员国的体系。

4.4.5 中俄在亚太区域构建上的合作，操作方式上可以采用先发表政治

声明的方式，同时以一个更加务实的，比如以次区域、小多边的方式，先从专家论坛开始探讨，再到职能部门磋商逐步深入，以先易后难的步骤来推进。具体而言，中俄可共同提出亚太地区安全观，推出亚太地区安全准则，推动解决朝核问题，探讨建立新型亚太地区安全体系，就增进亚太地区安全信任、维护亚太地区稳定采取共同行动等。

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 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

一、序言

1.1. 俄罗斯向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输出是增强国内安定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条件。不完善与亚洲大国（首先就是中国）的经贸和政治

* 本报告的主要作者：С·А·卡拉加诺夫（作者团队负责人，Караганов С.А）、Т·В·博尔达切夫（Бордачев Т.В.）、О·Н·巴拉巴诺夫（Барабанов О.Н.）。本文以一系列研究以及 2011 年 11 月 3 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与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共同开展的形势分析为基础。参加形势分析的人有：负责与亚洲国家关系、亚太地区多边合作问题的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 А·Н·博罗达夫金（Бородавкин А.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 В·Я·别洛克连尼茨基（Белокреницкий В.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朝韩及蒙古处处长、历史学副博士 А·В·沃龙佐夫（Воронцов А.В.）；麦克阿瑟基金会莫斯科分会主席、政治学博士 И·А·泽韦列夫（Зевелев И.А.）；俄罗斯教育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学教研室副教授、历史学副博士 В·А·科尔孙（Корсун В.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历史学博士 С·Г·卢贾宁（Лузянин С.Г.）；《全球政治下的俄罗斯》杂志主编 Ф·А·卢基扬诺夫（Лукьянов Ф.А.）；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世界政治教研室教授、历史学博士 С·И·卢尼奥夫（Лунев С.И.）；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所所长、教授、历史学博士 А·А·马斯洛夫（Маслов А.А.）；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所俄罗斯与世界油气综合体处副处长、经济学副博士 В·А·库拉金（Кулагин В.А.）；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俄新社”国际项目中心政治学博士 В·Е·彼得罗夫斯基（Петровский В.Е.）；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盟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В·В·苏姆斯基（Сумский В.В.）；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及世界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学术助理、外交及国防政策委员会研究项目副主任 Д·В·苏斯洛夫（Суслов Д.В.）；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亚非司司长 С·В·切尔内绍夫（Чернышев С.В.）。

此论题将经过俄罗斯、亚洲、美洲的专家讨论，最终确定并形成报告。该报告将成为 2012 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的讨论基础。此论题的讨论对象包括俄罗斯在亚洲的地位和政策，此处不包括中东，关于中东政治，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某些报告中会予以研究。（详见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东组报告《中东发展：2020 年的轮廓》«Развитие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онтуры 2020» <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22131.html>）

协作，不考虑本地区其他积极参与国的利益，就不可能加强俄罗斯的东向发展——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系列措施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2. 然而，在加强参与亚洲政治经济进程时，俄罗斯不仅可以利用该地区正慢慢显现出来的潜力，同时还必须应对一系列因亚洲在世界上地位提升而出现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对于俄罗斯来说，考虑到其面向欧洲的传统方向和自然方向，这些挑战既具有哲学、文明性质，也具有现实意义，甚至具有潜在的军事政治性质。

1.3. 在实施对亚洲地区国家的战略时，应当发挥核心作用的因素包括：俄罗斯应当在亚太地区付出与传统欧洲方向上规模相当的努力，俄罗斯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国家。设立俄罗斯的“亚洲首都”（在规模和历史意义上接近彼得一世修建圣彼得堡），并将首都的一部分功能从莫斯科移到这里，此举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二、亚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2.1. 在人类历史发展最迅速的这些年，亚太地区处于世界经济力量重新分配的中心，并逐渐成为世界政治力量重新分配的中心。这一进程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受益者，亚洲国家经济同时迅猛发展。

2.2 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提升的基础在于其蒸蒸日上的经济。在 2008—200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只有亚洲国家成功地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成为将世界经济拉出衰退的主要火车头。如果说目前亚洲国家的 GDP 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那么到 2050 年，其份额将超过 50%。

2.2.1 中国的名义 GDP 为 5.88 万亿美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约增长了 29 倍，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 2011 年的预测指出，中国的 GDP 将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印度的 GDP 为 1.73 万亿美元，据世界第十一。日本的名义 GDP 为 5.497 万亿美元——2010 年居世界第三。按照同等购买力 GDP 计算，日本以 4.33 万亿美元占据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福岛二号

核电站的灾难暂时还未反映在经济数据中，但从远景看，将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韩国的 GDP 为 1.42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十二位）。21 世纪伊始，韩国就显示出 GDP 的稳定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4.5%。2009 年，东盟十国的名义 GDP 为 1.5 万亿美元，人均 GDP——2520 美元。同时，印尼从 2000 年起 GDP 年均增速为 5.2%，到 2010 年，GDP 达到 7070 亿美元。马来西亚 GDP 为 2378 亿美元，居世界第四十。

2.2.2 亚洲经济体的增长正在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亚洲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实现各自的经济多样化，以此为更为稳定、更具质量的经济创造基础。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以及内需正快速发展，这从根本上降低着其对国际经济行情的依赖性，首先可以降低来自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动荡的影响。地区大国正在增加对于教育、科学（包括基础科学）以及创新的投入，并对本国的生产和技术基础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2009 年，中国（包括香港）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的 21%，美国以 13.6% 占据第二，之后是德国（7.0%）、俄罗斯（4.2%）和新加坡（4.1%）。

2.3. 这些经济成就成为可能，首先要归功于，东亚和东南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始终一贯地提高国家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并在整体上增强国家实力的地区。吸取西方重要的积极经验并结合本国传统和条件予以实施的亚洲发展道路，被视为目前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竞争最成功的战略示例。同时，这些成就的背景是——在世界政治中，国家治理的经典民主模式，就效率而言，客观上正在退化。

2.3.1. 成功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能力利用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和金融的自由化、不断增长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使老牌大国无法用武力来强制实现自己的利益）。

2.4. 依靠自己的经济成就，亚洲国家，首先是 中国，在根本上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范围。结果将使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加剧。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客观下降将会成为这一冲突的基础。然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受到西方需要“意识形态敌人”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开始出现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非此即彼的对抗性。

2.4.1. 中国的迅速强大，客观上将在其周围形成“安全真空”——邻

国会感觉中国“威胁”到它们。即便，这种威胁在客观和主观上都不存在。这种感觉的产生与其说源于中国的实力或是意图，倒不如说是因为邻国的相对弱小。这种真空将提高南中国海等地区一些未决的小问题的敏感程度。凭着本地区部分国家的认同，一些外部势力（首先是美国）会试图填补真空“对抗中国”。这种对抗会借助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该地区存在着政治军事化和开展局部军备竞赛的危险。

2.4.2. 目前，中美对抗因相互间极高的经济依赖度而得以缓和，任何一方都不希望破坏经贸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是开放的，其演进取决于中美内政发展的诸多因素以及国际环境的发展。俄罗斯可以影响国际环境的发展。然而，在未来，考虑到中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美国，会明显地为在货币金融和经济领域“承诺消灭对方”的局面而苦恼，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将更加残酷。

2.4.3. 况且，未来亚洲各国自身必须解决一系列国内发展问题。在国际计划中，重大的挑战在于——不管是在现有的组织（东盟）框架下，还是在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发展一体化关系的潜力会实际消失。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对于中国不断增强的不信任感，甚至是对于对华关系的恐惧将更为明显。

2.4.4. 中国国内面临的一系列潜在难题包括：使现有的、十分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适应信息公开化的挑战，包括与舆论、信息传递机构的互动；需要面对规模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具有潜在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对其利益和价值观必须予以重视；必须解决社会群体性问题（包括十几人，甚至上百人的事件），以及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问题；由于经济成就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也将是一大挑战。

2.5.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在有条件的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之间出现分裂（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以及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是对于其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更为重要的挑战。在必须保持俄罗斯属于欧洲的共同文明特性并且无法真正理解社会政治组织亚洲模式的情况下，更为积极地理解亚洲国家成功经验的诱惑将在未来确定国家发展模式时带来的客观困难。

2.5.1. 在实际计划中，在保持双边关系持续紧张为主要趋势的情况下，

中美关系发展路线的多样性会导致必须重新审视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并确定地理优先。暂时，亚洲部分不会给自己带来威胁——与过去在西边和现在在南边相比拟的威胁。或者，在俄罗斯精英和公众理解的层面上，不存在需要密切关注的潜在威胁源。尽管对于中国的不可名状的恐惧是强烈的，但是也存在着缓和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恐惧是俄罗斯在亚洲不够强大的结果。而不够强大的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具有积极前景的俄罗斯亚洲战略，特别是关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个地区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俄罗斯正在开展的大型项目之外（冬奥会、北溪和南溪、发展北高加索等）。

2.5.2. 但是，重新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西伯利亚项目”，正如我们所称呼的那样，将成为（我们认为，应该会成为）俄罗斯近二十年的超级大项目。APEC 峰会暂时不会涉及大项目，其重要性在于引起社会和国家对于亚太问题的注意力。俄罗斯领导层的主要战略思想目前主要仍然在欧洲方向上：新的欧洲安全体系，与欧洲（甚至是欧亚联盟）建立统一的经济、能源和人类空间。

2.5.3. 然而，未来，东部方向将不再是“大后方”。俄罗斯必须寻找对于现实挑战的应对之策。这样的挑战包括：中美开始有限度的军备竞赛，其竞赛的中心在于海军力量；从远景看，华盛顿将在中国方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反导系统；朝鲜问题尖锐化。在朝鲜核问题、中国崛起、东亚政治可能军事化的背景下，日本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相对较弱，会使日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10 年），把从“核门槛”国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过渡到核国家（实际拥有核武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消除部分威胁将成为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合作的对象。然而，无论如何，莫斯科将不可避免地需要自己应对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挑战。

2.5.4. 现在，俄罗斯发挥着亚洲军事战略局势发展的关键作用。俄美的核均衡排除了世界大战（包括亚洲大战）的可能，仍旧在战略上“掩护”着中国的经济飞跃。同时，在亚太地区，俄罗斯目前无法在中国与美国（西方）之间充当平衡器的角色。如果让双方一对一，将无法稳定地区安全局势。未来，俄罗斯成为亚太地区的真正玩家，不仅首先受制于军事战略潜力，还受制于均衡本国东西方向上发展和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2.6. 目前，虽然俄罗斯具备成为真正的亚太国家的所有先决条件，但还未制定出实现这一任务所必需的一整套战略。尽管最近这些年俄罗斯对于参与亚太地区政治日趋积极，但该地区对于俄罗斯而言仍属于战术性及半边缘化的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俄罗斯仍然生活在 20 世纪（如果不是 19 世纪的话）的“欧洲中心”体系中，尽管世界力量均衡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俄罗斯仍将是一个拥有大片亚洲领土的欧洲国家。在实施亚太政策时，俄罗斯面临着各种关于地缘政治思想的限制。

2.6.1. 俄罗斯与亚太大国经贸关系质量低是间接后果。尽管从 1990 年起，中俄贸易额增长了 8.5 倍，达到了 590 亿美元。中国在俄罗斯外贸中的份额稳定增长（从 1990 年的 4.8% 增长到 2010 年的 9.5%），俄罗斯在中国外贸中的份额在这期间减少了 1/3（从 3.5% 减少到 1.9%）。双边贸易在 2006 年之前一直为顺差，之后转为逆差，且差额迅速扩大：2007 年，逆差为 90 亿美元，而 2010 年已经达到 190 亿美元。

2.6.2. 在俄罗斯的对华出口中，占据主导的是“矿物产品”（主要是原油和石油产品）、原木和少量的化工产品、金属及金属制品。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有：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纺织品、鞋子；金属和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在中国进口的工业产品中，从俄罗斯进口的比例的变化十分明显，1997 年占 30%，2007 年——不到 3%。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原料”性质。

2.6.3. 相互投资水平低是巨大的阻碍，这决定了伙伴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据专家估计，中俄相互投资总量只相当于中美相互投资总量的 1/1400，根据各种估算，中俄相互投资总量不足 30 亿美元，这大大低于俄罗斯与一些欧盟小国间的相互投资总量。经贸关系出现在国家层面，而且在这些经贸关系中私企、特别是中型企业的数量很少。中俄企业在对方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的实践十分罕见。

2.7. 必须明白，俄罗斯“迅速拉升”为地区经济和国际政治增长火车头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所有亚太国家都对加强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以及经济存在感兴趣，以至于人为地把俄罗斯“拽”进亚洲。俄罗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国家，首先要依靠自身，而在这一地区，俄罗斯现有问题的原

因也主要在于自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亚洲国家，经济体的发展成了全球政治地位提升的基础，对于俄罗斯来说，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发展应当是亚洲政策的核心。自然，没有必要用言语回顾过去发展该地区的尝试（19 世纪末以及 20 世纪中叶）。新战略应当依赖并考虑对于俄罗斯敞开的机遇——过去 25—30 年东亚和东南亚的爆炸式发展，以及有前景的机会。

2.8. 缺乏使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迈上新台阶的积极政策、信息闭塞以及俄罗斯在亚洲中不够积极（正开始积极起来），加上地区人口持续流失的背景，使得国际和俄罗斯国内都感觉到了俄罗斯的脆弱，并严重地削弱着俄罗斯的世界地缘政治地位。主导的观念是由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弱势，使其无处可去，只能与西方更亲近，而西方对于俄罗斯，目前尚不准备、也不能给俄罗斯任何东西，而且不愿意给。

2.9. 从根本上使俄罗斯的亚洲政策积极起来受到已知因素的限制。很明显，长期看，俄罗斯可能亲近欧洲。首先，由于欧盟所陷入的系统性危机。显然在近些年欧盟无力回应有利于自己的建议。（建立包括俄罗斯、欧盟、其他欧盟邻国在内的统一的经济、能源、人类空间典范——欧洲联盟，瓦尔代俱乐部的一篇报告提出了这一观点）^①。自然，俄罗斯的这些方案仍然停留在桌面上。我们希望，在寻找走出现有危机的出路时，欧洲人会关注这些方案。俄罗斯朝向欧洲的文化社会定位不能、也没有必要重新审视。俄罗斯亚太政策积极化以及部分调整经济关系定位并不是替换俄罗斯的朝向欧洲的定位，而是俄罗斯适应现在和未来世界状况的现代化之举。

2.9.1. 从占据外部市场和获取发展资源的角度看，“大中东”和北非前景黯淡，“阿拉伯之春”动乱的结果将在客观上拖累俄罗斯，除了单纯的外交利益外，毫无益处。

2.9.2. 传统上作为俄罗斯增长和现代化之源的西方将停滞不前（但仍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伙伴），南方也将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客观的战略角度，还是从主观的战术角度看，东方应当成为近些年俄罗斯最重要的政策方向。

^① Пугин В.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3 октября 2011; «К Союзу Европы»---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уппы Валдайского клуба, <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22128.html>

2.10. 从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的角度看，从根本上积极推进其亚洲政策十分迫切。最有前景的市场正是在亚洲。从安全角度看，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欠发达、人口持续流失将有悖国际玩家的意愿，不可避免地让人感觉该地区的脆弱和安全真空，并将加剧对于该地区资源的争夺——这会削弱整个国家的事实主权。

2.11.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俄罗斯必须转向亚洲，重新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目前，经过了革命的十年和恢复国家治理及国际地位的十年之后，俄罗斯正走向发展停滞。这种停滞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逐步衰退、社会不满加剧。通过发展现代社会机构、赋予其大型发展项目特别的年轻成分，是摆脱这条道路的途径之一^①。斯克尔科沃或是索契显然未被拉入这一层级。欧亚联盟是更为强大的想法。但是它对社会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年轻阶层的吸引力并不大，因为这个想法主要还是要新的基础上恢复部分过去的联盟，而不是建立全新的联盟。在思想理念上，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2.12. 所以，我们认为，俄罗斯政策根本上转向亚洲正在渐渐成熟。这种转向应当包括地理战略转向（参见第三章）、主要是经济转向（参见第四章）、甚至为了推动和巩固这些转向要进行象征性的纬度转向（将部分首都的功能转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参见第五章））。

三、俄罗斯在亚洲的新日程

3.1. 上述俄罗斯根本性的、（当然是）逐步的、在五年中转向新亚洲应当包括下列相互关联的方面：

- 加强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外交积极性、制定统一发展战略——包括新的俄亚政策、努力建立欧亚联盟、建立统一的欧洲经济能源和人类空间的思想。

- 形成重新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战略并付诸实施（《西伯利亚项目》）。

^① 关于俄罗斯发展的“最佳”道路，可参见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报告，《Россия: не упустить удачу.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35120.html>

● 为了这一有益的重新定位以及必要项目的成功，甚至可以将首都或是首都的部分功能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一个或几个城市。

3.2. 俄罗斯新的亚洲政策应当包括欧洲、美洲和欧亚方向，但其功能与过去不同。

3.3. 在外交方面，首先要努力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的地区机制。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法律体系，已经不可能包容一个拥有如此强大经济实力和规模的中国。必须建立旨在解决主要问题的新的地区机制——即解决中美关系中对抗加剧的问题。为此，在筹备 2012 符拉迪沃斯托克 APEC 峰会时，研究建立常设的跨国协商机制“亚洲的赫尔辛基进程”，并在更小的框架下建立中俄美三边机制。这将提高相互间决议信息交换的程度，其中包括军事政治领域。未来，可能推动建立特别国际机制——《太平洋安全和发展公约》。

3.4. 对于东盟国家和本地区的其他中小型国家，必须建立安全和主权的保障体系。况且，对于俄罗斯，东盟国家是重要的潜在伙伴，它们有着与俄罗斯相似的忧虑。这些国家作为完整的国际玩家的潜力已经消失，他们未来会受到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挤压”。鉴于此，俄罗斯可以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其存在对于所有东盟国家都是有利的。这种相互接近的基础在于相互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准备俄罗斯—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将为此创造条件。

3.5. 信息政策和提高相互间的认识水平是中俄关系、中俄美“三巨头”框架下合作（有地区其他国家的参与）的核心之一。为此，必须发展旨在提高经济、文化和社会认识水平的项目、加强高校合作。必须制定旨在加强中俄大学生和教师互换的大型项目、吸引美国等亚太国家参与其中。可能研究设立中俄美顶尖高校参与的“三方文凭”项目的问题。

3.6.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提出的建立欧亚联盟的思想，显然意味着一体化思想至少是最近十年的重点国家项目。为此，出现了在与中国等国合作中必须解决的两个挑战。

3.6.1. 首先，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在中亚地区政策上进行合作，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目前，俄罗斯并没有严重妨碍中国在中亚的项目，而中国阻碍着俄罗斯。欧亚联盟的建立将在更大程度上使经济发展方向朝向俄

罗斯，这将导致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受到限制。在各种不利情况交集之下，欧亚联盟的中亚方面将会成为如今近乎完美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

3.6.2. 其次，动荡的南方的挑战更为严峻。在南方，阿富汗是主要的威胁，2014年后，其政权可能重归塔利班（或其他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这将导致动荡向前苏联中亚地区扩散，并重蹈伊斯兰主义为源头的20世纪90年代的覆辙，引起费尔干纳山谷、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整个塔吉克斯坦的不稳定，使俄罗斯出现真正的军事和恐怖主义威胁。

3.7. 来自南部地区的威胁将重新把真正划定边界的问题提上日程。有三条重要的边界。第一条——划定俄罗斯本国的南部边境线，但在欧亚联盟内，这一举措是多余的，会引起哈萨克斯坦的信任危机。第二条——划定前苏联的南部边界。但这将使俄罗斯面临毫无缓冲地带直面塔利班的危险，另外，塔吉克斯坦在90年代保护边界的经验显示了其效果不佳，而且社会成本极高。第三条——划定哈萨克斯坦的南部边界，这将促进一体化的加深以及欧亚联盟的完整性。这是最佳方案。还有一个论据支持这一点：塔吉克斯坦的毒品扩散源头将被拦在边界之外。

3.8.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向吉尔吉斯斯坦负责的问题。传统上，吉尔吉斯斯坦在围绕俄罗斯的一体化组织中总是重要成员，现在它是中亚地区加入欧亚联盟的天然候选者。如果吉尔吉斯斯坦成为边界，就是说，成为欧亚联盟的边界，那么在欧亚联盟内不太可能建立强有力的边界。还有一个问题——心理上对过去的留恋，表现为中亚所有的前苏联空间都想加入欧亚联盟。在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划定边界将与这种逻辑相抵触。

3.9. 然而，对于过去的留恋不能妨碍合理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要求俄罗斯重新严肃地评价自己的历史。其中，明白沙皇在中亚的错误——对抗英国征服中亚。中亚和俄罗斯在一起的时间不到百年——这在历史中十分短暂，而且在这段时间，这是一个需要补贴的地区。除了支出和问题，俄罗斯什么都没有得到。

3.10. 况且，在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中亚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出现了大

规模的、可能是难以恢复的衰退。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联盟的一体化方针将意味着把俄罗斯的资源引入这一地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这将增加俄罗斯金融体系的负担。因此这将使一体化方案在俄罗斯社会不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在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划定边界也可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

3.11. 衰退的挑战已经出现，中亚人口流出的挑战也已出现（俄罗斯正面临着这一挑战）。在必须吸引劳动力前往俄罗斯的情况下，其社会后果正导致社会失衡。重要的是，一体化的加强没有导致进一步的失衡。要知道，现在反对欧亚联盟的重要舆论依据正是对于移民的恐惧。克服这一恐惧应当是各国共同的任务。各国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中亚地区扶持大规模的俄语学校网络，以便流入俄罗斯的移民会说俄语。

3.12. 自然，将边界严格划定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放弃其他后苏联国家。安全保障将保留，合作将持续，但是会以更为柔和的形式。为此，必须调整中俄合作，在前苏联中亚地区维持稳定。在这地区抑制其余竞争。俄罗斯有军事和政治资产，中国有经济资产，双方应当共同合作利用这些资产。现在，应当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急剧扩大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显然没有被充分利用，不管与今天的需求和挑战相比，还是与未来的需求与挑战相比都是不相称的。

3.13. 在大中亚地区（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涉及集体安全组织条约和欧亚联盟的俄罗斯、中国）维持稳定时，应当尽可能吸收其他伙伴。首先就是美国和印度。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计划中，吸引美国等亚太国家参与。中俄合作应当建立在共同解决全球性地区稳定和挑战问题的基础上。为了不使这些领域（保证世界各国的资源）的关系军事化，必须现在就制定共同措施缓解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缓解粮食和水资源短缺，必须制定共同战略和可以实现共赢的项目。

四、“西伯利亚项目”——俄罗斯亚洲战略的基础

4.1 西伯利亚、后贝加尔以及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具有虽非决定性的、但却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因为西伯利亚才能成为全

球性的强国，并在世界背景下得以客观地依靠地缘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仅作为一个欧洲大国，一味地扩大“面向欧洲之窗”，以及在欧洲（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强国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4.2 17至18世纪俄罗斯人开始在西伯利亚的定居，那群所谓的西伯利亚开发者形成了特定的西伯利亚社会文化群体。发展环境的极大自由、没有当时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普遍实行的农奴制对人身的控制，再加上当时极其困难的自然环境，一同淬炼了西伯利亚人的性格：无私工作、不惧艰辛，不奢望从外部获得帮助，而是力求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些性格以及他们完整的自然性、丰富的精神，在俄罗斯被看作是一种传奇。得益于西伯利亚人的这些品质，使得现今的俄罗斯民族更加地丰富。

4.2.1 第二次俄罗斯西伯利亚移民潮是受了20世纪初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的影响。此次迁移给西伯利亚带来了人口的剧增并使得俄罗斯其他地方对西伯利亚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在民族间以及团体中建立的联系使得西伯利亚人开始同俄罗斯欧洲部分交往起来。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可以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以及西伯利亚历史上最繁荣的一段时期之一。在苏联时代，西伯利亚成为苏维埃最重要的资源潜力和人力潜力。20世纪三十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化，以在西西伯利亚建立新库兹涅茨克以及远东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为标志，强有力地影响了俄罗斯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发展。在1941年的11、12月份，西伯利亚师还拯救了莫斯科。

4.2.2 但西伯利亚的浪漫经常伴随着悲剧。该地区在沙皇时代是政治犯的囚禁地以及流放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使得俄罗斯整代军事和知识精英多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处于劳改营管理总局和远东地区劳改营监控下的囚犯营地网让西伯利亚和远东成为全俄的悲惨之地。诸如瓦尼诺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沿线、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监狱、马加丹以及科累马等地成了苏联时代残酷的代名词。

4.3 尽管最初地区内以农村为主，但在二十世纪，西伯利亚、后贝加尔以及远东的发展首先是集中在大型城市。比如在西伯利亚第一次开垦时的哥萨克农奴时代形成的老城：秋明、托博尔斯克、奥姆斯科、托木斯克、巴尔瑙尔、比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米努辛斯克、伊尔库兹

克、赤塔、雅库茨克，还有 19 世纪下半叶边疆开垦时代的远东的一些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后来出现的苏联工业中心——新西伯利亚、新库兹涅茨克、诺里尔斯克、布拉茨克、萨亚诺格尔斯克、阿穆尔共青城、腾达、苏尔古特、下瓦尔塔以及秋明北部的一系列石油天然气城市。

4.3.1 于是，西伯利亚和远东成了拥有大城市的文明社会，这带来了高度专业水平的人力资源以及西伯利亚人民教育与文化的普及。秋明大学早在十月革命前就被称为“西伯利亚的雅典”，而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在苏联时期成为先进的科学创新中心之一。所有这一切使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和远东成为拥有足够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及社会经济保障设施的地区，而这无疑也大力推动了俄罗斯投资战略并有助于西伯利亚融入全球背景下的亚太地区。

4.4 在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后贝加尔以及远东，事实上如同封闭区域发展着，这其中包括他们对外经济联系水平降低。“封闭的大后方”在官方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规划中占统治支配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此有很大影响。当时苏联欧洲中心地区被占领，在国家纵深部的西伯利亚大后方成为对前线工业和农业支持的主要资源。这之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发展了“封闭的大后方”的意识，该地区被视为在未来战争中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资源。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与中国的对峙，导致了跨境经济联系、社会联系的终止以及边境线全面的封闭。

4.5 必须承认，虽然现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并高度开放，但俄罗斯大众，以及部分精英仍然持有旧的观念，将远东视为“前沿堡垒”，将西伯利亚看作为“大后方”。由此制定出的是该地区封闭式独立发展的方针，最重要的是，这一方针对亚太地区伙伴国处处提防。目前，这一方针主要体现在俄罗斯关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目前的联邦专项发展规划中。

4.6 这一方针的结果却让人失望。最近一次俄罗斯人口普查的数据就是这里最戏剧性的回答。它显示了有成千上万的人口不断地从西伯利亚和远东流向俄罗斯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在苏联解体后的 20 年的发展里，没有看到该方针和总体规划所带来的任何实质性好处，因此他们离开了。人口流失成为这些地区的现实问题。而首先离开的是最专业和最有工作经验的人们。于是，人口的减少导致留下来的人口社会水准降低，使得该地区在

现有方针之下的发展前景岌岌可危，也让所有的发展项目无法实施。

4.7 面对社会退化的唯一可选方针就是实行地区“开放”，加速其发展，并不断扩大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这里我们不应只讨论扩大西伯利亚和远东在外部市场上的原料出口量。亚洲市场是俄罗斯出口能源的优先方向，但该市场的发展总是受限于潜在客户国不高的购买力，并且常常有个别国家多次降低价格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讨论如何在这些地区吸引外资，创造性地发展高科技开采和加工产业。

4.7.1 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急速发展，为俄罗斯得以利用自身竞争优势创造了新的机会。环境和资源问题，例如森林的砍伐，土壤的侵蚀，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枯竭以及对于东亚地区最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亚洲国家对食品和生活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单凭借其自身生产能力无法满足这些需求。

4.7.2 东亚地区国家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谷物和肉类的的需求不断增大，这是由于当地生活水平提高并且人们开始由传统的面食转向蛋白质食物（从 1990 年到 2007 年东亚国家的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 125%）。同时增长的还有对于其他物品的需求，比如，中国人均对纸的需求在过去 20 年内增长了 4.5 倍。亚洲国家被迫逐步从自产自足过渡到进口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往往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然而，资源耗尽所产生的问题或多或少让世界许多国家向东亚国家出口的能力逐年受限。

4.7.3 俄罗斯拥有广袤的农耕型土地（占世界耕地 9%）以及庞大淡水储存量（占世界水资源的 20%），并且在这些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未被商业化。这就使得俄罗斯在上述领域中有极大的竞争优势。俄罗斯的庞大储备，既是为了扩大耕地（至少一千万公顷），也是为了提高谷物庄稼地的产量（谷物收成量可能至少提高 1.5 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俄罗斯那样拥有如此有潜力的增长量。而气候环境的变化，本身也使得俄罗斯有机会扩大现有的基础农作物的生产区，发展新的生产区以及采用更需要温度更高产的品种来提高总收成量。

4.7.4 俄罗斯的森林资源储存量（占世界储存量 23%）和森林覆盖面积（占世界森林面积 25%）占世界第一。现今的俄罗斯只出口原木或是低质量

的木材加工品（比如报纸纸张）。丰富的森林资源可以让俄罗斯迎合亚洲地区的需要而增加高品质木材加工品以及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生产（比如，高品质的纸张）。这些产品应该取代木材出口，木材出口从经济和生态角度来看都是低效的。

4.8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进程开始在国家层面上获得体现。比如，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签署了发展两国边境地区的项目合作纲要。但这一纲要仍然处于初始阶段。此外，这一合作纲要与目前的远东发展联邦专项项目是相抵触的。因此，在签署合作纲要后已经过去的两年中，除了斯科沃罗季诺到大庆的石油输送项目，没有一个大的基础项目被落实。

4.8.1 乐观的是，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 2012 年会成为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如果这带来的结果除了在举行首脑会议的俄罗斯岛上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也有关于实现远东地区融入亚太地区经济的项目，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从最近的动态来看，这一理念在国家最高领导层中是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将该理念付诸实现。

4.9 因此，我们提出的“西伯利亚项目”已成为国家未来 10 年至 20 年至关重要的现代化任务。其内容应该包括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原材料深加工以及在亚洲市场建立农业和其它“水密集型”产业。为此，需要有意识的政府政策，去最大化地吸引外资，为投资者提供最大的优惠和保障。如此一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就可以享有经过俄罗斯加工过的资源以及在亚洲正在相对稀缺的农产品。而中亚国家、中国、印度、朝鲜，可以提供我国稀缺的劳动力。

4.9.1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业和木材加工业体系急需新的投资战略。半合法的俄罗斯木材输出，不管对俄罗斯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没有好处，因为运作期间还伴随着附加的风险以及在中国加工原木时水资源的消耗。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在俄罗斯林业体系上（从砍伐到成品，再到森林的恢复）投资后，可以优惠地享用到俄罗斯木材加工品以及纸浆、造纸工业品。

4.9.2 在农业这一块，扩大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水密集型农产品（谷物、饲料、肉类）是比较有前景的。这将帮助中国减少水资源的消耗，并帮助俄

罗斯来说满足上述增长中的市场的需求。因此，积极吸引中国、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变得很必要。

4.9.3 从粮食贸易的角度看（比如：农产品展销会，农业贸易代表研讨会，互相之间大规模的产品促销），加大中俄双方在食品贸易上的相互吸引力是必需的，同时也具有广阔的前景。中国从 2003 年起成为世界食品进口大国，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中国对进口俄罗斯食品很有兴趣，但目前，俄罗斯食品在中国进口物品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

4.9.4 中俄在农业领域的科技合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力求在农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上和世界领先级水平靠近，而俄罗斯的技术人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炙手可热的专家。中俄之间应当发展科技合作，首先就是农业领域内的。而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块，俄罗斯应当向中国进口“绿色能源”技术，并吸引中方投资俄罗斯能源技术和降低碳排放上。

4.9.5 很明显，要使西伯利亚和远东同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实现接轨，首先需要优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目前，连接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中国的唯一交通路径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且，通向中国的只有两个出口——后贝加尔斯克和纳乌什基（从蒙古过境）。没有任何官方建造的公路通向中国境内。并且，只有两条高速公路（M52 和 M54）可以通向蒙古，未来计划通向中国。交通设施的发展如此薄弱妨碍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如果不在建造铁路和公路上投资，那么就无法增加对中国农业品、工业品的出口量。

4.9.6 俄罗斯有足够的能力来独立建设西伯利亚以及远东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以及制造出口必需的工具（比如，冷冻汽车和专业货运车）。只是一些现代精密设备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比如，隧道密封技术）。

4.9.7 关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小以及工作地区劳动力可能缺乏的现象（工作资历要求不高，比如道路建设），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劳动力来解决，比如从中亚、中国和印度引进。

而对于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需要不同专业的工程师，地质学家，测量师等），俄罗斯有自己的专家，当然，要从俄罗斯欧洲部分邀请过来。俄罗斯在恶劣环境下建造交通基础设施的经验并不丰富，因此，我们可以邀请国外在这方面有足够经验的熟练专家来解决（比如，从加拿大或者斯堪的

纳维亚)。

4.9.8 投资的优先方向应该是在俄罗斯建造一批大型的物流中心(目前,建设大型物流中心还仅仅在中国境内规划和实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纳霍德卡等远东港口发展港口中心。

4.9.9 在2010年的瓦尔代俱乐部中俄分组会议上,俄方代表提出了“三桥一路”的倡议。其内容是:在阿穆尔河上建造三座桥,分别通向布拉戈维申斯克、列宁斯科耶/比罗比詹和哈巴罗夫斯克,同时还要建造一条从中国新疆通往俄罗斯阿尔泰的公路。这些大型交通项目实际上是俄罗斯在合作纲要框架下致力于重点地区开放方针的象征性指标。通过观察这些项目完成的速度,可以总体上判定西伯利亚和远东同亚太地区国际经济接轨的程度。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扩大同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贸易很重要。众所周知,在远东几乎没有粮食出口港。

4.9.10 中俄经济关系的扩大会导致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单方面依赖不断加剧,要消除这一危险,应当使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到“西伯利亚项目”中来。“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投资生产面向亚洲市场的俄罗斯商品和资源”的原则对亚太地区的发展来说是一项很大的贡献。俄罗斯在欧盟提议的框架内与欧盟不断靠近,欧洲通过签订集体安全条约克服了分裂,这些都对“西伯利亚项目”有着促进作用。

4.9.11 最后,从经济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建设出口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不仅是致力于中俄关系发展,也着眼于同整个亚太地区关系的发展。因此,该项目应该重视发展东—西向交通运输,而不只是南—北向的。特别要避免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输送循环。他们应该被输往远东,并从那里通向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所有市场。苏联时期,所有的输气管道都是东西向建设,现在不应再重复那时的错误。

4.9.12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迅速开放发展的形势下,新的呼声能够促使俄罗斯与北极地区诸国的合作,目前由于未开采的自然资源,北极正是诸国争夺的目标。

4.9.13 “西伯利亚项目”的启动将意味着天才且富有专业精神的年轻一代——他们能够成功完成工作,并且是值得赞扬的工作——并不一定非得

离开家乡，去莫斯科或者国外寻求更好的机会。部分来自俄罗斯中心的天才青年能够去西伯利亚，而不是出国，目前对于他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向上流动的通道并不通畅。而在几年之后，这部分青年可以带着企业资产和管理经验回到联邦中心，并占据一席之地。如此看来，“西伯利亚项目”对于新俄罗斯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极具价值的人才培养试验场。

4.9.14 最后，欧亚联盟的西伯利亚维度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这是不容被忽视的。建立欧亚联盟——这意味着不仅仅只是向哈萨克斯坦的投入，也是对本国东部的投入。按照这一逻辑，西伯利亚是欧亚联盟的一个享有充分权力的经济主体。

五、俄罗斯的太平洋首都

5.1 世界经验告诉我们，加快国家重点地区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把首都，或者是一部分首都的功能迁到那里。在此我们有个经典的例子：1950年巴西从里约热内卢分出首都功能到其国土内部，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国家首都。于是，出现了巴西利亚。这个城市现已成为城市规划的典范，而整个国家的发展也变得更加平衡。

5.2 德国首都从波恩到柏林的迁移，成为发展前东德以及整合德国其他领土的最有利因素。最近的一个例子——哈萨克斯坦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往切利诺格勒/阿斯塔纳，更鲜明地显示了这一做法的有效性。得益于这一举措，哈萨克斯坦草原区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而如果没有首都的迁移，哈萨克斯坦很有可能不能保住其北方的国土。

5.3 如果部分首都功能被转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一个或者几个城市，“西伯利亚项目”可能会得到国家的特别的优先关注。同时，某个国家机构纯粹象征性的迁移（比如，联邦会议）不会对地区的加速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只会招致无谓的浪费。

5.4 这样的话，就需要更大规模的规划——将政府的所有社会经济集团全部迁往新的西伯利亚—远东首都，而只在莫斯科留下一些强力部门。形成时的几十年，国家安全管理系统不会发生变动，而经济发展中心便会自然

而然地转移至东方。这一迁移可以让这些作为国家优先发展区的地区得到真正的发展。此外还应规定，将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所有首脑会议以及国际会晤放在太平洋这里的新首都，而不是莫斯科。

5.5 在地理规划上，最好的选择莫过于直接将首都迁至太平洋沿岸。于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然而然成为了候选地。这样，新首都，这个俄罗斯的“海上橱窗”，将被充分利用。此次因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而开始的大规模建设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关于迁都的决议也可以在首脑会上宣布，从而显示俄罗斯对于发展东部地区的决心

5.6 同时需要指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地区的城市不同，其最紧迫的任务是改变形象。所有的东亚国家代表团继自己 22 世纪的摩天城市之后将感受到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文化冲击。因此，改变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始荒蛮之地”的固有形象，不仅对于这个城市，而且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变得至关重要。当然，关于首都迁往何处，也存在其他一些新奇说法。比如，金刚石资源之都——雅库茨克、农业和休闲之都——巴尔瑙尔，西伯利亚第一首都——托博尔斯克，在那里保存着西伯利亚唯一的并且不可或缺的克里姆林宫。但这一切都是在讨论它们的突出特点。俄罗斯在远东迫切地需要一个海洋首都。

(施海杰 译)

【Abstract】 Regarding current Asia-Pacific configuration, both Chinese and Russian participants hold the U.S and Europe have been trapped into the crisis and will practice austerity in the next 5-8 years with decreasing influences within the globe especiall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Russian participants view, Asian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maintain a thriving growth while Europe and the U.S. are in recession du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cus is transferred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so wil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ocus. Chinese participants think that the U.S. is in relative decline, while emerging powers such as China, Russia and India are rising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nd to become

flatten and competition center is accelerating transferring to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When Asia develops rapidly, the US-led military alliance is yet maladaptive to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ussian participants hold that, in 2011, the United States returned to Asia, and took advantage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military alliance in this region and contain China. Russia needs a peaceful regional situation for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a-Russia-U.S. tr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should be built, providing security protec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of this region. Chinese participants hold corresponding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order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is new regional situation, expecting and willing to assist Russia to play an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Asia. However, the new regional order should be open, inclusive and adaptive to diversities of Asian countrie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genda should be advanced gradually on the basis of active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ussian participants think that Europe is deeply trapped in financial crisis with problems impossibly solved in short term and Russia's economic focus will transfer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specially aiming at developing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Participation of countries or reg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China are highly expected. Chinese scholars hold that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region have various precious resources, mutually complementary with Chinese economy.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se two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has already been carried on. With Russia's gradually clear "Eastward" strategy, these two countries could carry on researches in projects and investment, exploiting both side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having in-depth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fter the U.S. withdrawal, Afghanistan will become new security threat in this region and together with three original force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Central Asia is worrying. Russian participants believe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Afghanistan situation,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India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ese participants believe that the SCO should play an active part in security, but the key to solve Central Asian problems lies in getti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ut of poverty through economic cooperation so as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ility.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SCO framework,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is region like the Eurasian Union.

【Key Words】 Asia-Pacific Configuration, Asia-Pacific Security Order,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Siberia, Central Asia Security

【 Аннотация 】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ынешней структуры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ученые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и Европа переживают кризис, в ближайшие 5-8 лет будут наблюдаться тенденции сокращения и полного упадка их влияния в мире, и особенно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рецессией в Европе и США из-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азиат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с Китаем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оцвет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уже переместилс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также скоро переместитс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Китайские ж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находя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го спада, а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Индия и другие развивающиеся держав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ереживают подъём, участвуют в процесс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выравнив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л, центр конкуренции ускоренными темпами перемещаетс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В реаль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зии возглавляемая США система военных альянсов уже не подходит процесс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 2011 го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вернулись в Азию и, используя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споры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се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укрепляли систему военных альянсов в регионе с целью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Кит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нуждается в мирн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рекомендуется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й механизм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гаранти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алым и средн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 нов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зд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 и систем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сказать согласие на и желание помочь России играть активную 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в Азии. Однако новы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ткрытым, всеобъемлющим, совместимым с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 основе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ния актив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двигать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и вопросо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глубокий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в Европ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решён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еместитс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внимание будет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о на развит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Европы, Китая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и регионов мира.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и Сибирь располагают множеством ресурсов, к тому же хорошо дополняют китайскую экономику, уж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о некотор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д эгидо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двух стран. Вслед з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ясняющейся «восточной» стратегией России стороны могут провод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нвестировании проектов и т.д., проявлят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каждой из сторон и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углубл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 после выво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войск станет нов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угроз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вместе с изначальными тремя силами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зывает тревогу.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являть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бращать присталь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ситуацию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Индией и другими сосе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Китайски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ШОС должна играть а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о разрешение коренных пробле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то,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е страны сами должны выходить из бедност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целью достижен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активно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процесс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ШОС, укреплять связ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други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в регион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итуаци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развит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ибир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责任编辑 陈大维)

俄罗斯与欧亚能源

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

久保庭真彰*

【内容提要】俄罗斯经济一度在油价的暴涨中实现了高增长，但在 2008 年油价暴跌之后，俄面临着经济增长的转折点。虽说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伴随着一系列的市场经济结构改革，但还是对于油价变动反应过度。俄受油价变动摆布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可统称为“俄罗斯病”。这其实是一种“石油诅咒”综合症，但它不同于“荷兰病”。虽然俄罗斯历经石油价格高涨→实际汇率升值→进口扩大的发展路径，却没有出现 GDP 增长递减和制造业增长低迷的现象。因为俄国内市场大于荷兰，而且制造业发展缓慢。我们不能期待出现治愈“俄罗斯病”的特效药和特需，而有效利用资源利益来推动其经济发展是俄罗斯的现实选择。俄罗斯以“推翻世界史”的速度实现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但是，在重构文化背景和制造业基础之后再发展经济恐怕还需时日。

【关键词】石油 俄罗斯经济 转折点 俄罗斯病 荷兰病

【中图分类号】F112.2(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1-0040-(52)

一、问题的所在

俄罗斯经济在历经制度变迁所伴生的低迷，以及财政和金融危机之后，10 年间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2007 年，即其体制变迁 15 年之后，可以说俄罗斯的经济渐近临界增长的转折点。此后，2008 年上半年，俄罗斯又经

* 久保庭真彰，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历了原油价格暴涨带来的泡沫经济。然而，原油价格的下跌，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 9 月 15 日的“雷曼风暴”，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冲击。俄罗斯经济由年增长率达 7-8% 的增长态势陡然陷入低迷状态，2009 年的增长率甚至骤降为 -7.9%。因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所以受到影响的国家当然不只是俄罗斯。^①危机发源地美国也出现了经济衰退。从增长率来看，美国由 2008 年的 0.4% 降到 2009 年的 -2.4%。日本的增长率连续两年下降，由 2008 年的 -1.2% 下滑为 2009 年的 -5.2%。英国和德国 2008 年的增长率都是 1.2%，2009 年则为 -5%。由于俄罗斯 2008 年的增长率是 5.6%，所以将 2008 年和 2009 年两年的数据合并计算，其经济增长总体上虽略逊于美国，也稳居日德英等国之上，由此或可推断出俄经济并非那么糟糕。

然而，问题在于俄罗斯的经济大起大落，落差过大。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其人均 GDP 刚越过不足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 1 万美元大关，经济就出现了回落。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作为新兴金砖国家（BRICs）的中国和印度，2009 年的增长率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分别达到 9.1% 和 5.7%，而一直与俄罗斯并驾齐驱的巴西，同年的增长率也维持在 -0.2%。此外，一些依靠原油出口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挪威、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即使遭遇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其衰退程度也不像俄罗斯那般严重（2009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0.1%、-1.5%、1.2%、9.3%）。唯有俄罗斯呈现急剧衰落之势，因此自然会产生忧惧心理，担心从赶超（catch-up）军团中掉队甚至遭到孤立。

正如本文多次指出的那样，俄罗斯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不可低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禁要发出疑问，为何只有俄罗斯的经济急速下滑呢？1998 年，俄罗斯国内继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发生了财政和金融危机。其时，尽管也有 IMF 作为后盾，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国内外投资家没能及时规避风险。而在本次危机发生之际，国内外投资家和俄国民众全都同时采取了逃避风险的措施。尽管政府借助 2000 年以后的经济增长，财库充盈，外汇储备

① 以下各国增长率信息来自 IMF（2010）以及内务省主页。中国的数据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主页的改正值。由于印度、巴西的增长率是从 IFS 得到的数字，会有不准确的成分。对于俄罗斯经济现状的整体分析，田畑伸一郎（Tabata Shinichiro）有过缜密的调查。参见田畑伸一郎：「ロシア経済の動向：世界金融危機の影響と回復過程」，『ロシア NIS 調査月報』，（2010）5 月号，pp.1-21。

也充足；尽管原油价格远远超出 2000–2004 年的水平，但是，规避风险的行动还是同样，并且在大规模地上演着。这到底是何原因呢？从结论来看，笔者认为问题就在于：国外投资者与国内民众对俄罗斯经济进行预测和期待时，不是基于原油价格的水准，而是大大依赖于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对海外热钱流动的“自由放任”；以及存在于其制度背景之下的法治水平低下等因素。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经济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笔者也时常论及于此，作为俄罗斯经济的基本面与前景的研判信息，人们一直重视原油的价格变化（不是关注数年前的价格水平，而是目光短浅地只看重价格的波动）。要验证猜想就需要预设具体的操作指标。实际上，人们认为，能够同时而且同样地提供给国内外的人们的、值得信赖的动态信息和新闻，并非是各种各样的专业情报，而是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卢布与美元的浮动汇率。

本文拟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展开分析。笔者将通过定量分析表明，俄罗斯的增长转折点本身是由原油价格的高涨带来的；而且，2009 年经济增长的大幅回落，也与油价下跌有关。本文的着力点在于：将俄罗斯受油价变动摆布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现状笼统概述为“俄罗斯病（Russian Disease）”，并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对这一病症进行调查和诊断。俄罗斯经济正陷入“资源陷阱”或者“原油陷阱”之中。然而，我也想明确指出，在俄罗斯，未曾出现由于油价暴涨而造成的宏观增长与制造业增长停滞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症状。本文将通过宏观数据，回顾过去 20 年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动态，力求揭示在何种意义上，可将现阶段称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转折点，以及“俄罗斯病”的症状到底是什么。有关 GDP 数据是以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在主页登录的数据为基础的。^①本文执笔时，与此相应的第四季度调整数据修订版，尚未上传，因此根据国际标准 X-12-ARIMA，笔者采用的是自行制作的季度调整系列数据。^②

① <http://www.gks.ru>，截至 2010 年 7 月 1 日。

② 对俄罗斯统计局（Rosstat）SNA 部以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MER）预测局所做的田野调查（2010 年 5 月），根据季度调整使用国际统计局 X-12（美国国际标准）。本文定稿后的 GDP 统计修正，参见久保庭真彰：「交易利得と GDI の試算：BRICs、日米、産油国（サウジアラビア、ノルウェー）」，RRC working paper No.26，一橋大学経済研究所ロシア研究センター，2010；「ロシアの GDP 統計改訂についての覚書」，RRC working paper No.31，一橋大学経済研究所ロシア研究センター，2010。

二、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向

俄罗斯经济在 2009 年放缓，尽管如此，还是维持在向苏联鼎盛时期的 GDP 水准恢复的态势。而且，与此前转型期的低迷不同，正逐步呈现出缓慢的增长势头。可以说，俄罗斯经济已经通过了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化测试”。^①当然，GDP 这一产品数量测量的构成内容已与苏联时期发生了本质的区别。那一长串的苏联时期的名产、长期的供求不足以及美元黑市交易都消失了，生产向军事经济的倾斜也已成为历史。

表 1 199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增长

	年增长率 (%)			指数			平减指数 通胀率 (%)
	生产 GDP	支出 GDP (GDE)	所得 GDI	生产 GDP	支出 GDP (GDE)	所得 GDI	生产 GDP
1990				100.0	100.0	100.0	
1991	-5.0	-0.9	-6.6	95.0	99.1	93.4	128.5
1992	-14.5	-14.3	-14.4	81.2	85.0	80.0	1,489.5
1993	-8.7	-7.3	-15.3	74.2	78.8	67.8	888.4
1994	-12.7	-10.7	-12.9	64.7	70.3	59.0	307.9
1995	-4.1	-3.9	-5.3	62.1	67.6	55.9	163.0
1996	-3.6	-4.7	-2.7	59.9	64.4	54.4	45.8
1997	1.4	0.8	-1.0	60.7	64.9	53.9	15.1
1998	-5.3	-6.1	-7.3	57.5	61.0	50.0	18.6
1999	6.4	6.2	5.1	61.2	64.7	52.5	72.5
2000	10.0	9.8	22.0	67.3	71.0	64.1	37.6
2001	5.1	4.7	2.6	70.7	74.4	65.8	16.5
2002	4.7	4.4	3.8	74.0	77.6	68.3	15.6
2003	7.3	7.3	10.0	79.4	83.3	75.1	14.0
2004	7.2	7.3	13.5	85.1	89.4	85.2	20.1
2005	6.4	6.4	12.0	90.6	95.1	95.4	19.2
2006	7.7	7.7	11.8	97.6	102.4	106.7	15.5
2007	8.1	8.4	9.6	105.5	111.0	117.0	13.9
2008	5.6	5.2	10.3	111.4	116.8	129.1	18.0
2009	-7.9	-7.8	-16.8	102.6	107.7	107.4	2.3
1999-2008 平均值	6.8	6.7	10.0				23.3
2000-2008 平均值	6.9	6.8	10.5				18.8
1991-2009 平均值	0.1	0.4	0.4				79.0

^① R.E. Ericson, “The Russian Economy in 2008: Testing the ‘Market Economy’”, *Post-Soviet Affairs*, Vol.25, No.3, 2009. pp. 209-231.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主页，[http://www.gks.ru/wps/portal/OSI-NS#\(2010年4月1日,2009年10月1日\)](http://www.gks.ru/wps/portal/OSI-NS#(2010年4月1日,2009年10月1日))，联合国统计局主页，<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 (2010年3月1日)。

备注：1、GDP 增长率：1991-1995 年的数字来自于联合国主页登载的数据，1996-2009 的数字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主页登载的数据。联合国数据中的库存增加数字由于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总资本形成-总固定资本形成”上作了修正。另外，联合国数字在 2002 年存在错误。2、GDE 增长率：1991-1995 年，2003-2009 年是根据历年连锁法得出的笔者推算值（利用的数据出处同备注 1）。1996-2000 年，2001-2002 年根据 1995 年固定价格数据、2000 年固定价格数据（国家统计局主页 2009 年 10 月份和 NSR 历年版）计算得出。GDE 的固定价格系列在现在的主页上没有登载。比较年份的“项目分类最终消费+项目类别总资本形成+出口-进口”是除以基准年的数据计算而来。3、GDI 增长率：利用历年连锁法计算的笔者推算值（利用的数据出处同备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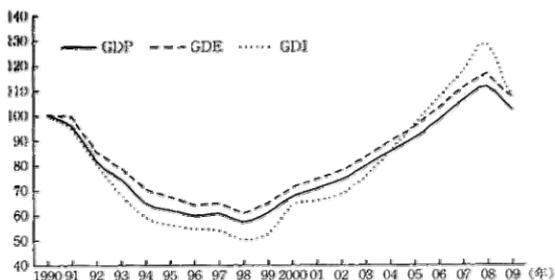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经济的 GDP 增长——1990-2009 年（1990 年=100）

备注：同表 1

本文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转折点置于一个长期进程中，进行实时、横向、定量式的分析和比较研究。

表 1 和图 1 是从生产、支出、所得三个方面来统计的 199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宏观增长。在就各统计值进行说明概念规定、测定方法以及俄罗斯固有的统计问题的同时，也试图跟踪其动态。

“生产 GDP（国内生产总值）”或者“生产方 GDP”，“依据生产方式的 GDP”都是根据经济活动类别（产业类别）附加值的总和来计算的。俄罗斯和中国的 GDP，通常意味着生产 GDP。用图表显示的正式 GDP 增长率也就是生产 GDP 增长率。俄罗斯的 GDP 统计制作历史只有短短的 20 年时间。往年 GDP 统计的公开数据并不非常充分。

苏联时期存在由于夸大企业生产的报告导致国民所得虚夸的问题，而在

苏联解体后，又出现了由于小企业的乱象和逃税之风蔓延而导致的统计过小问题，因此俄罗斯政府对正式 GDP 增长率实施了修正。图表所示为修正后的数字。

苏联时期，不仅企业的业绩报告虚夸，其经济也被称为“非正式经济（第二经济）”或者“黑市经济”，很难进行正式统计的“非观测经济（Non-Observed Economy）”广泛存在。这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来讲，其重要性要超过苏联时期。“非正式经济”将在后面阐述。俄罗斯的正式 GDP 统计中含有本人推算的非正式经济成分。因此，实际上，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非正式经济增长计算所左右。但是，对于该论点，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不能提供任何明确的具体数据。正如表 1 中 GDP 平减指数所示，苏联解体前的价格修正和苏联解体后的价格自由化，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图表所示的联合国公布的通货指数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通货指数（主页刊载），只有 1995 年是不同的。正式数字是 143.9%（总数为 243.9%）。其差异是由于对 1995 年名义 GDP 的修正而导致的。国家统计局自 2003 年以来，利用统计年鉴 RSE 等对 1995 年的名义 GDP，将以前公布的数字重新向下修正为 7.268%。可是，对 1991-1995 年实际增长率却没有进行回溯修正。而且，对 1991-1994 年的名义值也没有进行回溯修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为了保持增长率与平减指数两者不变，1991-1994 年的名义值一律按照 1995 年的修正率（7.268%）进行了修正。结果只有 1995 年的平减指数出现了不同的数值。如果对 1995 年的名义值进行了修正，之前的名义值当然也要修正，所以我们在此采用了联合国的数据。不过，联合国的名义值回溯以及修正方法有些机械，还有改良的余地。2002 年以前发布的 1995 年 GDP 名义值，是根据 1995 年基准产业相关表格进行编制的，因此将年鉴 1996 年版（RSE 1995）^① 刊载的数字向下修正 5.5%。1995 年名义值的背后，有着上述的故事。名义值修正不仅关系到 1991—1995 年的增长率，也关系到 1996—2009 年增长率的修正，虽然并非难以想象，但实际增长率的回溯修正还是被巧妙地回避了。

关于俄罗斯 2003-2009 年的 GDP 增长率，采用历年连锁法编制。本期

^① 参见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不同年份的统计年鉴（RSE—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осква.: Росстат.）

（比较年份）的实际增长率，是使用上一年的名义 GDP，去除按照上期（基准年）价格标明的本期 GDP 金额而得出的数字。基准年份每年都进行变更，遵循 93SNA、08SNA 的国际标准。本文对于 1991-1995 年的增长率，采用历年连锁法计算。日美和挪威等国，现在也都采用历年连锁法计算正式 GDP 增长率。俄罗斯的问题在于，1996-2000 年的增长率是按照 1995 年固定价格计算的，2001、2002 年是按照 2000 年固定价格计算的。而且，生产 GDP 宏观增长率在时间段上，是由按照旧产业分类的系列数据（1991-2002 年）和按照新产业分类的系列数据（2003—）构成的连锁系列数据。1991 年至今的增长率，都是按照上述方式校验连锁而编制的。连锁法的问题在于，按照某个基准（参照）时间联系而成的时间系列数据（指数或显示金额），小项目（按产业分类附加值、消费和投资等各种支出项目）的合计数值，一般来说都不会与宏观数值一致，无法掌握大小项目之间和小项目之间的关系（首先求出宏观和项目类别的各时间段的增长率，使用该增长率来编制中长期的指数系列数据和金额显示系列数据）。^①虽然存在“加法”不成立的问题，但是各国都认为不能对于固定价格方式的缺点置之不理。

即使采用历年连锁法估算增长率，各国的惯例也还是选择某个特定年份作为参照标准，用来标注金额显示系列数据。美国将“2005 年连锁美元 chained(2005)dollars”作为 2005 年参照标准，日本将“2000 年连锁价格”作为 2000 年参照标准。俄罗斯当前是以 2003 年作为参照标准来正式公布生产 GDP（2003-2009 年）和支出 GDP（1996-2009 年）。^②

本文多次提及的中国，2000 年以后是以间隔 5 年连锁方式（1980-2000 年是以间隔 10 年连锁方式），也就是说，关于 2006-2010 年，是以 2005 年固定价格标准来计算增长率的。关于 2001-2005 年（1996 年-2000 年）的增长率，是以 2000 年（1995 年）的固定价格来计算的。通观 1996-2010 年的

① 参考 93SNA。

②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仅用“2003 年固定（不变）价格”作为参照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容易被误认为是固定价格方式的“俄罗斯 SNA 年报（NSR）”，其加法性上是不成立的。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挪威统计局也是采用历年连锁法，利用“1999 年固定价格（constant prices）”及“2007 年固定价格”作为 1999 年参照标准系列及 2007 年参照标准系列。（来自挪威统计局，2010 年 5-6 月）。

数据，三个固定价格系列构成了连锁系列。

需要留意连锁方式和固定价格方式在专业术语上容易混淆。判断方法是实际增长率是用何种方法制成的。

从历经一番曲折而编制的 GDP 增长率来看，俄罗斯经济经历了 1991—1996 年转型时期的低迷、1997 年的好转，再到 1998 年由于财政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年平均近 7% 的衰退，其实际 GDP 水准降到了仅比 1990 年一半略多的 57.5% 的水平。之后，经过年平均近 7% 的高增长，俄罗斯经济 2008 年的实际 GDP 恢复到超出 1990 年 11% 的水平。2009 年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再次下落，但没有低于 1990 年的水平。

GDP 平均物价指数，1992 年由于价格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导致巨大通胀；1995—1997 年由于物价平稳和汇率稳定出现紧缩；1998 年 8 月由于危机导致汇率大跌使得再度通胀；之后，物价稳定，汇率上升，油价上涨。综合以上因素，其 GDP 平均物价指数以 19% 的水准进入 2008 年。2008 年由于油价上涨，GDP 平均物价指数上升到 18%，到了 2009 年，由于油价下跌、物价稳定、汇率下跌、生产下降等因素互相抵消，第一次出现了个位数的 2.3% 这一数值。

以上是按年度数据所作的说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不仅按年度统计，也按照季度来制作和公布数据。关于生产 GDP，截至 2010 年 8 月份，主页上公布的数据是：（1）季度未调整的名义值（2003—2010 年第一季度）；（2）相对上年同期各季度未调整的增长率（原数据，2004—2010 年第一季度）；（3）显示 2003 年连锁价格的季度未调整系列（原数据，2003—2009 年第三季度，2009 年 12 月 11 日）。相对上一年同期增长率是用各期连锁方式计算（年度变为季度计算）。公布的 2003 年价格显示系列，根据修正后的相对前一年的同期增长率来计算，并不是很充分。本文使用的 2003 年季节未调整数字，是对公布的 2003 年数字，使用各期修订后的正式增长率重新计算得出的数据。关于生产 GDP，因为部门类别的季节调整后的系列数据尚未公布，因此，本文使用 X-12 计算，利用制造业与商业的季节调整系列数据。

1995—2000 年（1996—2000 年增长率按 1995 年固定价格计算）和 2000—2004 年（2001—2004 年增长率按 2000 年固定价格计算）各个部门的季

度数据，收录在俄国家统计局主页的公文之中。1995年固定价格显示季度未调整系列（1995-2000年）数据和2000年固定价格显示季节未调整系列（2000-2004年）数据都已公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数据问题在于，2003年价格显示系列数据没有对应最新的增长率公布结果，以及没有公布季节调整系列数据。本文的基础工作在于解决这些难点问题。

“支出GDP”或者“支出方GDP”，“依据支出方式的GDP”，就是按照最终消费、总资本构成、纯出口总额来计算。“支出GDP”在日本的旧称是“国内总支出（GDE: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为方便起见，在此再次使用该名称。日本称呼GDP的时候，一般表示这种“支出GDP”。

图表中的支出GDP的增长率与增长指数，是笔者计算的数据。俄罗斯没有明确公布支出GDP或者GDE的正式增长率。但是根据2010年2月发表的“2003年连锁价格”显示的支出GDP，可以间接了解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计算结果（1996-2008年）（支出GDP=GDE=GDP宏观值——统计上不一致）。统计局的想定数字与笔者的计算数字是分别独立计算的，然而结果几乎是一致的。关于刚开始的转型阶段，因为没有这种间接信息，所以GDE各项的增长率是笔者利用各年度连锁法计算的，并用图表来显示。

关于1991年和1997年，生产GDP增长率和支出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很大的乖违。2003年以后，生产GDP和支出GDP的增长率的不一致基本消除。

1991-1996年过渡时期的低迷，1997年的好转，以及1998年财政和金融危机，1991-1998年的GDE年平均增长率为-6%，比GDP增长率高出1%。因此，2008年实际GDE水平比1990年高出17%，2009年也超出8%。过渡初期1991-1995年的GDP增长率和GDE增长率之间的不一致，是由于两个系列没有进行统一的修订和调整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也同样对生产GDP按照年份和季度分别做成统计数据公布。关于支出GDP，截至2010年8月在主页上公布的数据是：（1）季度未调整的名义值（1995-2010年第1季度）；（2）相对上年同期各季度未调整的增长率（原数据，1996-2010年第一季度）；（3）显示2003年连锁价

格的季度未调整系列(原数据,1995-2009年第三季度,2009年12月31日);(4)显示2003年连锁价格的季度调整系列(1995-2009年第3季度,2009年12月31日)。公布的季度调整后的数字与生产GDP不同。需要注意的是,生产GDP的季度调整系列数据是从支出GDP系列数据得出的。国家统计局的公布方式并不完善,没有将季度未调整原系列与季度调整系列这两者的增长率调整更新。本文利用增长率原数据来重新编成季度未调整数字,使其符合X-12,然后再使用季度调整的成果。

主页上以前登录1996-2000年的1995年固定价格显示系列和2001-2003年的2000年固定价格显示系列较为重要,因此本文根据原有文件来进行贡献度的计算。

表中“国民可支配收入(GDI: Gross Domestic Income)”,与通过一般所得计算得出的总收入(营业剩余+雇佣者报酬+纯生产税)的实际增长率不同。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将其作为参考指标予以制作和公布,但是俄罗斯的正式统计却没有制作和公布。关于GDI将在以后详细阐述,这里只要将其看成是反映原油价格上涨这一名义因素的实质收入就足够了。在原油价格低迷的90年代,GDI增长低于GDP增长,但是到了21世纪的2008年,GDI增长反而远高于GDP的增长。接着,到了原油价格大幅回落的2009年,GDI增长率的下滑大大超过了GDP增长率。通观整个1990年代的数据,GDI的增长还是略高于GDP的增长。

关于2009年实际GDP是否高于苏联顶峰时期1989年的水准,要依靠未在表中公示的1990年GDP增长率。采用正式增长率(RSE1995, p.243)3.0%的话,2009年GDP水准是1989年水准的99.5%,虽说微乎其微,但还是存在0.5%差额。如果使用笔者1990年增长率推算值-0.6%的话,2009年的GDP则是1989年的102.0%,高出2%。^①我们的推算方法,因为同时给出接近1995年修正后的正式数字,所以1990-1991年增长率相互关联的整

^① M. Kuboniwa and A. Ponomarenko, “Revised and Enlarged GDP Estimates for Russia, 1961-1990,” in K. Odaka, Y. Kiyokawa and M. Kuboniwa (eds). *Constructing a Historical Macroeconomic Database for Trans-Asian Regions*,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00, pp.109-127.

体性要高。^①另外，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对 1991-1994 年 GDP 增长的评估，是评估的底线。^②。因此，尽管俄罗斯 GDP 增长统计在过渡初期的数字有些靠不住，不过，当前 GDP 的水平确实高于苏联顶峰时期的水平。这 20 年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说明俄罗斯经济正步入一个转折点。不管怎样，从 1991 年至 2009 年平均来看，俄罗斯只是勉强维持了一个正增长。

如图 2 所示，俄罗斯经济的增长之路，只是最近 10 年保持了良好状态。

从 2000 年到包括全球性不景气的 2009 年这最近 10 年间的 GDP 平均增长率来看，俄罗斯的 4.8% 虽比不上中国的 10.1% 和印度的 7.4%，却高于巴西的 3.2%，更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 2.1%、日德的 0.5%、产油国挪威的 1.9%、沙特阿拉伯的 3.3%。最近 10 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确实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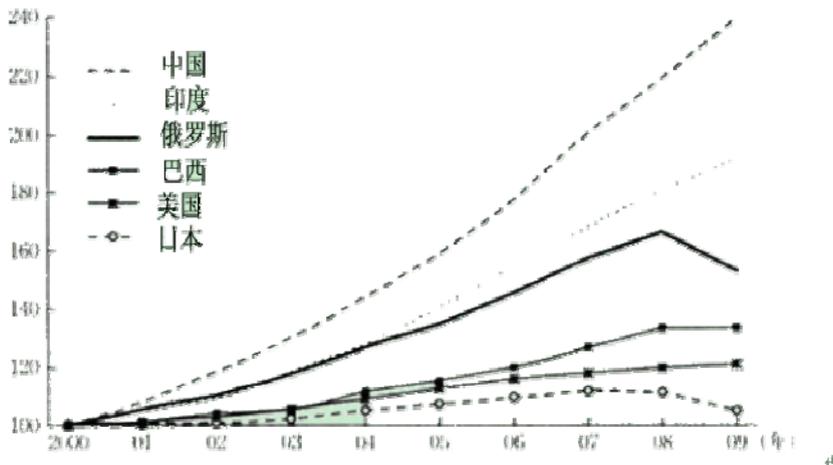


图 2 金砖国家和日美的增长 (2000 年=100)

资料来源：根据 联合国主页、各国统计机构主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 BEA、日本内阁府 ESRI）、IMF 的主页制作（2010 年 7 月）

① Кубонива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оценка ВВП// 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1997. № 10. С. 7-10.

② 同上。

让我们把视线由最近 10 年延伸至 20 年吧。

图 3 显示的是金砖国家、日美、产油国（沙特和挪威）最近大约 20 年间的增长指数。可以看出，经历过渡时期长期低迷的俄罗斯，在图中所示的诸国当中排名靠后。与金砖国家、发达国家和产油国以 20 年为单位进行比较的话，俄罗斯更显出差距。其特征可称为“失去的 20 年”，其增长率甚至低于苦于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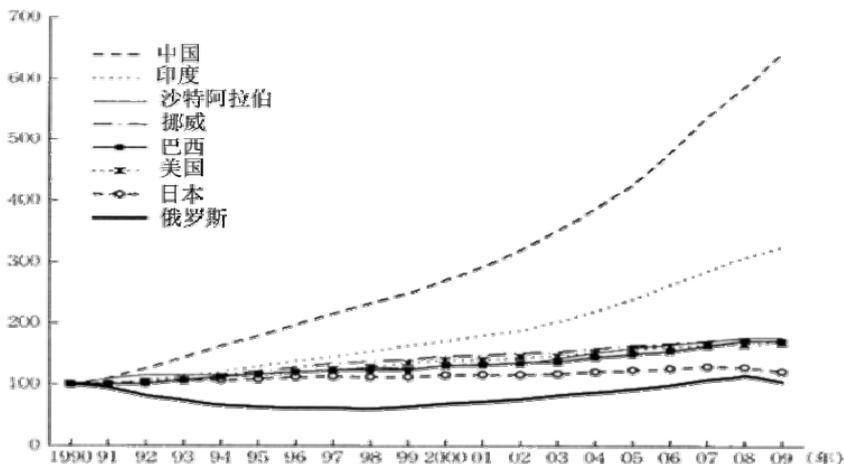


图 3 金砖国家、日美、产油国 GDP 的增长（1990 年=100）

如果把 1990 年设定为 100 的话，2009 年金砖国家的增长指数，巴西是 169.3（年平均增长率 2.8%），俄罗斯是 102.6（同上 0.1%），印度是 324（同上 6.4%），中国是 639（同上 10.3%），发达国家日美的增长，美国是 166（同上 2.7%），日本是 118（同上 0.9%）（图中没有标出的德国是 129（同上 1.3%））。产油国的增长，挪威是 170（同上 2.8%），沙特阿拉伯是 175（同上 3.0%）。人均 GDP（按美元）水准较低、人口众多的中印两国出现的发展高潮可以理解。然而，从 20 年的时间单位来看，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美国和产油国挪威之间都保持着较大的差距，由此可充分反映出俄罗斯的增长不过是刚刚曲折而艰难地踏上了转换的出发点。

我们再来看看美元表示的 GDP。表 2 是用美元 GDP 来描绘俄罗斯 20 年间的动向。由于 1998 年危机，人均 GDP 在 1999 年下降到 1300 美元。但

是，其后由于经济增长和汇率的上升，2008年超过了1万美元的大关。2000-2008年增加了将近9倍的美元名义收入，这对于深深依赖外汇和外国产品的俄罗斯企业和国民来说，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与经济福利，这是按照实际GDP增长率计算无法见到的。2009年，由于增长回落与外汇贬值，减少了26%，降到8700美元。尽管如此，还是保持了2007年上半年的水平。从美元GDP来看，俄罗斯经济是不稳定的，迎来了转折点也是一目了然的。对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俄罗斯，关注美元时价GDP的增长，其重要性要超过关注实际GDP的增长率。

表2 俄罗斯的美美元GDP（时价）

年份	GDP(美元)		
	规模 (10亿美元)	人均 (美元)	规模 (统计增长率)
1990	570	3,848	
1991	560	3,772	-1.7
1992	490	3,295	-12.5
1993	458	3,077	-6.6
1994	408	2,744	-10.9
1995	399	2,688	-2.1
1996	392	2,644	-1.8
1997	405	2,736	3.3
1998	271	1,835	-33.1
1999	196	1,331	-27.7
2000	260	1,771	32.6
2001	307	2,100	18.1
2002	345	2,377	12.7
2003	431	2,984	24.9
2004	592	4,113	37.1
2005	765	5,340	29.2
2006	989	6,942	29.4
2007	1,300	9,160	31.4
2008	1,668	11,794	28.3
2009	1,231	8,672	-26.2

资料来源：联合国主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主页、IFS。

备注：参见表1，笔者根据2009年的IFS的汇率，以及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当年的人口统计141,915,638人，而进行的计算。

表3所示为金砖国家、日美德、产油国（沙特，挪威）按美元汇率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从GDP总量来看，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印度远远超过俄罗斯和巴西。按照人均GDP，俄罗斯最高，巴西次之，中

国与印度和俄罗斯与巴西有很大差距，正奋起直追。产油国沙特的人均 GDP 无论是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都远超俄罗斯。产油国中的发达小国挪威，汇率远超美国，但其购买力平价与美国接近。俄罗斯的人均美元 GDP 在 21 世纪之初快速增长，但低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也远不及产油国的水平。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俄罗斯的人均 GDP 在 2008 年几乎接近日德的一半，然而，今后却没有超出的希望。

金砖国家整体上，其汇率 GDP 是美国的 60%，购买力平价 GDP 已经超过美国的规模。从汇率 GDP 来看，中国呈现出飞跃发展之势，追上日本只是时间问题。

表 3 金砖国家、日美德、产油国的 GDP 比较

	汇率				PPP			
	2005	2008	2005	2008	2005	2008	2005	2008
	GDP		US=100		GDP		US=100	
巴西	882	1,573	7	11	1,585	1,984	13	14
俄罗斯	764	1,677	6	12	1,698	2,265	13	16
印度	784	1,207	6	8	2,358	3,298	19	23
中国	2,236	4,327	18	30	5,314	7,926	42	55
美国	12,368	14,441	100	100	12,638	14,441	100	100
日本	4,552	4,911	36	34	3,873	4,356	31	30
德国	2,793	3,673	22	25	2,512	2,918	20	20
挪威	302	452	2	3	220	257	2	2
沙特	316	469	2	3	491	593	4	4
	人均 GDP (美元)		US=100		人均 GDP (PPP)		US=100	
巴西	4,787	8,295	11	17	8,603	10,466	20	22
俄罗斯	5,326	11,807	12	25	11,832	15,948	28	34
印度	691	1,017	2	2	2,078	2,780	5	6
中国	1,710	3,259	4	7	4,064	5,970	10	13
美国	42,708	47,440	100	100	42,708	47,440	100	100
日本	35,633	38,457	83	81	30,315	34,116	71	72
德国	33,883	44,729	79	94	30,473	35,539	71	75
挪威	65,204	94,387	153	199	47,520	53,738	111	113
沙特	13,658	18,855	32	40	21,236	23,814	50	50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9.<http://imf.org/external/pubs/> (2010 年 3 月)

三、“俄罗斯病”的功过——原油价格和经济增长

研究当代俄罗斯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汇率和原油价格问题。资金的主动流动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因此货币供给和外汇市场的动向，以及美元化和去美元化等现象对于理解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非常重要。俄罗斯外汇市场起基础作用的是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和原油价格，因此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表 4 为近 20 年间俄罗斯的汇率和原油价格的变动。

表 4 俄罗斯的汇率和原油价格

	汇率			乌拉尔原油价格	
	卢布 / 美元	卢布 / 美元 (变化率, %)	美元 / 卢布 (变化率, %)	美元 / 桶	美元 / 桶 (变化率, %)
1990	0.0010			22.7	30.2
1991	0.0023	120.8	-54.7	19.0	-16.1
1992	0.0360	1453.7	-93.6	18.1	-4.8
1993	0.3476	866.2	-89.7	15.4	-14.9
1994	1.39	299.5	-75.0	15.3	-0.9
1995	3.58	157.8	-61.2	16.9	10.6
1996	5.12	43.1	-30.1	20.4	20.7
1997	5.78	13.0	-11.5	18.4	-9.4
1998	9.71	67.8	-40.4	12.0	-34.8
1999	24.62	153.7	-60.6	17.3	44.3
2000	28.13	14.3	-12.5	27.0	55.5
2001	29.17	3.7	-3.6	23.1	-14.3
2002	31.35	7.5	-7.0	23.8	2.8
2003	30.69	-2.1	2.1	27.3	14.9
2004	28.81	-6.1	6.5	34.4	26.0
2005	28.28	-1.8	1.9	50.6	47.1
2006	27.19	-3.9	4.0	61.1	20.8
2007	25.58	-5.9	6.3	69.3	13.4
2008	24.85	-2.8	2.9	94.4	36.2
2009	31.74	27.7	-21.7	60.7	-35.7

资料来源：联合国主页、俄罗斯国家统计局、IFS。备注：参照表 3

自 1992 年汇率自由化以来，直到 1996 年，都是反复大幅下跌。随着恶性通货膨胀逐渐稳定下来，终于在 1997 年迎来了好转。然而这种状态没有保持多久，汇率又因为 1998 年的财政和金融危机而再次大跌。即使进入景气期的 21 世纪，卢布价格还是持续小幅下跌。2003 年以后，汇率开始上升，直到 2008 年雷曼兄弟破产。实际汇率从 2000 年起就以超过名义汇率的态势

上升。“雷曼危机”之后，汇率再次降低，但不像1998年危机时那样大幅下跌，只下跌了22%。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实际汇率仅仅下降了7%。这期间，是油价的恢复产生了影响。

原油价格在1991-1994年持续走软，使得俄罗斯体制变迁的基础更为不稳。1995年到次年，原油价格上升对俄罗斯的财政稳定作出了贡献，而1997年到翌年的大幅下落，最终构成了财政和金融危机的背景。然而，油价从1999年至2000年开始强力攀升，俄罗斯的经济随之—转，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虽然2001年是-14%，但其后持续增长至2008年7月。原油价格的反复拉升，可以说是经济持续增长与汇率上升的原动力。2008年上半年的暴涨是前所未有的，俄罗斯的经济已出现石油泡沫。到了第4季度，原油市场行情大跌。尽管如此，油价尚未跌到2004年以下的水平。进入2009年，油价再度恢复，2009年的平均价格稳定在2006年61美元/桶的水平。

图4描述的是近20年俄罗斯原油价格的变动与GDP增长率的动向。图中需要关注的是，俄罗斯1998年危机(-5.3%)、2000年的快速增长局面(同上10%)和2009年的急速下跌局面(同上，-7.9%)，均是受到原油价格变动的影晌。可以说，油价对于增长有很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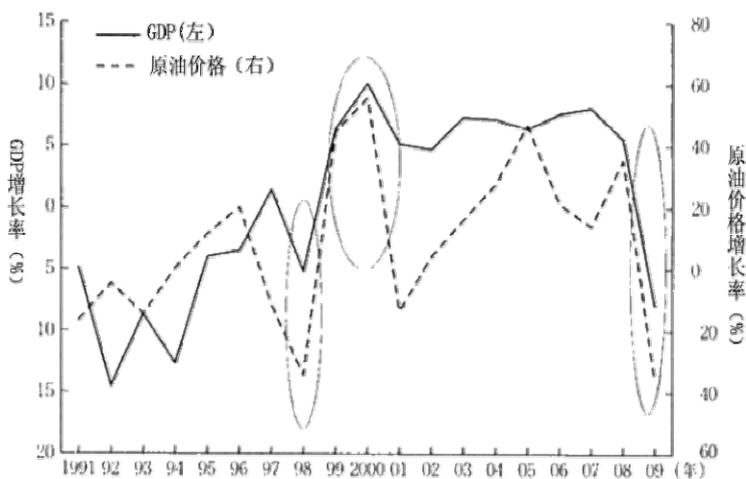


图4 原油价格与俄罗斯GDP的变动(%)

如果我们不单单以油价来说明增长，而是将构成基础的供给和支出等外

增长率数据（联合国和 IMF）以及布伦特油价（Bloomberg），该方程式同样适用于沙特（补正 $R^2=0.977$ ，括弧内为 t 值）。

$$\text{GDP 增长率} = 0.074 (\alpha) \times \text{油价增加率} + 2.236\% (\text{外在因素 } \lambda)$$

(3.05) (6.66)

油价增加率系数按照 5% 的水准有效，趋势项按照 1% 的水准有效。趋势增长率为 2.2%，比俄罗斯略低。油价增加 10%，带来 0.7% 的增长，这只是俄罗斯的一半以下。亦即，俄罗斯的经济明显依赖油价的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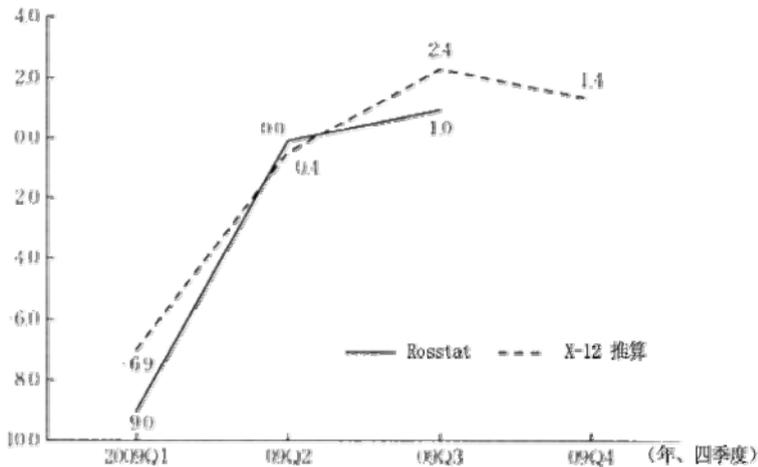


图 6 2009 年季度调整 GDP（相对前期增长率%）

关于俄罗斯季度调整后的 GDP 数据，有几点需要注意。笔者根据未改正调整系列数据推算的季度调整系列增长率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其比较结果如图 6 所示。不过，这里的推算季度调整系列数据是根据 1995 年第 1 季度—2009 年第 4 季度未调整的数据得出。笔者的推算值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有很大不同，在 2009 年的增长恢复趋势判断上也有差异。但是，笔者的数据与未公布的国家统计局修正季度调整数字（2010 年 4 月该局提供）和经济发展部数字（2010 年 4 月主页登载）接近。

使用季度调整数据的麻烦在于，每当采用新的未调整数据（原数据）之

际，即使以往的未调整数据没有变更，过去（尤其是最近）的季度调整相对于前期的增长率都会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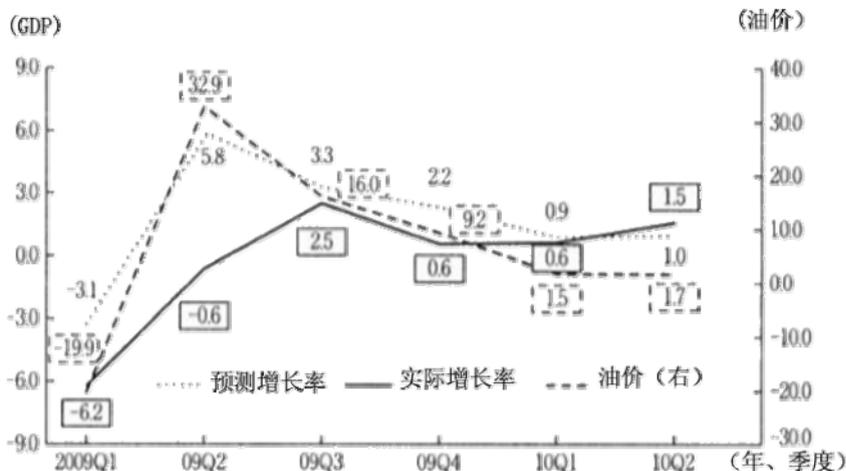


图 7 GDP 增长率（相对前期）与油价变动 (%)

图 7 为截至 2010 年第 2 季度为止的季度调整后相对于前期增长率的实际数值，以及按照上面回归方程计算的预测值和油价变动一并标注的曲线图。新的季度调整实际增长率，与上图略有不同，2009 年第 1 季度的增长减速一度放缓，同年第 3 季度的增长有所恢复。同年第 4 季度相对前期增长率下降 0.6%，2010 年第 1 季度的增长率停在 0.6%，但是同年第 2 季度的增长率为 1.5%，高于预测 1%，出现了油价上升带来的经济恢复现象。

四、“俄罗斯病”的症状——进口和 GDP · 油价 · 汇率

人们普遍认为，实际汇率的升值与降低进口产品价格、增加进口关系紧密。我们来看一下 1995 年第 4 季度—2009 年第 4 季度期间的 GDP、进口、汇率和油价的关系。使用的 GDP 数据和前面一样，是笔者制作的季度调整后 GDP 系列数据。汇率是 IFS 的 CPI 基础实际实效汇率。实际 GDP 与进口系列和实际汇率系列的动向如图 8 所示。对变量的对数值进行线性回归可得出以下长期进口均衡条件公式，(各系数按照 1% 的水准有效，补正 $R^2=0.977$,

括弧内为 t 值)。

$$\text{进口增长率} = 1.735 \times \text{GDP 增长率} + 0.800 \times \text{实际汇率增加率}$$

(35.452) (15.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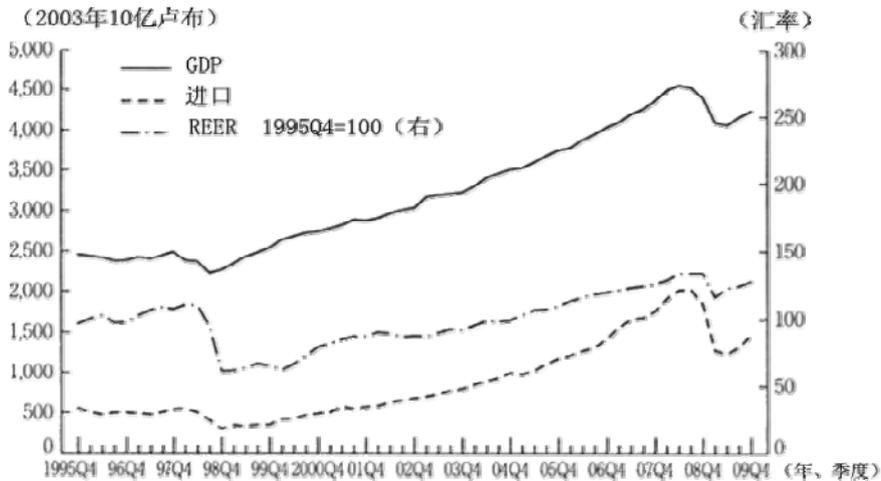


图 8 进口与俄罗斯 GDP、汇率的变动关系

从长期进口方程式可以算出，GDP 每增加 1%，就会带来 1.7% 的实际进口的增加。汇率升值 10%，可增加近 8% 的进口。油价的直接影响较小。^①这里重要的是进口增长与整个 GDP 的增长协调进行。进口是 GDP 的直接扣除项目，进口增加会对 GDP 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俄罗斯的经济低迷局面为汇率下跌导致进口降低所支撑。换言之，减少进口有时会提高增长率。然而，从整体来看，增加进口与 GDP 增长相关，GDP 的增长是进口增长的前提。反之，GDP 的减少又与进口减少相关联。而且，正如长期均衡条件公式所示，汇率和进口的联系很大。油价对于进口的影响与其相比要小很多。如前所述，油价对于 GDP 整体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以油价→GDP→进口这条路径来思考，进口增长率是由油价规定的，结构是匹配的。

① 这仍符合劳塔瓦关于 1995-2006 年计算的结果。

五、实际汇率与油价

实际汇率与原油价格的关系，在诊断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的征兆方面相当重要。奥梅斯（N. Oomes）和卡尔切娃（K. Kalcheva），利用1997年4月—2005年12月的每月数据，将汇率对油价的弹性定在0.50（标准误差0.15）。^①而且，GDP政府支出每增加1%，汇率就会增加1.62%（标准误差0.18），意味着消减政府支出可以抵消油价暴涨造成的汇率升值的压力。科霍宁（I. Korhonen）和尤里卡拉（T. Juurikkala）对OPEC各国1975—2005年的弹性推算为0.4—0.5。^②此外，他们没有明确表示实际人均GDP与汇率的关系。不过，OPEC核心成员国沙特阿拉伯由于采取固定汇率制度，这方面与俄罗斯在制度上有所不同。在科霍宁等人的论文当中，实际汇率不是根据CPI而是根据GDP通货紧缩因素制成的。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的实际汇率，强烈地受到构成GDP半数以上的原油出口价格所左右。他们的学术贡献是，对于一目了然的事情，通过定量检验来凸显其严密性。

在浮动制下的汇率上升，一方面可提高对卢布、股票市场和俄罗斯经济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可能会由于进口增加而导致国内生产萎缩。进口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具有提高生产和产品质量的作用，问题是消费产品的进口。消费产品的进口也能提高居民的福利，但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压力。然而，对于培养竞争能力、促进国内制造业扩大来说，汇率过度升值是有害的。

实际汇率REER， e_t 、 P_t 、 P_t^* 分别代表名义汇率（USD/本国货币）、国内物价水平、美国物价水平，得出下列公式：

$$REER_t = e_t \frac{P_t}{P_t^*}$$

此时，实际汇率指数上升，意味着本国货币价值上升（增价 appreciation）。

一般来说，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分析，利用CPI测量物价水平的IFS的REER（CPI基准）会被应用，也可将物价水平纳入GDP通货紧缩因素之中。

① N. Oomes and K. Kalcheva, “Diagnosing Dutch Disease: Does Russia Have the Symptoms?”,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07/2007.

② I. Korhonen and T. Juurikkala,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 in Oil-Export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33, No.1, 2009, pp.7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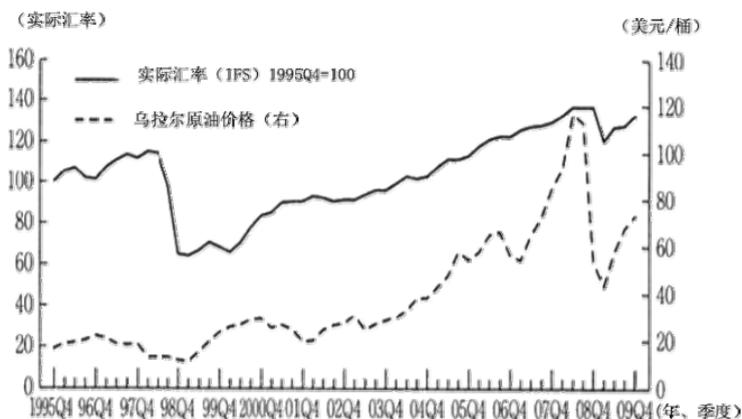


图9 实质汇率（IFS）与油价

首先，来看看 IFS 数据。图 9 是对 1995 年第 4 季度—2009 年第 4 季度，实际汇率和油价的长期均衡条件的考察。此间汇率对于油价的弹性为 0.235（标准误差 0.03，t 值 6.934，修正 $R^2=0.457$ ）。这比以往研究的结果数值要低。从油价开始上升的 1999 年第 1 季度到 2009 年第 4 季度来看，弹性上升为 0.368（标准误差是 0.027，t 值 13.522，修正 $R^2=0.809$ ）。如果油价上升 1%，那么俄罗斯的实际汇率的升值空间在 0.2%—0.4% 之间。

对产油国挪威 1995 年第 4 季度—2009 年第 4 季度，同样利用 IFS 的 REER（CPI 基准）来计算实际汇率对于油价的弹性。决定系数相对要低，但是按照 1% 的水准有效，弹性值为 0.054（标准误差是 0.007，t 值 7.249。修正 $R^2=0.780$ ）。挪威的弹性值要小很多。对于采用固定名义汇率制的沙特阿拉伯来说，根据 1995—2009 年度的数据计算，按照 1% 的水准有效，其弹性值为 -0.140（标准误差是 0.020，t 值 -7.1208。修正 $R^2=0.780$ ）。挪威的弹性相当小，而沙特的弹性为负数，这是因为其 CPI 是由其他条件控制的。但是，在经济相当依赖于原油的这三个国家，实际汇率相对油价的弹性，都低于预想。挪威 IFS 的单位劳动成本 RNULC 基准的实际汇率对于油价的弹性，如果也按照季度系列计算，会比较准确。按照 1% 的水准有效，弹性是 0.220（标准误差 0.014，t 值 15.6266，修正 $R^2=0.816$ ），弹性相对较高。虽说如此，仍然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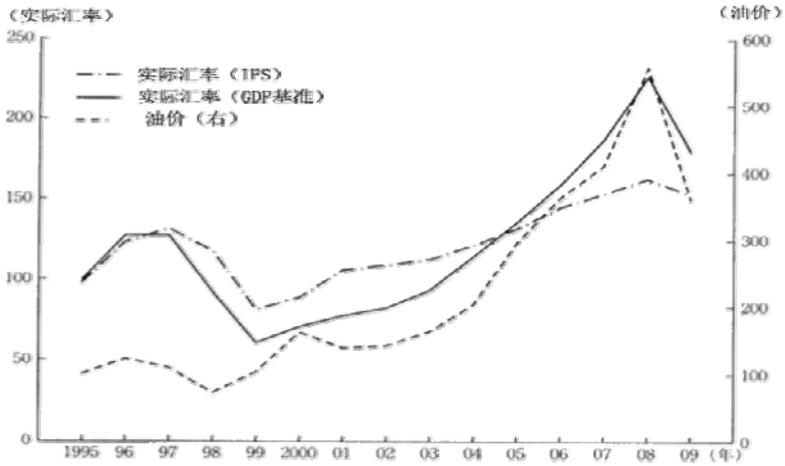


图 10 俄罗斯的实际汇率与油价（1995=100）

于是，我们尝试着根据美国、俄罗斯、挪威、沙特的 GDP 通货紧缩因素，在历年数据基础上计算实际汇率相对于油价的弹性。关于各数据的动态，俄罗斯如图 10 所示，沙特和挪威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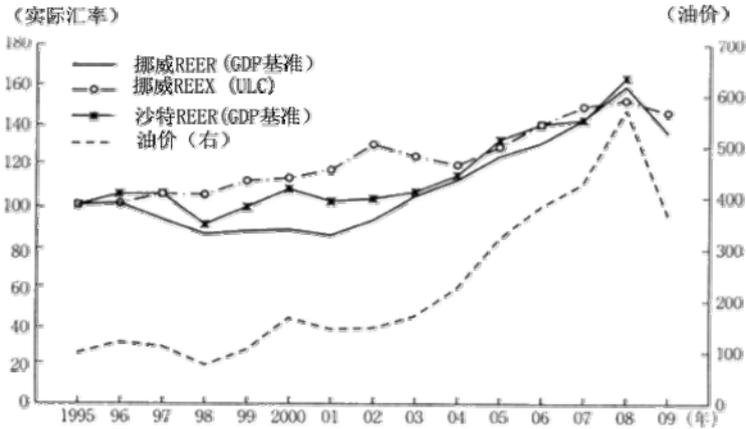


图 11 挪威、沙特的实际汇率与油价

俄罗斯、沙特、挪威的弹性在按照 1%水准有效的情况下，分别是 0.502（标准误差 0.107，t 值 4.714，修正 $R^2=0.603$ ）、0.415（标准误差 0.015，t 值 27.168，修正 $R^2=0.983$ ）、0.540（标准误差 0.0074，t 值 7.250，修正 $R^2=0.479$ ）。这与科霍宁等人得出的结果相符。俄罗斯如果油价上升 1%，其实际汇率上

升 0.5%。这种弹性结果，表明石油与天然气产业的 GDP，占 GDP 的份额大约为 20%，同时也表明，“俄罗斯病”具有“荷兰病”相同的症状。

六、“俄罗斯病”与货币替代——油价变动与经济行为

油价与汇率对经济主体行为模式的影响，若去观察被称为美元化（dollarization）和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的现象，就会更加明了。首先，我们来考察成为背景的货币供应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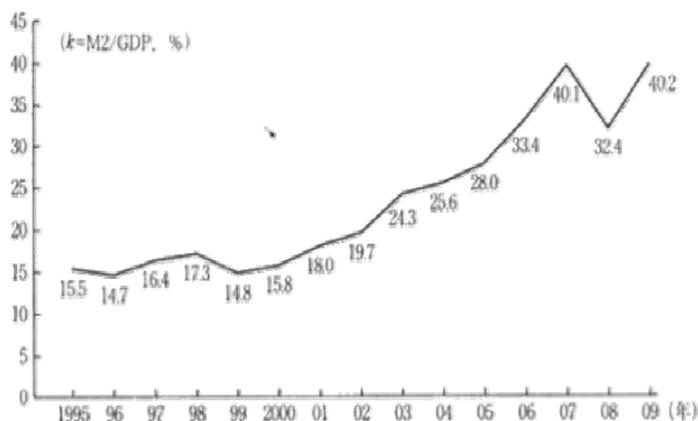


图 12 俄罗斯 Marshall 的 K 值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来自俄罗斯银行主页以及国家统计局主页的数据制作

图 12 所示为俄罗斯的 Marshall 的 K 值动向。1995 年的 K 值只有 15.5%。21 世纪由于经济好转，2007 年高达 40%。担心经济过热，2008 年形势一转，下跌了 8%。但在不景气的 2009 年又恢复到 40%。为了评价 40% 这个数字，通过表 5 对 2005 年 Marshall 的 K 值进行国际比较。日本和中国的 K 值为 150%，是基础货币美国 76% 的大约两倍。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和巴西的 K 值也比俄罗斯高出很多，都在 50% 以上。产油国沙特的 K 值相对较低，但也将近 50%。俄罗斯在 2005 年的 K 值只有 28%，在国际上是极低的。俄罗斯异常低的 K 值，表明俄罗斯银行只能掌控本国宏观经济的 15%–40%，而且经济领域的货币主动性并不充分。以下讨论的框架基于这种未成熟的货币

供应量状况。

表 5 Marshall 的 K 值的国际比较 (K=M2/GDP%)

日本	2005	142.0
美国	2005	75.8
中国	2005	150.0
印度	2005	66.7
巴西	2005	54.0
俄罗斯	2005	28.0
俄罗斯	2007	40.1
沙特阿拉伯	2005	46.5

资料来源：IFS、日本银行主页、俄罗斯银行主页。

经济的美元化与去美元化，可以通过观察占货币供应量的外币状况进行计量调查。一个有效的办法是，把外币存款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作为货币替代 (currency substitution) 指标来进行跟踪研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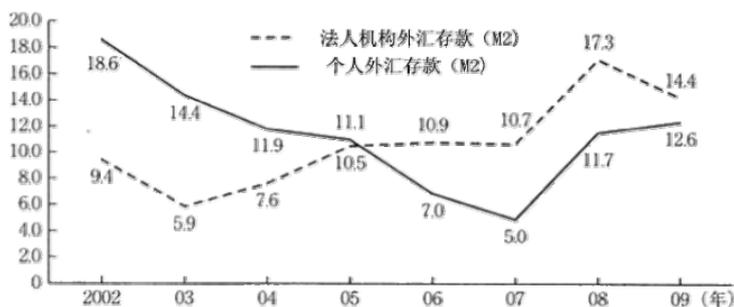


图 13 货币替代的演变——外汇存款对 M2 之比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银行主页数据自制。

图 13 表示法人机构与个人的外币存款占货币供应量比例的演变。如图所示，个人外汇存款比例自 2002 年到 2007 年由 19% 骤降到 5%，标志着去美元化的迹象。2008 年雷曼危机之后，美元化重新抬头。2009 年个人外汇存款比例略低于 13%，比以往的美元化状况略好。法人机构的外汇存款比例

^① 前期研究 Harrison and Vymyatnina 已有总结，但没有考虑油价的变动。参见 B. Harrison and Y. Vymyatnina, “Currency Substitution in a De-Dollarizing Economy: The Case of Russia”, *BOFIT Discussion Paper*, 3/2007. 俄罗斯银行集团最近的研究对油价变动有所提及，但没有导入分析体系。参见 A. A. Ponomarenko, A. Solovyeva and E. Vasilieva, “Financial Dollarization in Russi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imeo. Prepared for the Canceled Conference in April, 2010.

没有像个人那样明确显示出美元化现象。^①在个人存款去美元化发展的 2005—2007 年，法人机构的去美元化没有进展，外汇存款比例保持在 11% 左右。法人机构外汇存款比例在雷曼危机之后一跃超过 17%，2009 年也出现了高达 14% 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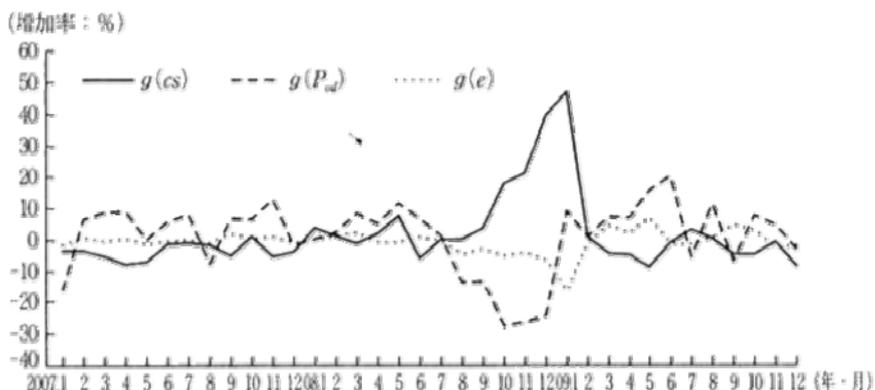


图 14 货币替代和原油价格与汇率——雷曼危机前后

接着，我们将试图找出引起这种个人货币替代现象的主要原因。

图 14 为去美元化发展的 2007 年 1 月到包括雷曼危机前后的 2009 年 12 月的通货替代（个人外汇存款占 M2 的比例）和汇率（美元/卢布）以及原油价格变动的月数据。可以明显看出，雷曼危机后的 2008 年 11 月和 12 月，对外币的货币替代急速上升。而且，货币替代的急升，导致了 2009 年 1 月汇率急跌。在货币替代急升与汇率急跌之前，原油市场价格出现了暴跌。而在货币替代现象结束之前，原油市场价格又率先恢复。因此，油价的变动同汇率一道，乃至根据不同的场合，对人们的货币替代行为造成了影响。即，油价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影响着个人的预测判断。这种假设可以得到验证。我们设定以下的基本回归方程。

$$g(cs) = \alpha_1 g(P_{oil}) - 1 + \alpha_2 g(P_{oil}) - 2 + \beta g(e) + \varepsilon$$

$g(x) = dx/x$ 表示变化率，CS=个人货币存款/M2， P_{oil} =油价（美元/桶）， e =汇率（美元/卢布）， α 、 β 为系数参数， ε 为误差项。

^① 多数企业在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等交易时，是在外币（美元等）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需作为主要因素加以考虑，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

在分析对象中，通胀几乎没有对预测判断发生作用，就此省略。利息在卢布存款和外汇存款中因为数据相同，也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形成要素。

上述的基本回归方程适用于 2007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的数据，得出表 6 所示的结果。当月的货币替代比例可以被当月的汇率变化率和上月、上上月的油价变化率的统计有效说明。汇率一下降，则通货替代就会前进。从作为先行指标的前两个月间的原油价格来看，如果认定油价有下跌倾向的话，通货替代就会向前推进。如之前所示，实际上，汇率油价的弹性是限定的，但是对于人们的汇率预想的形成，油价变动在心理上还是有比想象中更大的影响。因而油价就成了人们判断俄罗斯经济动向的基础数据。如上所述，在汇率之上再导入原油价格变动的话，通货替代现象便可得到合适的说明（仅凭汇率是不可能得到如此好的结果的）。

表 6 货币替代和汇率及原油价格（校正 $R^2=0.832$ ）

OLS	系数	t 值
原油价格变化率 (-1) α_1	-0.410**	(-4.454)
原油价格变化率 (-2) α_2	-0.219*	(-2.435)
汇率变化率 β	-1.537**	(-5.489)

** 为按照 1%的水准有效；* 为按照 5%的水准有效。备注：笔者推算值。

七、“俄罗斯病”的制度基础

如上所述，在俄罗斯，油价给经济增长、人们的预测判断和经济行为造成很大影响。原油依赖型经济不仅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北欧的挪威甚至比俄罗斯更加依赖原油。俄罗斯经济对于油价动向的过敏性反应，呈现出急涨急跌的态势，其中有制度性因素的作用。

图 15 显示了在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 (WGI) 中，金砖国家、日美、产油国（沙特和挪威）在法治 (rule of law) 指标（在-2.5—2.5 的评分内，分数越高法治水平越高）的时间系列数据图。根据该指标，俄罗斯 2008 年在世界 21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69 位，属于最低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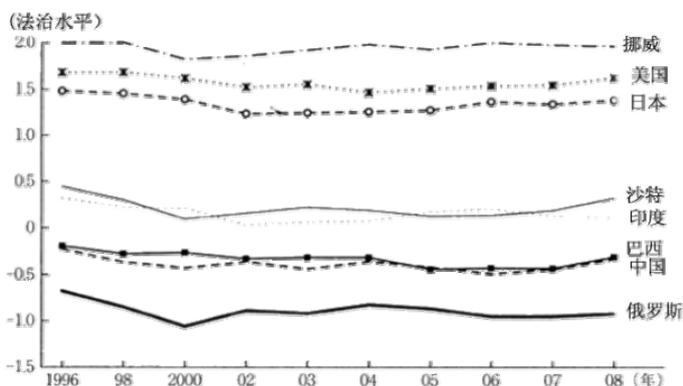


图 15 俄罗斯低下的法治水准

原油依赖型国家挪威的法治水平名列世界前茅。日美虽不如北欧高，但法治水平也相对较高。沙特和印度落后日美很远。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靠前的。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中国紧随其后，但之间也有较大差距，排名最后的是俄罗斯。1998 年危机时呈现低位，在景气时期的 2000 年达到最低值，之后略有改善，却没有改变排名落后的状况。俄罗斯法治水平明显呈现不变的和绝对的低位。

从图中可得出以下启示：第一，与挪威的原油依赖相比，无法明确说明俄罗斯落后的原因。第二，俄罗斯 1.4 亿的人口规模，与日美和中印的人口比较，也不能说明俄罗斯落后的原因。第三，从资源丰富和新兴国家这一层面，与金砖国家整体比较，同样无法说明俄罗斯落后的原因。作为世界上地理规模最大的国家，从日美和金砖国家的整体来看，这也不能成为一种有说服力的理由。俄罗斯从一个最强水平的法制管制（国家管制、国有制、军事国家体制）和经济管制（外币管制、贸易管制、竞争管制）国家快速变迁为自由化国家。俄罗斯如同在“改写世界史”般，将日本等国需要几十年完成的自由化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俄罗斯的经济也是前苏联解体之后形成的国民经济。因为没有资本，所以在国外的压力下，俄罗斯推行了半强制性的民营化。俄罗斯的这种特性与其法治水平低下有明显关系。再者，从进口管制导致的商品不足和外币管制导致的黑市美元中解放出来，结果由于偏好进口产品和外币（美元），使得人们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不是运用资本，而

是依靠权力、狡诈的手段成长起来的民营和非国有大企业，迄今仍处于二次国有化和二次民营化的过程。^①

作为制度背景，应该在考虑治理这些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货币“自由放任”的流动情况（包括国外进出）。人员的出入，受到签证的管制；物品的进出，有关税管制，然而货币的进出几乎没有管制。俄罗斯是后起国家，转型之初金融和证券市场就实现了电子交易。对于金融、外汇和证券交易，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制约。这种交易的自由和迅捷，对于国外货币进出有很大作用。^②沙特尚未开放外汇市场，国外货币的进出也受到伊斯兰金融管制。挪威的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受到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严格监管。只有俄罗斯的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虽然有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弱势介入，但基本处于自由放任的体制之下。受到政府庇护的大银行和企业可以在美元支付平台上维持着高额利息支付。

居民和非居民为了获得高收益而参与俄罗斯经济。在美元支付平台上能

① 二次国有化，包括垄断天然气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和石油资本尤科斯公司（Yukos）以及汽车大制造商瓦兹汽车制造厂（AvtoVAZ）。AvtoVAZ也是二次民营化的对象。挪威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基本上与现在的Gazprom同样，60%以上的股份属于国有企业（挪威统计局的调查）。挪威与俄罗斯在管理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管理模式不同。关于俄罗斯经济的制度分析，西村、盐原、岩崎、铃木等都已撰文。参见西村可明：『社会主義から資本主義へ——ソ連・東欧における市場化政策の展開』，日本評論社，1995；塩原俊彦：『現代ロシアの経済構造』，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4；『ロシア経済の真実』，東洋経済新報社，2005；「ロシアのレントと課税をめぐる諸問題」，『法政大学イノベーション・マネジメント研究センターワーキングペーパー』，（2005）No. 8；『ロシア資源産業の「内部」』，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05；「サハリン2プロジェクト問題の背景」，『世界』，（2007）1月号，岩波書店，pp.33-36；「ロシアの金融サービス業をめぐる現状分析」，『ロシアNIS調査月報』，第52卷，（2007）第2号，pp.1-28；『パイプラインの政治経済学——ネットワーク型インフラとエネルギー外交』，法政大学出版局，2007；「ガズプロム」，田畑伸一郎編，2008，pp.55-76；『「軍事大国」ロシアの虚実』，岩波書店，2009；岩崎一郎・鈴木拓：『比較経済分析——市場経済化と国家の役割』，ミネルウア書店，2010。此外，对于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分析，盛田、中兼的著作是必读书。参见盛田常夫：『ポスト社会主義の政治経済学』，日本評論社，2010；中兼和津次：『体制移行の政治経済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

② 关于自由放任的影响，本文受到上垣彰教授的启示。参见A. Uegaki，“International Finance of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in Crisis: Analysis of IIP Data”，Paper presented at ICCEES VIII World Congress, Stockholm, July 2010.

够轻松获得超过 7% 的高额利息的国家并不多。^①用外币保证高收益的原始资本是一种资源贸易，制度背景又是法治水平的绝对低下和金融证券市场的自由放任体制。由于法治水平低下，期待高投资、高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为了规避高风险，共同的信息源就是油价和汇率。油价与汇率如果下跌，为了规避风险，资金和存款就会出逃和替代；可是，油价和汇率持续上升，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样一来，俄罗斯经济的动向就对油价变动产生强烈的过敏反应，患上了“俄罗斯”病。

八、非正式经济与 GDP 统计

俄罗斯法治水平绝对低下这一制度特征，不仅对贸易活动而且对宏观经济的把握与分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统计本身的可靠性也会出现问题，下文将主要对第二部分提及的“非正式经济”进行概括。这里的“非正式经济”，与经合组织（OECD）的未观测经济（Non-Observed Economy）相同，意味着通过直接统计手法不能观测的经济活动。其分类如下：（1）合法生产体制的法人黑市经济活动；（2）不合法的经济活动；（3）未登记的非正式部门的经济活动；（4）最终为自家消费从事的家庭经济活动。关于上述不合法活动以外的三种非正式经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通过推算，努力将其涵盖于经济指标之内。

表 7 非正式经济的比例

	GDP 份额 (%)	支出 GDP(GDE) 份额 (%)
2002	24.9	
2003	24.0	
2004	19.3	
2005	17.6	16.4
2006	17.4	17.0
2007	17.0	16.5
平均	20.0	16.6

资料来源：NSR2009、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主页。支出方面是 CIS 统计委员会提供的资料。

表 7 所示为涵盖于正式 GDP 统计之内的非正式经济附加值的比例。非

① 根据阿尔法银行与莫斯科银行 2005-2010 的年度调查。

正式经济的 GDP 比例，大概占 20%。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非正式经济比例从 2002 年的 25% 降为 2007 年的 17%。非正式经济占支出 GDP（GDE）的份额略低于 GDP。

表 8 为按照正规统计的非正式进口和非正式雇佣者报酬（佣金）。非正式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例约为 12%（GDP 比例的 2.8%），同时可以看出，其比例从 1995 年的 14% 降为 2006 年的 9%。在非正式进口中，个人在国外购入商品在国内销售的倒爷贸易之繁荣，成为转型初期的一个话题。正式统计所涵盖的非正式进口，大部分是个人商业活动，占进口总额的 12%，数字可观，可与 2008 年顶峰时期进口 200 万台乘用车所占的比例相匹敌。非正式进口数额并没有按照部门进行分配。

表 8 非正式进口与非正式雇佣人员报酬（薪金）的比例（%）

	非正式进口		非正式雇佣者报酬	
	占进口总额之比	GDP 之比	占雇佣者报酬之比	GDP 之比
1995	14.4	3.7	23.2	10.5
1996	12.0	2.6	21.5	11.0
1997	11.1	2.5	22.4	11.5
1998	10.8	2.6	21.4	10.3
1999	12.6	3.3	27.2	10.9
2000	15.1	3.6	27.6	11.1
2001	12.1	2.9	25.8	11.1
2002	11.9	2.9	24.7	11.5
2003	10.9	2.6	24.0	11.3
2004	12.0	2.7	25.4	11.7
2005	10.6	2.3	26.9	11.8
2006	8.7	1.8	28.8	12.8
2007			28.8	10.4
2008			27.7	10.3
平均	11.8	2.8	25.4	11.2

资料来源：进口为产业关联表（Zatraty 各年版，NSR 各年版），租赁为 NSR 各年版。

表 8 中显示的非正式报酬，是根据家庭收入的报酬总额和企业报告报酬总额的差额计算得出的。非正式雇佣者报酬占雇佣者报酬总额的 25%、GDP 份额的 11%。虽说非正式雇佣者报酬在同时减少，但在经济景气时却从 2003 年的 24% 增加到 2007 年的 29%。按照国民经济计算，非正式雇佣者报酬是从各部门毛利润的合计中转移出来计算的。即，毛利润的一部分是非正式薪金，非正式报酬对 GDP 所得总额没有影响。但不能排除将非正式报酬作为

GDP 所得的正 α 要素来处理的可能性。表中还显示，非正式薪金的部门类别分配也没有进行。以上表明，非正式经济的比例占到 GDP 的 2 成，进口的 1 成，薪金的 2.5 成，比例相当大。

表 9 非正式经济不同部门的附加值比例与 GDP 比例

	2002 年				2007 年			
	各产业内附加值比 (%)			GDP 比例 (%)	各产业内附加值比 (%)			GDP 比例 (%)
		法人	个人			法人	个人	
A 农业、狩猎、林业	69.7	2.7	67.0	4.0	59.4	4.0	55.4	2.4
B 水产业	31.7	15.5	16.2	0.1	18.7	10.2	8.5	0.0
C 矿业	3.4	3.2	0.2	0.2	0.0	0.0	0.0	0.0
D 制造业	16.0	11.1	4.9	2.5	12.1	10.1	2.0	1.9
E 电、天然气、自来水	0.0	0.0	0.0	0.0	0.1	0.0	0.1	0.0
F 建筑业	30.5	21.6	8.9	1.5	19.3	9.8	9.5	1.0
G 商业	55.7	32.2	23.5	11.4	38.4	16.5	21.9	6.8
H 住宿、餐饮	37.6	18.3	19.3	0.3	49.4	25.1	24.3	0.4
I 运输、通信	13.8	8.9	4.9	1.3	10.8	6.3	4.5	0.9
J 金融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K 房地产、租赁	33.4	20.6	12.8	3.2	31.9	13.9	18.0	3.0
L 公务、防卫、社保强制险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M 教育	4.5	1.1	3.4	0.1	4.7	1.4	3.3	0.1
N 保健、社会服务	9.7	4.1	5.6	0.3	7.3	3.5	3.8	0.2
O 其他服务业	10.6	8.0	2.6	0.2	12.4	6.7	5.7	0.2
附加值（基本价格）	27.7	14.4	13.3	24.9	19.2	8.5	10.7	17.0
GDP（市场价格）	24.9	12.9	12.0		17.0	7.5	9.5	

资料来源：NSR2009、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主页。

表 9 显示，2002 年农业附加值覆盖率上升到 3 成（遗漏 7 成），商业是 4.5 成（遗漏 5.5 成），房地产和租赁是 7 成（遗漏 3 成）。覆盖遗漏分别占 GDP 之比为 4%、11% 和 3%。螃蟹秘密交易成为话题的水产业，其覆盖率为 7 成（遗漏 3 成），建筑业与其相同。农业的覆盖遗漏几乎都是个人行为（包括农庄的土豆生产）。商业覆盖遗漏一半以上是法人机构。2007 年的法人覆盖遗漏，商业、建筑业、房地产和租赁行业都在一半以下。这说明 2003 年以来通过联邦财政和税制改革，强化了联邦课税。结果是，商业的覆盖遗漏按照 GDP 的比例降到 7% 以下（3% 是法人）。商业法人机构的覆盖遗漏，从 GDP 之比来看，从 2002 年的 6.6% 增加到 2003 年的 7.4%，2004 年又骤

减到 3.4%。反映出 2003 年由于实地调查，强化了课税。房地产和租赁行业的个人非正式活动的覆盖遗漏，截至 2007 年都是激增，该部门的覆盖遗漏占 GDP 比例的 3%，与 2002 年相比没有变化。宾馆和饭店的覆盖遗漏，从 2002 年到 2007 年，法人活动与个人活动都在增加。

表 9 的特征是，资金集中的矿业（原油和天然气等）与金融业没有覆盖遗漏。矿业于 2002 年还有法人覆盖遗漏记录，到了 2007 年则为零记录。金融业没有覆盖遗漏。据俄罗斯统计，资源出口收入算入商业附加值，与资源出口相关的覆盖遗漏可以作为法人商业和法人运输的遗漏来掌握，不过，其覆盖遗漏推算额却没有显示。金融业在形式上是由俄罗斯银行完全掌握，因此也没有覆盖遗漏。在日本，许多不应该算作银行的银行机构和金融业务国际化产生了漏税行为，因此，很难理解金融业没有覆盖遗漏。俄罗斯制造业的覆盖遗漏，占 GDP 的比例为 2% 左右，超过 1/3 是法人造成的。电、天然气和自来水的覆盖遗漏几乎没有。

非正式经济在正式统计中的情况如上表所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只是名义基础的推算值，对于占 20% 比重的非正式经济的增长没有任何明示。因为名义比重大，非正式经济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大自不待言。特别是，非正式经济比重较大的商业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战略部门，在正式统计中已经有所体现。

关于增长的其他问题，对于国家统计局推算的非正式经济的规模会有种种疑问。随着国际化，俄罗斯企业家设立了许多外籍企业，可是，这类“外籍企业”的附加值源头是在俄罗斯境内产生的。无法完整覆盖这类多国籍企业的附加值。由于不能保证统计报告不用于其他目的（担心向税务署通报），也就不能保证企业报告的可靠性。而且，由于没有进行经济、工业以及商业等一系列的统计调查，因此推算精度只好通过有限的微观数据来确定。

如上所述，活跃的非正式经济并非在俄罗斯刚刚兴起。伯克利—杜克（Berkeley-Duke）通过美国移民面试调查表明，苏联时期的非正式经济比重已经很大。特列姆勒（V. Tremml）^①通过该调查得出，前苏联 1979 年的非正

^① V. Tremml, "A Study of Labor Inputs into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Berkeley-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1992, No.33.

式经济占 GDP 的 12%。阿列克谢耶夫 (M. Alexeev) 和派勒 (W. Pyle) 将其推算应用于 1989 年和 1995 年的俄罗斯。^①

表 10 阿列克谢耶夫和派勒的非正式经济估算

	1979	增长 (1979=100)	1989	
	份额 (%) = 基准时段水平		比较时段水平	份额 (%)
苏联				
非正式部门	12.0	<u>246.0</u>	<u>29.5</u>	21.7
正式部门	88.0	CIA 数据 121.0	106.5	78.3
总计	100.0	电力 136.0	136.0	100.0
	1989	增长 (1989=100)	1995	
俄罗斯				
非正式部门	18.0	<u>187.4</u>	<u>33.7</u>	45.6
正式部门	82.0	正式数据 49.1	40.3	54.4
总计	100.0	电力 74.0	74.0	100.0

备注：根据 Alexeev and Pyle (2003) 制作。画线部分的增长指数是笔者计算的数值。

如表 10 所示，首先，他们将 1979 年苏联的非正式经济在 GDP 中的份额作为推算起点。接着推算 1989 年苏联非正式经济占 GDP 的比例。将 CIA 的 GDP 增长推算 (1979-1989 粗增长率为 121%) 用于正式部门，将电力消费的粗增长率 136% 应用于同期整个经济的推算。以此来估算 1989 年的整体经济水平和正式经济水平，利用两者的差额，导出非正式经济在 GDP 中的份额为 21.7%。其后，考虑到苏联和俄罗斯的不同情况，将俄罗斯 1989 年非正式经济在 GDP 中的份额作为 18% 来计算。将正式 GDP 增长数据 (1989-1995 年粗增长率为 49.1%) 用于正式部门，再将电力消费粗增长率的 74% 用于估算同期整体经济的增长，以此推算 1995 年的整体经济水平和正式经济水平，利用两者的差额，得出非正式经济占 GDP 份额为 45.6%。

他们的结论是通过 1989 年的价格观察到的实际比率，但不能给出名义比率。电力消费指数表示真正 GDP 的规模。他们认为，正式 GDP 指数只能表示正式部门的 GDP 规模，而不包括非正式经济。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及修正后的正式 GDP 增长率已经包括非正式经济这一点。毕竟，电力消费带

^① M. Alexeev and W. Pyle, "A Note on Measuring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11, No.1, 2003, pp.153-175.

动 GDP 的真正增长，这一假定能否成立无法保证。特别是在苏联以及俄罗斯，当前的问题是非正式经济，不是采矿工业和重化学工业，是小规模的个人劳动和个人商业服务。它们不是电力消费的主体（笔者认为，与电力消费相关的问题是，轻视电力消费大的采矿工业的增长。我的问题意识与 Alexeev 等不同）。因此，利用电力消费指数和正式 GDP 指数的差额来推算非正式经济活动的规模并不恰当。当然，按照他们的方式，不能阐明 2000 年以来的电力消费和 GDP 增长间的逆转关系。

阿列克谢耶夫和派勒的论文虽然有上述缺点，但是指出了非正式经济规模推算的问题。实际上，根据 1991-1995 年 GDP 统计和国家统计局来把握非正式经济，重新来讨论研究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九、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

下面回顾一下近 20 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首先来看电力消费。电力消费量通过 kWh 计算，测量比较简单；关于供给源发电站的消费量，其覆盖遗漏可控制在最小限度，因此常用作评价 GDP 大小的尺度。实际上，重新评价转型时期 1991-1994 年 GDP 增长率的起点，也是电力消费量。即，GDP 增长率远低于电力消费量增加率，是很不真实的状态。世界银行和美国学者也持此见解。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但我要强调，与电力消费成比例的是采矿工业生产。^①赞同笔者的也有俄罗斯人，认为将 GDP 与电力消费直接联系的方法具有思考优势。^②

表 11 总括了 1990-2009 年的电力消费动向。图 16 是根据表 1 与表 11 来比较 GDP 增长与电力消费的动向。

1991-1994 年 GDP 修正后的结果显示，正式 GDP 的增长与电力消费指数接近。

① M. Kuboniwa and E. Gavrilin,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The Second Challenge*, Tokyo: Maruzen. 1997.

② Кузьмищев В. Чтобы поличить тройку, надо знать на пятерку//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4 Июля 1997 года, №127, С.2. 另可参见 M. Alexeev and W. Pyle, "A note on Measuring the Unofficial Econom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从转型时期的低迷、经济好转、陷入危机的 1991-1998 年来看，相对于 GDP 平均增长率减少近 7%，电力消费量平均增加率减少为 3.5%。近 10 年的特点是，GDP 增长反而高于电力消费的增长。经济景气时的 1999-2008 年，GDP 平均增长率近 7%，电力消费量平均增加率只有 2.4%。2009 年电力消费减少 4.4%，远低于 7.9% 的 GDP 增长率。这是否意味着夸大评价 GDP 的增长率？还是意味着推行节能的缘故？这些问题值得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景气时期 GDP 增长的原动力，不仅是电力消费大的制造业，电力消费小的商业等服务业也应该考虑在内。

表 11 俄罗斯的电力消费

	电力消费量 (100 万 kWh)	变化率 (%)	指数 (1990=100)
1990	1,073.8		100.0
1991	1,056.1	-1.7	98.3
1992	992.2	-6.1	92.4
1993	937.9	-5.5	87.3
1994	856.4	-8.7	79.8
1995	840.4	-1.9	78.3
1996	827.7	-1.5	77.1
1997	814.4	-1.6	75.8
1998	809.1	-0.7	75.3
1999	832.1	2.8	77.5
2000	863.7	3.8	80.4
2001	875.4	1.4	81.5
2002	878.2	0.3	81.8
2003	902.9	2.8	84.1
2004	924.2	2.4	86.1
2005	940.7	1.8	87.6
2006	980.0	4.2	91.3
2007	1,002.5	2.3	93.4
2008	1,022.7	2.0	95.2
2009	977.6	-4.4	91.0
1991-1998 平均值		-3.5	
1999-2008 平均值		2.4	
2000-2008 平均值		2.3	
1991-2009 平均值		-0.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RSE 各年版。2009 年电力消费来自经济发展部主页的数字。

关于电力消费和 GDP 增长率的关系，面临着一个新局面，值得研究的事项与以前完全不同。能源消费和 GDP 增长关系的课题很多。记忆犹新的是，雷曼危机之前，普京政府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将能源消费削减 40%。根

据笔者的调查，俄罗斯如果将能源消费削减 40%，可达到捷克 2007 年的标准，但远不及日美的节能标准。“石油诅咒”也表现在节能方面没有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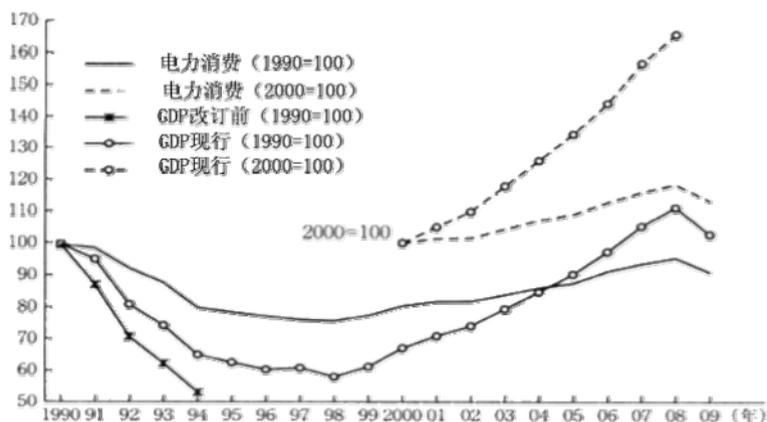


图 16 俄罗斯的 GDP 与电力消费。备注：参照表 1 和表 11

再来看一看与全球变暖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众所周知，前苏联和美国都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根据 IEA（国际能源机构）统计，1990 年世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 209.81 亿吨，其中，美国占 23.2%，前苏联占 17.4%。当时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排放量为 21.8 亿吨，占世界比例 10.4%。单从俄罗斯一国来看，其排放量要低于中国的 10.5%。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 GDP 与生产双双下降，给俄罗斯的增长方式留下很深的伤痕，挽救办法之一是依靠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防止全球变暖作出贡献。

表 12 是根据 IEA 和笔者推算的俄罗斯 20 年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图 17 表示 GDP 增长与二氧化碳的动态指数。从要素类别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的天然气正在替代煤炭和原油。1991-1998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增加率减少 5%，与 GDP 增长率减少 7% 相符合。景气时期的 1999-2008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增加率为 1.4%，远低于 GDP 增长率的 7%。经济顶峰时的 2008 年，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只有 1990 年的 76%。2009 年，由于经济低迷，制造业生产大幅下降，该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8.3%，与 GDP 增长率减少 7.9% 相近。

表 12 俄罗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CO ₂ 排放量 (10 万吨)				整体 变化 率(%)	CO ₂ 排放量 (1990=100)			
	煤炭	原油	天然 气			煤炭	原油	天然 气	
1990	2,179.9	688.2	625.4	866.3		100	100	100	100
1991	2,172.7	644.0	629.9	898.9	-0.3	100	94	101	104
1992	1,987.7	568.2	557.1	854.8	-8.5	91	83	89	99
1993	1,828.6	502.2	492.0	827.4	-8.0	84	73	79	96
1994	1,609.1	455.7	378.6	767.0	-12.0	74	66	61	89
1995	1,582.9	492.3	351.2	728.8	-1.6	73	72	56	84
1996	1,555.2	494.1	330.6	723.0	-1.8	71	72	53	83
1997	1,443.5	418.2	320.2	696.1	-7.2	66	61	51	80
1998	1,438.1	410.0	323.8	695.1	-0.4	66	60	52	80
1999	1,474.2	431.8	322.5	708.3	2.5	68	63	52	82
2000	1,513.8	449.7	332.4	718.1	2.7	69	65	53	83
2001	1,514.5	445.1	330.4	724.9	0.0	69	65	53	84
2002	1,504.7	439.0	320.2	730.8	-0.6	69	64	51	84
2003	1,540.0	441.9	320.2	766.4	2.3	71	64	51	88
2004	1,524.1	417.5	318.0	772.2	-1.0	70	61	51	89
2005	1,531.2	422.4	309.9	783.4	0.5	70	61	50	90
2006	1,587.2	444.6	321.0	804.5	3.7	73	65	51	93
2007	1,587.4	427.6	324.8	820.7	0.0	73	62	52	95
2008	1,646.3	468.8	342.8	834.7	3.7	76	68	55	96
2009	1,508.9	425.8	343.7	739.4	-8.3	69	62	55	85
1991-1998 平 均增长率(%)	-5.1	-6.3	-7.9	-2.7					
1999-2008 平 均增长率(%)	1.4	1.3	0.6	1.8					
2000-2008 平 均增长率(%)	1.2	0.9	0.7	1.8					
1991-2009 平 均增长率(%)	-1.9	-2.5	-3.1	-0.8					

资料来源: IEA, *CO₂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09 edition)

备注: 2008、2009 年的数据是笔者利用国际统计局主页、经济发展省主页的实物生产统计、进出口数据以及 2007 年排放系数所获得的推算值。

根据 IEA 统计, 在 2007 年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289.62 亿吨中, 美国占 20.8%, 中国占 19.9%。两国发电大量依靠煤炭。特别是美国, 煤炭生产是以地面采掘为主, 生产水平很高, 非常重视可采年数达 200 多年的国产

煤炭资源。

2007年俄罗斯的排放量是15.9亿吨，占世界比例为5.5%，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了一半。中国取代前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排放国家。如图17所示，俄罗斯景气时期的GDP几乎没有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而增长。可是，根据IEA的统计，以GDP（2000年美元）为单位计算，俄罗斯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3.91kg，不用说美国的0.5kg和世界平均水平的0.73kg，更是远超中国的2.52kg。这是因为1990年的俄罗斯能源效率非常低下。不管怎样，俄罗斯还是根据不谋求削减总排放量，而是作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排放剩余框架内的销售国家而登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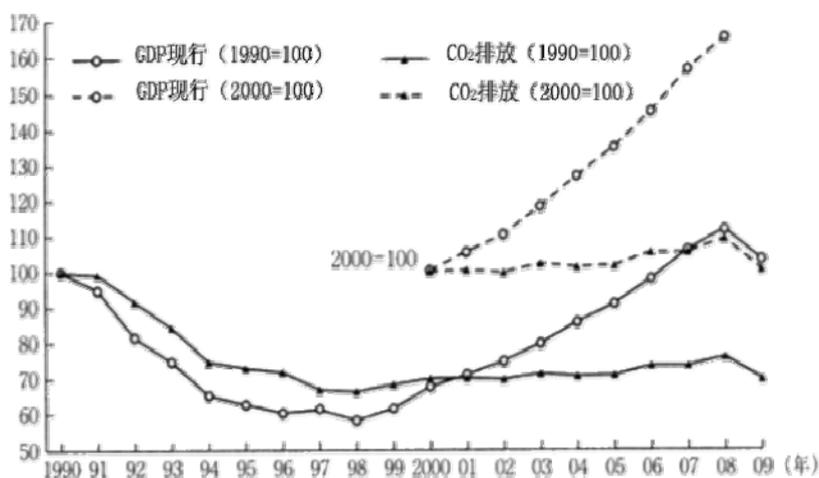


图17 俄罗斯对于防止全球变暖（消减CO₂）的贡献

2007年，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出口，占俄罗斯国内生产的比例分别为53%、29%和34%。GDP增长的动力不是增加国内原油和天然气的消费，而是出口。这也与国内二氧化碳的削减直接相关。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出口或向海外转移二氧化碳的排放。实际上，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来实现国内能源天然气化的德国，计划使二氧化碳排放源头实现天然气化，以此解

^① 参见上垣彰：『金融危機・石油価格下落下のロシア経済』，ロシア東欧学会報告論（秋田大学），2009，10月17日。

决国内环境问题。^①

十、支出项目分类的 GDP 增长——“俄罗斯病”与增长转型

对于处于转折点的俄罗斯经济来说，今后重要的课题不仅仅是提高法治水平等制度改革。下文通过分析支出方面 GDP 分类项目的增长，来总结“俄罗斯病”与增长转型的问题。

表 13 为景气时期俄罗斯的支出 GDP 的构成与增长的平均值。从各项构成比例来看，内需占 87%，外需占 13%，内需是压倒性的。在内需中，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的 GDP 比例）为 21%，最终消费比例为 66%。外需比例相对较小，因为出口比例高达 36%，而同期进口比例仅为 23%。贸易总额的 GDP 比例超过 50%，显示出俄罗斯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很大。

表 13 平均 GDP 的构成比例、增长率、贡献度
——支出项目类别 1998-2008 年平均值（%）

	构成比例	增长率	贡献度	贡献比例
最终消费	66.3	7.0	4.7	68.2
家庭	48.8	8.9	4.3	63.5
政府	16.6	2.2	0.4	5.2
非营利组织	0.9	-3.0	0.0	-0.4
总资本形成	20.8	15.3	3.2	46.5
总固定资本形成	18.4	12.3	2.3	33.1
库存增加	2.4	38.2	0.9	13.4
总出口	12.8	-6.7	-0.9	-12.6
出口	35.9	8.0	2.9	41.9
进口	-23.1	16.1	-3.7	-54.4
统计上的不一致	0.1		-0.1	-2.2
GDP	100.0	6.8	6.8	100.0

备注：本表由俄国家统计局、经济发展部提供资料制成。

从增长来看，内需的增长率为 9%，外需为-7%。内需中，投资增长率为 15%，大大高出 7%的最终消费增长率。关于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为 12%，可是库存增加的增长率超过其 3 倍，达 38%。实际进口增加

^① 良永康平：「ガス化するドイツ・ドイツの二酸化炭素排出事業」『産業連関』，第 13 卷，（2005）第 1 号，pp.3-15.

率为 16%，超过 8% 的实际出口增加率，因此外需、也就是纯出口的增长率为 -7%。名义贸易收支盈余与实际贸易收支赤字，构成了俄罗斯经济的特征。

根据构成比例与增长率估算的贡献度来看，内需是 7.8%，外需是 -0.9%。内需中，最终消费是 4.7%（贡献度 68%），高于投资的 3.2%（贡献度 47%）。外需或纯出口为 -0.9%（贡献度 -13%）。与出口 2.9% 的贡献度相比，进口的贡献度为 -3.7%，负面（消极）贡献较大。

从支出方面来看，内需主导、特别是家庭消费主导的增长显而易见，油价高涨带来的出口收益和汇率升值对增长的贡献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乍一看，俄罗斯经济好像处于内需主导的正常增长轨道上。值得注意的是，内需是由国内产品内需和进口产品内需构成的。俄罗斯因为大量进口，所以进口产品内需的比重高，其内需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而且，这种进口高增长为油价高涨导致的大量名义出口和交易获利所支撑。

最终消费和投资包含着进口，因此将它们贡献度扣除进口和中间进口部分，那么国内产品内需贡献度只有 4.1%。^①即使进口压力很大，但 GDP 增长率仍要保持在 7% 左右，那么国内产品的内需增长至少要超过 4% 的水平。进口的贡献度为 -1.5%，那么俄罗斯经济就有 9% 的高增长率。进口的贡献度由于进口替代的深化而降低，可是，如前所示，进口的增加与整个经济的增长一并发展，并以超过整体 GDP 增长的速度在发展。也即，单纯依靠减少进口来期待扩大增长率的情况，在俄罗斯的经济中是不存在的。俄罗斯经济还有一种特性应该注意，就是进口替代的深化（国内制造业增长带来的国内产品生产扩大）和超过国内生产的进口。这种相互矛盾的增长要素含藏于俄罗斯经济之中。从支出方面的贡献度来分析，进口增长的积极影响（内需高增长）和消极影响（外需负增长）同时并存。

图 18 为景气时期的 2007 年与低迷时期的 2009 年支出项目分类增长贡献度。2007 年贡献度高的项目，第 1 位是家庭消费——6.7%（增长率 13.9%），第 2 位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3.9%（增长率 21.1%），第 3 位是出口——

^① 严格地讲，原材料进口部分是外需扣除项目。可是在这里，原材料也从最终消费和投资总计中扣除。关于不扣除原材料进口的情况，请参见久保庭：「転換点のロシア経済成長——供給サイドと所得サイド」『経済研究』第 58 卷第 3 号（2007），pp.246-262。

2.1%（增长率 6.3%）。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率大幅高于家庭消费增长率，但是固定资本投资率却较低，只有 21%，因此对于贡献度来说，投资贡献度远低于家庭消费的贡献度。出口占名义项目 GDP 比例的 30%，高于投资，然而实际增加率却相对较低，要低于内需贡献度。政府消费与库存增加的贡献度都是 0.6%。进口贡献度是-5.6%，是拉低 GDP 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如上所述，进口增加是内需扩大的直接因素，并且拉动了 GDP 的增长。另外，设备和原材料进口的增加，起到了促进内需的国产商品生产和外需的（出口）商品生产的作用。进口增加的基础是名义出口规模的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汇率升值和交易获利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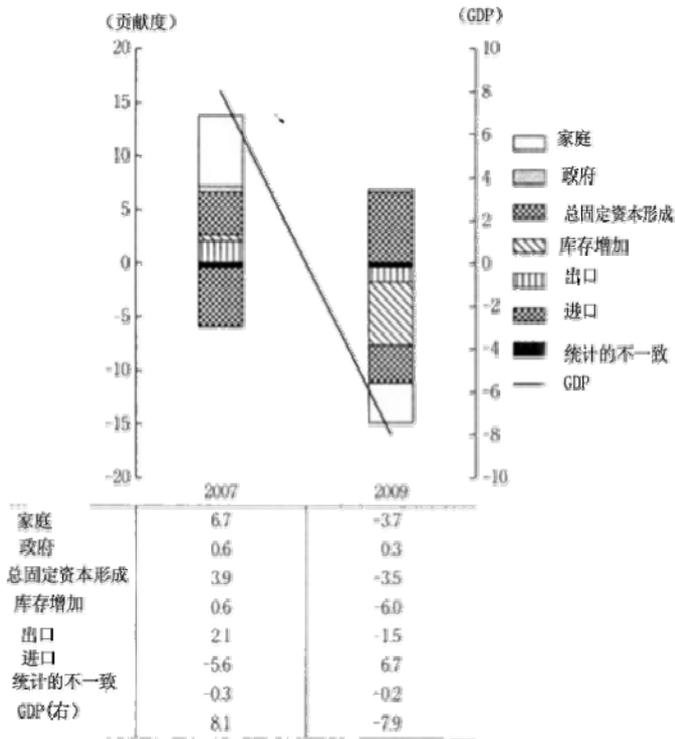


图 18 增长贡献度 (%) —— 2007 年与 2009 年

资料来源：参见表 13

同样，如图 18 所示，对于 2009 年极为低迷的 GDP 增长作出-7.9%的贡献度，第 1 位是库存增加，贡献度为-6.0%（增长率减少 186%）；第 2 位是

家庭消费，贡献度为-3.7%（增长率减少 7.7%）；第 3 位为是固定资本形成，贡献度为-3.5%（增长率减少 15.7%）；第 4 位是出口，贡献度为-1.5%（增长率减少 4.7%）。政府消费支出增加 2%，对于增长起到了作用，但其贡献度只增加 0.3%。与 GDP 增长率回落相应的是，进口也减少了 30.4%。因此，扣除项目进口的贡献度为 6.7%，对降低增长率起到了支撑作用。如上所述，进口下跌是内需减少的直接构成因素，并随着 GDP 增长的减缓而产生。另外，设备和原材料进口的减少，起到了降低内需的国产商品生产和外需的（出口）商品生产的作用。进口减少的基础是名义出口规模的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汇率贬值和交易获利的减少。

从支出方面来看，2009 年极为低迷的最大原因是库存增加（库存投资）的大幅度减少。库存投资对于俄罗斯的支出面来说，在景气快速升降方面起着巨大作用。图 19 为 1998 年财政与金融危机和 2000 年高增长时期的支出项目类别贡献度。对于 1998 年危机的 GDP 增长率减少 5.3% 的贡献度，第 1 位是库存增加贡献度减少 7.8%（增长率减少 134%），第 2 位是固定资本形成贡献度减少 1.9%（增长率减少 12.4%），第 3 位是家庭消费贡献度减少 1.8%（增长率减少 3.4%）。1998 年增长率降低，是在 1997 年增长率为 1.4% 之后的下降，所以不像 2009 年的低迷那样落差之大。另外，1997 年的家庭消费贡献度是 2%，固定资本投资贡献度只有 -1.4%，也看不出进口景气。尽管如此，库存投资降低的增长贡献度与 2009 年的低迷同样巨大。出口数量在 1998 年危机时略有增长，成为增长的积极因素。2009 年与 1998 年同样，随着 GDP 增长率的下降，进口创造了减少 17.4% 的记录。因此，1998 年扣除项目进口的贡献度也和 2009 年相同，是 4.7%，对降低增长率起到了支撑作用。1999 年增长率恢复到 6.4%，都是依靠外需（急剧的卢布贬值导致的进口减少和出口增加）。之后出现 2000 年 10% 的高增长率，如下图所示，一半以上是由于库存投资 5.6% 的贡献度造成的（增加 156%）。^①

图 20 是以 1995Q1-2010Q1 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表示消费、投资、出口和油价（乌拉尔原油价格）的动向。支出项目分类数字是笔者根据 X-12，

^① 数学上是减少 156%，可是 1999 年的库存增加的绝对值（1995 年价格显示）是负值，所以在经济学上是增加 156%。

将国家统计局的季度未调整数字（原数据）进行季度调整之后计算的结果。
 库存投资是根据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的余差计算得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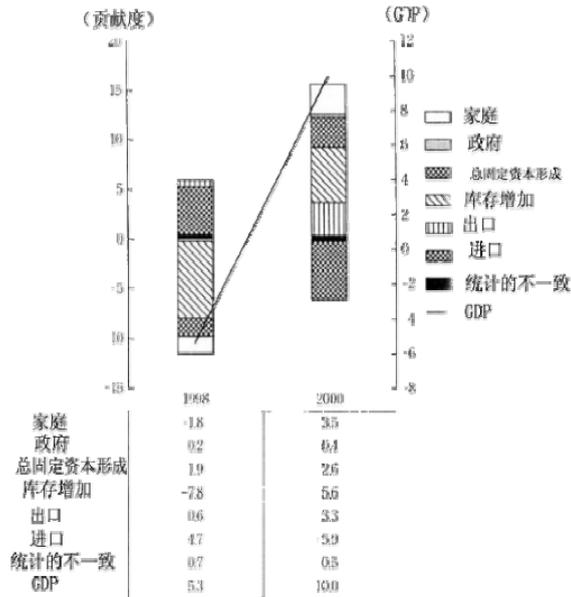


图 19 增长贡献度 (%) —— 1998 年与 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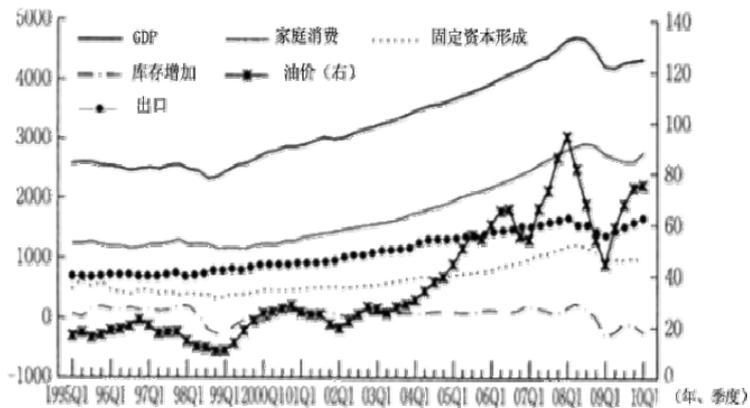


图 20 GDP 支出项目分类增长

如前所示，GDP 增长率在严重依赖油价变动的同时，也为外在的增长因素（替代生产）所支撑。这种关系当然可通过分类支出项目得到确认。求出各种变量的对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首先，关于家庭消费，各系数按照 1% 的水准，可得出下面的公式（补正 $R^2=0.935$ ，括弧内为 t 值）。

$$\text{家庭消费增长率} = 0.231 \times \text{油价增加率} + 0.96\% \text{ (趋势)}$$

(6.266) (7.485)

趋势 0.96% 表示年增加率为 3.9%。油价增加（减少）10%，会带来家庭消费增加（减少）2.3%。

关于政府消费，各系数按照 1% 水准，可得出下面的公式（补正 $R^2=0.960$ ）。

$$\text{政府消费增长率} = 0.032 \times \text{油价增加率} + 0.33\% \text{ (趋势)}$$

(4.430) (13.233)

外在增长趋势是年增加率 1.4%。油价增加（减少）10%，政府消费会增加（减少）0.3%。比起家庭消费来，政府消费的油价弹性特别低，而且外在 q3 增长因素也小。

非盈利组织相对家庭消费来说，与油价没有统计上的有效关系。

关于固定资本投资（形成），按照系数 1% 的水准，可得出以下公式（补正 $R^2=0.867$ ）。

$$\text{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 = 0.455 \times \text{油价增加率}$$

(9.395)

关于资本形成（投资）总额，按照系数 1% 的水准，以下公式成立（补正 $R^2=0.593$ ）。

$$\text{投资增长率} = 0.631 \times \text{油价增长率}$$

(19.760)

关于固定资本投资，设定趋势无效。关于资本形成（投资）总额，也不能设定正的有效趋势项。如果包含库存增加或库存投资的话，投资的油价弹性就会放大。库存增加时间的系列数据，因含有负值，所以根据对数变换来进行回归分析不适合。关于库存投资，正如年份统计那样，重要的是可以看

出，油价暴跌导致的生产与经济的迅速下降（上升）和库存投资的骤减（剧增）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关于出口，各系数按照 1%的水准，可得出以下公式（补正 $R^2=0.968$ ）。

出口增长率=0.119×油价增加率 + 1.33%（趋势）

$$(4.676) \quad (14.977)$$

季度的外在趋势为 1.3%，年化率就是 5.4%。关于出口的特点，虽说油价增（减）10%会带来出口增（减）1.2%，但油价弹性还是比较小，而外在增长率因素较大。原因是并不能看出油价上涨而造成原油和天然气出口数量的增加。

关于扣除项目的进口增长率，明显是由 GDP 增长率与实际汇率决定的。GDP 增长率与实际汇率高度依赖油价，因此进口增加率还是靠油价决定。进口增长率的油价弹性为 0.588，外在趋势为 0.80%（年化率 3.2%），远比出口对油价的依存度更高。为了提高消费和投资增长率，进口增长率也起到作用，但仍要从支出 GDP 中扣除。

综合以上分类支出项目的结果，可以看出 GDP 增长率与油价变动的关系。任何一个支出项目都受到油价变动的很大影响，而且，外在的替代生产在家庭收支和出口需求生产方面都较大。关于固定资产投资（设备投资与建设投资），即使没有替代生产的支持，也与油价变动有着联动性（设备投资高度依赖进口，但是建筑业在非贸易财政上是以国内生产为主，因此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大于设备投资）。

消费与投资的增长率都与 GDP 增长率呈现很高的比例关系。关于家庭消费，系数按照 1%的水准，可得出下面的公式（补正 $R^2=0.970$ ）。外在趋势设定无效。GDP 增长率每增加 1%，会带来 1.4%的消费增加。或者说，家庭消费增加 10%，对 GDP 增长率就会产生 7.3%的贡献。

家庭消费增长率=1.377×GDP 增长率

$$(44.290)$$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系数按照 1%的水准，下面的公式成立（补正 $R^2=0.920$ ）。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554 ×GDP 增长率

$$(26.331)$$

我们看不到正效应的外在趋势。GDP 增长率增加 1%，投资就会增加 1.6%。或者说，固定资本投资增加 10%，对 GDP 增长率就会产生 6.4% 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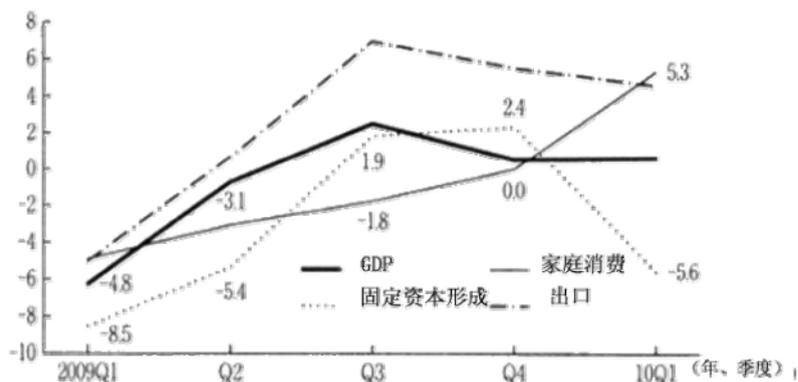


图 21 “雷曼危机”之后的恢复——同期增长率 (%)

下面从支出方面讨论一下俄罗斯经济从 2009 年低迷中的恢复状况。如图 21 所示，固定资本投资与出口的恢复性增长对 2009 年第三季度的恢复贡献很大（库存投资虽说是负值，但也有若干改善）。固定资本投资在同年第 4 季度持续增加，但是消费增长缓慢，库存投资恶化，再加上进口扩大，恢复仍处于低迷状态。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局与其他调研机构都期待 2010 年第 1 季度景气得到恢复，消费虽然剧增，但此次固定资本投资却低于 6%，拖了恢复的后腿（库存投资也恶化）。然而，家庭消费增加 5%，这不是在增加进口，而是在进口减少 3% 的背景下产生的。

最后，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是投资率问题。俄罗斯经历过苏联时期的高投资率和投资主导的发展道路。可是，苏联时期投资的多数成果如今已是老化陈旧，需要通过增加投资来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社会的生产基础、基础设施的重建也是当务之急。

图 22 对于投资率与经济发展水准（人均美元 GDP）的关系做了国际比较。中国和印度的投资率很高，俄罗斯、沙特、巴西的投资率在 20% 左右，发达国家日美德和挪威的投资率也处于同样水平。中印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走高投资率的增长道路非常自然。中印这一集团还包括越南和缅甸。问

题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日美德和挪威的俄罗斯与巴西来说，保持着与发达国家同等程度的投资率是否合适。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扩大投资率必不可少。俄罗斯虽然经历过苏联时期的高积累，然而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追赶，必须在新体制下一切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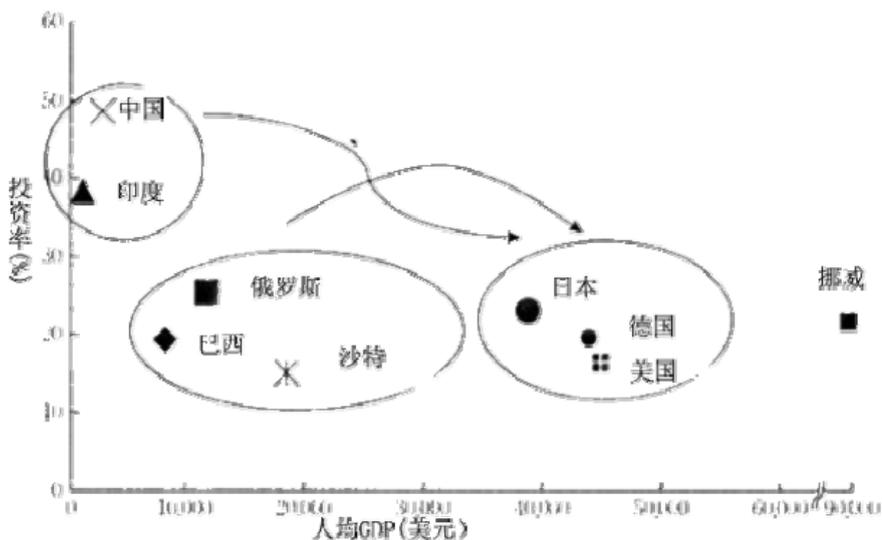


图 22 投资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2008 年

俄罗斯经济在油价高涨中实现了高增长，正面临着增长的转折点。2008 年下半年油价暴跌之后，其经济一度有过恢复的迹象，但迄今仍处于转折点上。虽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转型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经济的结构改革，但仍然形成了对油价变动过度反应的“俄罗斯病”。俄罗斯不依赖外部市场的技术立国和经济多样化（全方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多样化构想本身也陷入只有油价升值才会实现的两难困境之中。

“俄罗斯病”是一种“石油魔咒”综合症，但它与“荷兰病”不同。“荷兰病”可以按照石油价格高涨→实际汇率升值→进口扩大、GDP 增长率递减、制造业低迷、服务业肥大化这种路径来理解。俄罗斯虽然也经历了石油价格高涨→实际汇率升值→进口扩大的路径，却没有出现 GDP 增长率递减和制造业增长低迷的情况。进口扩大与 GDP 高增长同时出现。制造业的增

长是在油价上涨之后才出现的。正如奥梅斯和卡尔切娃所述，服务业也只能与其他非产油国保持同等发展的程度。之所以没有看到 GDP 增长率递减与制造业的衰退，是因为俄罗斯的国内市场大于荷兰，而且制造业发展缓慢的缘故。除了石油制品和资源相关的金属制品以及战斗机等武器之外，俄罗斯制造业的主要市场，包括境内的外资生产，都是国内市场，根本没有面向海外市场（对 CIS 的出口另当别论）。在这种状况下，因为卢布走高导致出口收益下降，GDP 增长率递减和制造业衰退才没有立即显现。当然，如果国际市场行情好，卢布走高对主要出口商品原油和天然气的收益影响不大。^①

俄罗斯经济迎来了增长的转折点，正在受着不同于“荷兰病”的“俄罗斯病”的折磨。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正被“石油魔咒”全面包围。“俄罗斯病”与“荷兰病”不同，不仅有负面影响（罪），还有正面影响（功）。21 世纪初的油价高涨，为俄罗斯带来了“增长与革新的 10 年”。这与 1970 年代的油价高涨时期前苏联·俄罗斯“停滞的 10 年”绝对不同。从中长期来看，无法预测油价一直下跌，因此，无论是俄罗斯的国内居住者（政府、企业和国民）还是国外居住者，都期待着在油价疲软的状态下走稳定增长的道路，在油价景气的环境下再重新实现高增长。我们不能期待有完全治好“俄罗斯病”的特效药，而有效地利用资源利益来推动经济是俄罗斯当前的现实选择。高增长、高投资、高消费等方式，在等待油价升值的阶段，大幅提高投资率，向更新的阶段进行飞跃性的转型不是不可能，但却极为困难。俄罗斯以“推翻世界史”的状态快速实现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但要重新构建文化背景和制造业的基础之后，再来推进经济发展，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李婷 阎德学 译）

【 Abstract 】 Russian economy once achieved high growth with skyrocketing oil prices. However, after the sharp drop in oil prices in 2008, Russia has faced a turning point in its economic growth. Although Russian economic transition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market economy

^① 在俄罗斯，像日德那样由于汇率增价出口收益减少作为新闻而被特写的镜头是几乎没有的。

structural reforms, still it has overreacted to changes in oil prices. Russian resource-dependent economy at the mercy of changes in oil prices can be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Russian disease”. In fact, this is a kind of “oil curse” syndrome,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Dutch disease”. Though Russia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ath as: rising oil prices → appreciation of real exchange rates → expanded imports, still there has not appeared a phenomenon of diminishing GDP growth and downturn in manufacturing growth. Russian domestic market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Netherlands and 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so develops slowly. We can not expect to have specific remedies for “Russian disease” while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to promot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would be Russia’s realistic choice. Russia has achieved an open market economy at the speed of “overthrowing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however, it still takes time to develop economy after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manufacturing base.

【 Key Words 】 Petroleum, Russian economy, turning point, Russian Disease, Dutch Disease

【 Аннотация 】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из-за быстрого роста цен на нефть также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взлетела вверх, но после падения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в 2008 году Россия переживает переломный момент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ост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ся серией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реформ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они всё же чрезмерно остро реагируют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цен на нефть.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зависящая от изменений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и ресурсов может быть назва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болезнью». Это по сути, своего рода синдром «нефтяного проклятия», но он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голландской болезни». Хотя Россия пережила бурный рост цен на нефть → рост реального курса валют →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расширения импорта, но не наблюдалось уменьшения темпов роста ВВП и спада роста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внутренний рынок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 чем в Нидерландах, и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едленно. Мы не можем ожидать появл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и «лекарств» для излеч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болезни», реальным выбором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эффектив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в целях содейств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я со скоростью «свержения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достигла уровня открытой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однако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 после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базы ещё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ефть,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поворотный момент, россий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голландская болезнь

(责任编辑 常喆)

浅析俄罗斯新税制 ——石油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夏启明 刘贵洲**

【内容提要】石油行业在俄罗斯产业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石油行业的税收收入是俄联邦财政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俄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石油企业经过多次博弈，对原油、成品油中轻油和重油税率进行了修改，旨在寻求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与石油企业的投资收益之间的最佳平衡，在国家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与石油行业健康发展之间找到最好办法。进行海外油气合作、实施海外并购，一国的财税制度甚为重要。对“走出去”的中国油气公司、企业而言，了解和掌握俄罗斯新税制的通过、实施及其将产生何种影响甚为关键。

【关键词】俄罗斯 新税制 原油 重油 轻油 关税税率

【中图分类号】F810.422(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1-0092-(14)

一、新税制改革历程

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讨论，俄联邦政府最终同意对原油和成品油^①出口关

* 衷心感谢《俄罗斯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中肯意见和修改建议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 夏启明，法学博士，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俄合作项目组；刘贵洲，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俄合作项目组。

① 国内成品油一般划分为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润滑油。根据俄罗斯海关对成品油出口数量及总价统计时只统计了成品油中汽油、柴油和燃料油三种油品。在讨论俄罗斯成品油与原油出口关税的论文以及相关咨询报告时，一般把成油品种又分为 светлые и тёмные 两大类，即轻油和重油。其中轻油包括：бензин（汽油）、дизтопливо（柴油）、керосин（煤油），而重油包括 мазут（燃料油）等。

税税率实施新税制：60-66^①，汽油出口关税税率的改革也是新税制中的一部分，决定保留从 2011 年 5 月 1 日起确定的汽油出口关税税率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 90%。因此，俄罗斯对原油、成品油的新税制改革应当是：60-66-90。俄总理已签署政府令，新税制于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

有关原油与成品油以及成品油中轻油和重油出口关税税率的问题，俄联邦相关政府部门、大型油企公司的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博弈从未停止过。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俄罗斯联邦税务当局为了解决俄罗斯油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而规避纳税的情况下于 2002 年 2 月将原油出口关税修改为从量计征并反映国际市场上乌拉尔原油价格的变化，这种税制的确定使俄罗斯建立起了油气价格上涨自动带动税收收入增加的机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使得俄罗斯政府来自原油的税收收入则增加，原油价格上涨越高，俄罗斯政府的税收收入则越多。这种原油出口关税税制的确立是俄罗斯体制转型 10 余年来不断摸索而建立起来的。^②

2006 年前后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涨的背景下^③，俄罗斯国内成品油价格飞速上涨，2004-2005 年汽油涨价约 34.16%，柴油涨价约 60.22%。当俄罗斯国内原油价格上涨速度超过国际市场时，会引起俄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从而对俄罗斯整个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其表现为加剧了通货膨胀、企业竞争力下降。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不管是学界、政界、商界均一致认为俄罗斯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属于系统性原因，不仅涉及石油行业本身的特点，而且也涉及石油行业的国家政策。于是，俄罗斯对石油产业进行了调整，其中就包括采取措施稳定成品油价格，对成品油出口关税进行改革，通过了两项基本决议：一是把成品油分成重油和轻油，并把这两类称之为“出口一

① “60-66”的具体含义是：原油出口关税从以前的 65%下降到 60%，而成品油的出口关税从目前为原油出口关税的 55%提高到原油出口关税的 66%（该税率为成品油中轻油和重油出口关税税率的平均值，在改革前轻油出口关税税率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 70.7%，重油出口关税税率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 38.1%。需要说明的是，构成轻油类的几种具体油品出口关税税率均不相同，比如轻油中的汽油出口关税为原油出口关税的 90%。这里所说的 55%或者 66%都是取其平均值）。

② [日] 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第 3 期，第 45 页。

③ 1998 年 12 月初时世界原油市场中乌拉尔原油价格为每桶 9 美元，而 2006 年初乌拉尔原油均价已突破每桶 58.23 美元，2006 年的原油价格相当于 1998 年的 6 倍之多。

篮子”而根据专门的公式分别进行计税。二是启用专门委员会确定长期的和可预测的计税机制来代替对石油公司而言不是很明确的出口关税计算方式^②。当时轻油和重油出口关税税率相差就比较大，重油出口关税税率比轻油出口关税税率低一半左右。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俄罗斯国内很多石油公司认为原油、成品油的出口关税过高，赋税负担过重已严重影响到石油企业的生产和再投资，俄政府为了防止石油产业的萎靡，2008年秋曾通过特别程序改变了原油出口关税税率。虽然降低石油行业税负的措施非常多，但不成系统。不论是石油企业，还是俄联邦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对联邦政府加大对出口关税税制改革的呼声比较高。

如何为石油企业界定适当的、合适的税负的讨论，在俄罗斯的税制改革中也一直是热点问题。针对原油出口关税以及成品油出口关税税率，俄罗斯政府一直在进行微调。这种微调自2010年以来还颇为频繁。

2010年12月27日俄联邦政府通过第1155号政府令，明确规定了成品油出口适用的税率计算公式是： $C_{TII} = K \times C_{TI}$ ，其中 C_{TII} 即是成品油的出口关税税率， C_{TI} 是原油出口关税税率， K 为一个系数。对汽油、柴油、煤油这类轻油， K 在2011年时为0.67，2012年为0.64，2013年为0.60。而燃料油这类重油， K 在2011年时为0.467，2012年为0.529，2013年为0.60。即，该政府令对成品油出口关税税率到2013年时统一规定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0.60，在此之前，轻油和重油的出口关税还是分别适用不同的关税税率。

2011年4月25日俄联邦政府通过第311号政府令，明确了石油出口关税为每吨453.7美元，汽油出口关税为每吨304美元，燃料油出口关税为每吨211.8美元。通过计算可知，汽油出口关税税率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0.67，燃料油出口关税税率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0.467。这与2010年12月27日政府令中规定的 K 这一系数是相同的，只不过2010年12月27日政

^②Миронова Т.А.Налог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цены на нефть 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ы// Развит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баз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ФС РФ.-2006.-№12(300)

府令规定了K这个系数是多少，而2011年4月25日政府令规定的是具体的税款金额，即前者规定的是税率，后者则明确了具体的税费。

但仅过了3天，2011年4月28日，俄联邦政府通过第329号政府令，明确规定汽油出口关税为每吨408.3美元，这相当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0.90。该政府令的出台开启了单设汽油出口关税税率的一个时代，使得轻油类中的汽油关税税率从此与柴油、煤油等执行不同税率。

2011年8月26日，俄联邦政府又通过了第716号政府令，对2010年12月27日政府令的规定进行了重大修改，明确规定了从2011年10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汽油出口关税税率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0.90，柴油和煤油出口关税税率为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0.66，燃料油的出口关税税率为0.66。从2015年1月1日起，汽油、柴油、煤油的出口关税税率与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税率相同，保持不变，但燃料油的出口关税税率从2015年1月1日起将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相同。

税收乃一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宏观层面来说，对一国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平稳运行以及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起着重要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说，对企业的经营策略以及业绩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一国税制的调整不仅涉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权力的重新界定，而且也涉及一国财政权与企业财产权、企业股东财产权以及公民个人财产权之间的重新分配。“熊彼特、希克斯、诺斯等著名经济学家通过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都认为政府的财政压力是产生社会变革的直接原因。”^①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税制的改革来促进原油、成品油炼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原油的深加工能力，提高石油行业的经济附加值，以此达到石油行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增加其财政预算收入。

新税制的实施将对俄罗斯原油和成品油出口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将对俄罗斯石油开采等上游业务以及中俄上游的能源合作产生影响。

① 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二、石油行业的税收收入：俄联邦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石油企业需向联邦政府缴纳的税种主要有三个：矿产资源税、增值税和出口关税，“从 2004 年起，出口关税和矿产资源税成为油气收入的两大源泉，2005 年仅是原油的矿产资源税和出口关税收入就占油气总收入的 65% 和政府收入总额的 19%。”^①据统计，在 2009 年前三季度俄联邦财政预算收入中，出口关税占 23%，增值税占 22%，矿产资源税占 10%。（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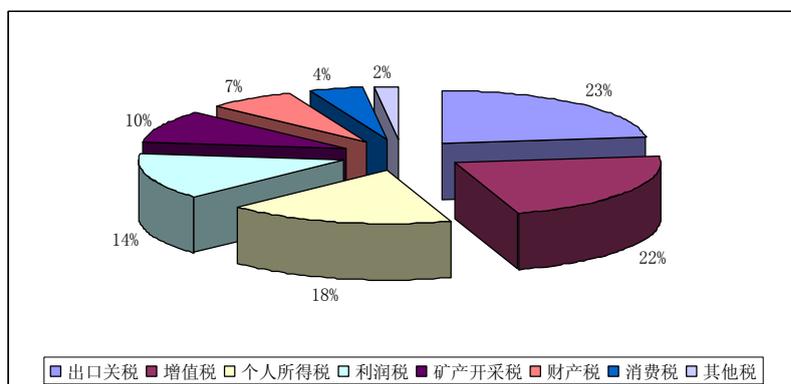


图 1、2009 年前三季度俄联邦财政预算收入比例图

资料来源：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 剑桥能源 2009 年为某油气企业所做报告；Налоговый режи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отрасли: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сохраняется（俄罗斯石油行业新税制：需要不断进行改革）（未公开出版）

“2009 年，俄罗斯石油行业向俄联邦政府缴纳的矿产资源税和出口关税合计占政府收入的 34%。”^②2010 年 10 月 28 日在新古比雪夫斯克召开的讨论“2020 年前石油行业发展总体纲要草案”的会议上，能源部部长什马特科在报告中指出，“石油行业为 2010 年俄联邦财政预算收入做出了巨大

① [日] 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第 3 期，第 45 页。

② 岳小文：“‘俄罗斯 2020 年前石油行业发展总体纲要’草案概述”，《国际石油经济》，2010 第 11 期，第 6 页。

贡献（约占 44%）。”^①

表 1 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税收收入

俄联邦预算收入	资金（百万.卢布）		
	2009 年	2010 年	2010 年
	实际	预算	期望
总收入	7 337 751	7 783 778	7 874 952
占收入比例	34%	44%	44%
石油税收收入	2 469 439	3 397 471	3 438 877
矿产资源开采税	887 631	1 222 546	1 239 322
出口关税，其中：	1 581 808	2 174 925	2 199 555
1、原油出口关税	1 202 994	1 616 566	1 638 247
2、成品油出口关税	378 814	558 359	561 308

资料来源：什马特科（Шматко С.И.）2010 年 10 月 28 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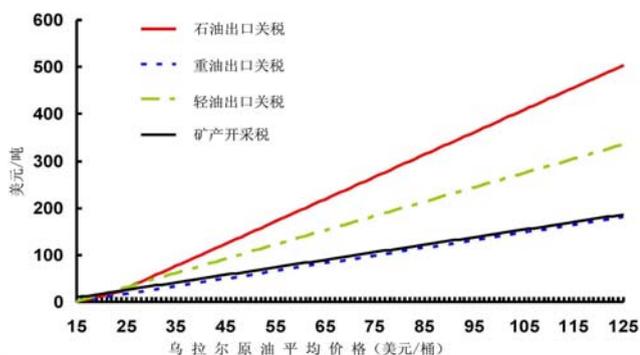


图 2、俄联邦原油以及成品油中轻油、重油出口关税与矿产资源税的关系

资料来源：同图 1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确立的原油或成品油价格上升自动带动出

^① Шматко С.И. Доклад по вопросу Генеральной сх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нефтяной отрасл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28 октября 2010 года), 参见 minenergo.gov.ru/upload/.../6e8da40ca500782d70924ec59304bfe0.doc。2011 年 12 月 4 日访问。

口关税收入增加的机制，使得俄罗斯原油出口关税最高税率可达 65%^①，矿产资源开采税最高税率可达 22%，即“当乌拉尔原油价格超过每桶 25 美元时，价格上升额度的 87% 通过出口关税和矿产资源税被纳入政府收入。”^②根据俄联邦《关税法》第 3 条“关税税率及确定程序”第 4 款之规定，当监测的地中海和鹿特丹世界原油市场的原油均价^③超过每吨 182.5 美元（每桶 25 美元）时，石油关税核算公式为每吨 29.2 美元加上每吨监测价格同 182.5 美元之差的 65%。

在当时，65% 的出口关税税率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 2000 年 3 月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前，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经济一直低迷不前，似乎正在走向破产的边缘，“但 2000 年后世界石油价格开始不断攀升，石油价格的上涨带来国家税收收入的不断增加。从 2004 年起出口关税和矿产资源税成为油气收入的两大源泉。”^④俄罗斯也以此收入设立了“稳定基金”，以应对原油价格下降而导致的收入减少。但 2008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巨大，仅在 2008 年 5 月至 10 月间，莫斯科股市就缩水了将近 80%^⑤，俄罗斯大型石油企业也不例外。在此情况下，越发暴露出原油出口关税的高税率对俄罗斯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俄罗斯原油出口关税按以前的税制征收 65% 的税率相对来说还是非常。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限制对俄罗斯石油企业的投资，并且影响石油开采量的增长，俄罗斯石油行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80% 的生产储量位于已经开发成熟的区块中，新区块仅占 20%，而吸引石油企业和投资者进行新区块

① 65% 的出口关税税率是否过高，可以与同为前苏联地区的产油国哈萨克斯坦比较。2011 年 1 月，哈萨克斯坦提高原油出口关税，将原油出口关税由每吨 20 美元提升至 40 美元，7 月份时将成品油出口关税提高 16.2%；9 月份再次提高成品油关税，轻油和重油的出口关税分别从此前每吨 114.05 美元和 76.03 美元提高到每吨 143.54 美元和 95.69 美元。由此看出，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出口关税税率比俄罗斯原油出口关税税率低很多。

② Tabata Shiichiro, “Price Differences, Taxes, and the Stabilization Fund”, Michael Ellman(ed.), *Russia's Oil and Natural Gas: Bonanza or Curse?*, pp.35-53, London, Anthem, 2006. 转引自[日] 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第 45 页。

③ 此处原油均价指的是乌拉尔原油价格。

④ [日] 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第 45 页。

⑤ 参见 <http://www.rts.ru/en/index/stat/dailyhistory.html?code=RTSII>, 转引自[瑞典]斯蒂芬·赫德兰：“危机中的俄罗斯：一个超级能源大国的终结”，《俄罗斯研究》，2010 第 2 期，第 58 页。

的开发需要在勘探前投入巨大的资金。在现有税制下，对 90%的新区块开采以及 30%已开发区块来说，是无利润可言的。这对俄罗斯政府提出的 2020 年前将年产量稳定在 5 亿吨左右的目标是有冲突的。石油行业的停滞不前，势必影响到几乎占俄罗斯联邦财政预算收入半壁江山的石油行业的税收收入，这也势必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对现有税制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三、新税制的制定：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在新税制制定前，关于石油行业的征税问题，俄罗斯能源部、经济发展部、财政部、地区发展部以及自然资源部之间的意见一直就没有统一过。能源部极力主张降低原油出口关税，而以财政部为首的部门为了国家预算收入而坚决反对降低原油出口关税。除了这些政府部门之间的意见不统一外，大型的石油企业常常也以降低石油开采量来对抗反对降低原油出口关税以及取消税收优惠的政府机关。^①

为提高俄罗斯原油产量，弥补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传统的西西伯利亚老油田的减产，俄罗斯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石油上游市场的投资开发，加大了对东西伯利亚地区的投资。众所周知，东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地质、气候等条件相对比较恶劣，油田的前期投资金额巨大，需要政府更多的扶持，因此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必然的。2009 年 1 月，俄罗斯对石油行业中的矿产资源税实施了新措施，在規定从每桶 9 美元（相当每吨约 65.7 美元）提高到每桶 15 美元（相当每吨约 109.5 美元）的同时，对新区块矿产资源开采税实施优惠政策，对萨哈—雅库特、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① 2011 年 3 月份时，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简称“俄油”）要求延长其旗下位于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巨型主力油田万科尔油田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表示，从今年 5 月 1 日起将取消税收优惠政策。对此，俄油决定降低万科尔油田的开采量，从 2011 年的 1700 万吨下降到 1480 万吨。俄油总裁胡代纳托夫曾明确表示，只有在保持税收优惠的条件下，该油田 2014 年前才可能达到年产 2500 万吨的目标。俄油的这一决定也可以看作是俄油对财政部提出取消该油田税收优惠政策的反应。参见 <http://www.cnpc.com.cn/ypxx/hyzx/gjzx/俄罗斯石油公司降低万科尔油田计划开采量.htm>（2011 年 4 月 14 日访问。）

北极圈、大陆架、黑海和亚速海地区、涅涅茨、亚马尔半岛等地区实施开采税率为零的措施，并且将享受税收假期生效的区块数量增加。该措施的实施按俄罗斯原财政部部长库德林的估算，石油企业向政府缴纳的税收支付每年减少达 1000 亿卢布（约合 37 亿美元）。但石油企业认为政府在矿产资源税方面的让步还不够，2009 年 4 月，石油公司向政府建议，提高矿产资源税的起征点，并且要求降低出口关税税率。

2009 年 12 月，俄罗斯政府决定免征东西伯利亚 13 个油田的石油出口关税。13 个区块零关税政策导致俄罗斯联邦财政预算收入减少了 1300 亿卢布。此后，享受免税的油田数量增加到了 22 个。财政部反对以任何形式降低出口关税，原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要求重新研究该优惠政策，他认为东西伯利亚这些油气田的开采应该是盈利的，未来的关税税率及关税整体架构都应该在油气田盈利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俄罗斯各大石油公司针对库德林的提议作出的回应是威胁政府：如果取消出口关税免税政策，他们将停止在东西伯利亚的所有项目。而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能源部极力赞成保留东西伯利亚石油出口关税优惠税率的政策。后来俄联邦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谢钦 (Igor Ivanovich Sechin) 向财政部保证，将从其他渠道为 2010 年的财政预算收入提供 1200 亿卢布。但俄财政部认为，随着东西伯利亚油田运营的日渐成熟和完善，同时随着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原油出口形势明显改观的情况下，适当调高东西伯利亚油田的税率是增加财政收入的良好时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政府批准，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对东西伯利亚 22 个油田实行统一的出口关税优惠政策，计税方式就是每桶油价减去 50 美元乘以 0.45。即：俄政府将东西伯利亚 22 个油田的免税政策修改为减税政策，东西伯利亚油田出口关税相当于正常水平的 40% 左右。^①而在本次出口关税税制的改革中，具体到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出口关税是否也统一适用“60-66”税制，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不管结果怎样，新税制的制定、实施都是俄罗斯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石油企业与俄罗斯政府之间

① 如果按乌拉尔原油价格 80 美元/桶计算，俄罗斯正常出口关税税额应是： $(80 \times 7.3 - 182.5 + 29.2) \times 0.65 = 279.96$ 美元/吨，而按东西伯利亚出口关税优惠政策计算出出口关税税额应是： $(80 - 50) \times 0.45 \times 7.3 = 98.55$ 美元/吨，相对正常出口关税税额的 35.2%。

长期博弈的结果，都在努力寻求国家财政权与企业财产权之间的平衡。

四、新税制的实施：石油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众所周知，“无论从名义 GDP 还是从实际 GDP 来看，油气产业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非常大。俄罗斯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很低。因此，俄罗斯经济是一种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①油气行业的税收收入占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每一次油气行业的税制改革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俄罗斯每年开采近 5 亿吨石油，近一半直接出口，剩下一半进行炼化加工。在 2.5 亿吨油品中，约 1 亿吨用于满足国内需求，其余的油品用于出口（见表 2）。而出口产品中的大部分（约 9000 万吨）是所谓的“尾货”，即生产满足国内需求的汽油和煤油后剩下的不得不出口的重油和劣质柴油。另外的 5000 万至 6000 万吨是定位于出口的油品，成品油较低的关税保证了这些产品出口的高利润。

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企之间的博弈归博弈，争论归争论，自 2008 年经济危机后的三年里，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和加工量以及成品油的出口量除汽油外均有明显增加。“2010 年俄罗斯全年油气出口（含成品油）创汇 2419 亿美元，相比 2009 年增长 34.6%，占俄罗斯全年出口收入的 61%。”^②

表 2 俄联邦 2008-2010 年原油、成品油出口一览表（亿吨）

品种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0/2009, %
原油	2.216	2.259	2.339	3.5
成品油	1.154	1.206	1.313	8.9
1、汽油	0.045	0.045	0.030	-33.3
2、柴油	0.355	0.375	0.405	8
3、燃料油	0.615	0.639	0.720	12.68

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海关网（根据海关网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① [日] 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论析”，第 32 页。

② 岳小文：“2010 年俄罗斯石油工业综述”，《国际石油经济》，2011 第 4 期，第 2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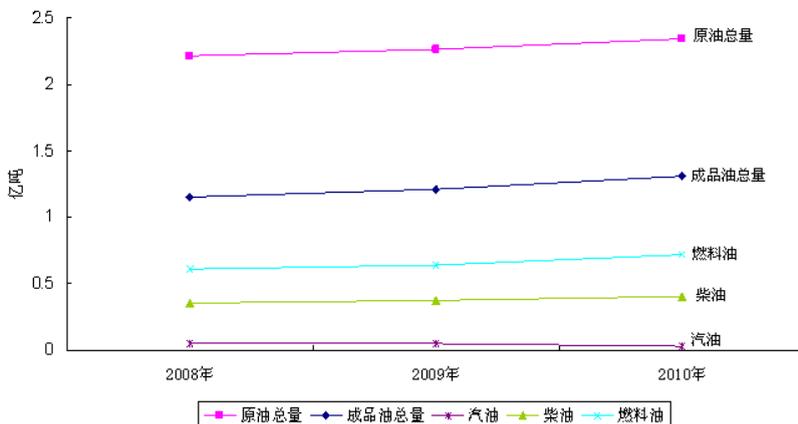


图 3、2008-2010 年俄罗斯原油、成品油以及汽油、柴油、燃料油出口量变化示意图。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海关网（根据海关网公布数据整理所得）

从图 3 曲线变化可知，成品油中柴油和燃料油（重油）的出口量均历年上升，特别是燃料油出口量的增幅较大。2010 年的出口量相对于 2009 年增幅达 12.68%，相对 2008 年涨幅达 17.07%。而与此相反的是，汽油的出口量呈下降趋势，2010 年的出口量相比 2009 年下降了 33.3%。

在旧税制下，俄罗斯原油出口关税的最高税率为 65%，而成品油的出口关税相对原油出口关税而言要低很多。轻油的出口关税税率整体上相当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 70.7%，重油的出口关税税率整体上相当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 38.1%，即，在旧税制下，出口关税的高低依次是：原油 > 轻油 > 重油。在原油出口关税税率高企的情况下，石油企业纷纷把原油粗制提炼后变为重油再出口，从而享受较低的重油出口关税税率。可以说，这也是俄罗斯石油企业面对原油出口关税高税率而采取的一种避税手段和方式，变相的利用转移定价^①来规避原油出口关税的高税率。所以在新税制下，自 2015 年 1

① 转移定价的方式具体到俄罗斯石油企业中，就是把上游勘探开采的原油卖给下游炼化企业，经过粗提炼为重油后再进行出口，因为在俄罗斯旧税制下，原油直接出口的关税税率是 65%，而重油出口关税税率仅为 25%左右。

月 1 日起重油的出口关税税率将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相同，从而减少了石油企业的这种投机行为。

目前俄罗斯各大石油公司利润最高的是在国内销售油品，其次就是出口油品，出口原油的利润很低，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只会加剧这一情况的恶化，因为俄罗斯卢布的升值使得石油开采成本再增加。石油公司为了避免开采量的减少，不得不用销售油品的利润来补贴原油开采的亏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俄政府鼓励发展炼化、鼓励对原油进行深加工的政策支持，从而提高石油行业的经济附加值。

新税制的实施将对俄罗斯国内石油市场的油品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在不考虑原油出口配额的情况，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降低（从 65% 下降到 60%），将加剧俄罗斯石油企业纷纷向国外出口原油的动机和冲动，在原油开采量为一定常数的情况下，俄罗斯国内炼化企业的原油采购价格可能会上涨，原油采购成本的增加，这将降低炼化产业的利润；

其次，汽油出口关税税率的提高使得炼化企业出口汽油油品的利润减少，从而减少向国外出口汽油的数量，增加国内市场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俄罗斯 2011 年上半年以来的油荒；

最后，重油出口关税税率的提高（从与原油出口关税税率的 38.1% 提高到 66%）将引起国内重油价格的走低，同时对以重油为主要生产油品的炼化企业是一个打击。通过新税制，俄罗斯要求石油企业提高原油深加工能力^①，不仅仅是促进炼化油品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提高炼化产品的质量，提高其经济附加值。

原油出口占很大比例的公司首先会从新税制的制定、实施中获利，比如俄油、卢克、TNK-BP 以及苏尔古特石油公司。而最为困难的石油公司将是炼化规模超过自身开采规模的企业，比如，巴什基尔石油公司和鞅鞅石油公

① 在 2010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讨论“2020 年前石油行业发展总体纲要草案”的会议上，俄罗斯也提出，“总体纲要的实施，到 2020 年前保证石油开采水平维持在 5.05 亿吨，保持 2.3-2.4 亿吨炼化深度达 85% 的水平，以此保证石油开采区域的综合发展，创造新的石油、建设及相邻产业的就业机会”。参见：Шматко С.И. Доклад по вопросу Генеральной схемы развития нефтяной отрасл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28 октября 2010 года), 参见 minenergo.gov.ru/upload/.../6e8da40ca500782d70924ec59304bfe0.doc (2011 年 12 月 4 日访问。)

司。如何对这类因新税制的实施而导致收入减少的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也是俄政府部门将要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

这次俄罗斯对石油行业税制的调整，可以看做是俄罗斯旨在提高油气行业经济附加值的一种努力，是俄罗斯摆脱油气依附型经济的一种尝试，也是改变俄罗斯仅仅依靠油气出口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形象的一种努力。从更深层面上看，这也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我们也看到，从普京执政时期，对能源产业的国家控制取代了市场运营，重组能源部门并借此巩固新的政治权力基础，进而恢复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普京当时的优先政策。^①俄罗斯将能源同时作为财富增长与外交的杠杆，的确取得了成功。但另一方面，这种油气资源依附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具有的固有的惯性和路径依赖，也越来越阻碍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和方式的转变。这次新税制的改革是否能如俄政府所期望和预期的那样，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 Abstract 】 For Russian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oil industry has an important role. The tax revenue of oil industry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Russian federal budget revenues.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among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Russian federal government and oil companies, they have revised rates between light and heavy oil of crude and product oil, aiming at finding the best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budget revenue and oil companies' investment income. Meanwhile, they also expect to find the best approach between the overall national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oil industry. For overseas oil, gas co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 country's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Chinese oil and gas companies with "Going out" policies, it is

① [瑞典]斯蒂芬·赫德兰：“危机中的俄罗斯：一个超级能源大国的终结”，第40页。

especially crucial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adoption,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Russia new tax system.

【Key Words】 Russia, New Tax System, Crude Oil, Heavy Oil, Light Oil, Tariff Rate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ефтя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структур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Налоговые поступления от нефтяной отрасли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доходов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Росси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отдел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нефтя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после некоторых конфигураций произвел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и на сырую нефть,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ы, дизельное топливо и мазут,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нахождение оптимального баланса между бюджет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хода и доходами от инвестиций нефтя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и нашли оптимальное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между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в целом в стране и здоровым развитием нефтяной отрасли.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и в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сфере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слияний и поглощений особо важна финансовая и налог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страны. Для «выходящих» на мировой рынок нефтяных и газов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Китая реша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имеет понимание и овладение информацией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иняти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и влияния новой налог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овая налог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сырая нефть, дизельное топливо, мазут, налоговые ставки

(责任编辑 常喆)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 ——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

侯敏跃 韩冬涛**

【内容提要】为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中国实施了能源进口多元化、拓展海外能源产地的战略，加强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能源合作。俄、澳两国作为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在能源结构、国内制度、与中国合作的模式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特点。从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三个视角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探寻两种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中俄 中澳 能源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4.44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1-0106-(19)

一、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能源禀赋与消耗

截至2009年底，我国煤炭探明储量1145亿吨，占全球探明储量的13.9%，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之下，我国已探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仅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1%（20亿吨）和1.3%（2.46万亿立方米）。^①我国尽管煤炭资

* 本项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中俄与中澳（大利亚）资源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JJDGJW006）的阶段性成果。

** 侯敏跃，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冬涛，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2010级博士生。

①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663284.html>

源丰富，但还是于 2009 年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当年净进口 1.26 亿吨，对外依存度为 3.2%。石油进口也达到历史高点 1.99 亿吨，首次超出国际公认的对外依存度 50% 的“警戒线”。从进口总量看，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09 年，我国生产天然气 83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7%，而天然气消费量为 874.5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1.5%。与产量相比，国内天然气供需缺口达 40 多亿立方米。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产地远离消费地，国内能源产量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据预测，2015 年对外依存度为 52.26%，2020 年将达到 61.98%^①，届时，我国天然气需求量将升至 3000 亿立方米，其中一半将需要进口。^②煤炭进口逐年增长的趋势也难以改变。显然，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而俄罗斯的情况则不同，图 1 显示，俄罗斯本国能源消费相对较少，石油产量的大部分和天然气产量的一部份用于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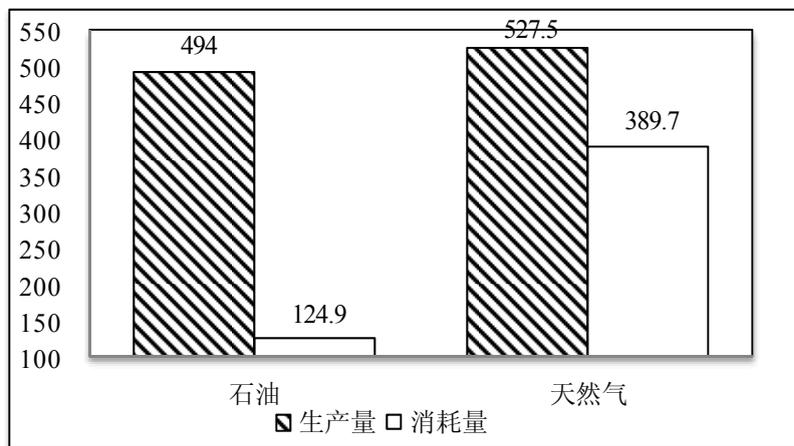


图 1 2009 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产量与消耗量

石油单位：百万吨 天然气单位：十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① 张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118 页。

② “俄气：中国天然气年消耗量将超 3000 亿立方米”，中国石化新闻网，2011 年 11 月 16 电，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1-11/16/content_1110058.shtml

俄罗斯是世界上能源储量和产量巨大的国家。截至 2009 年，俄罗斯已探明石油储量 102 亿吨，约占世界的 5.6%；已探明天然气储量 44.38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 23.7%，居世界首位。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产量近十年来成高速增长态势，2009 年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石油产量明显下降，但也高达 4.94 亿吨，占全球的 12.9%，超越沙特，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同年，天然气产量 52.75 亿立方米，约占世界产量的 17.6%，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①

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国内能源消费量较小，能源产出的 66%用于出口，是能源净出口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实行无核化政策，其核原料全部用于出口（参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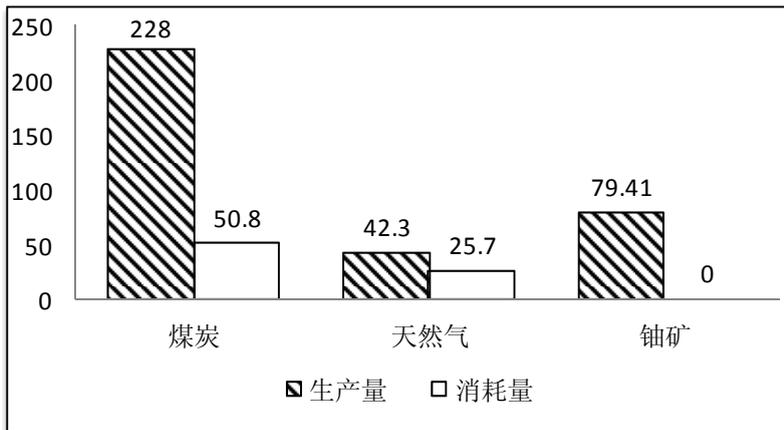


图 2 澳大利亚 2009 年能源产量与消耗量

煤炭单位：百万吨 天然气单位：十亿立方米 铀矿单位：吨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截至 2009 年，澳大利亚已探明煤炭储量 762 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9.2%，出口量约为世界的 30%，为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国。天然气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数据，澳大利亚常规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108.7 万亿立方英尺（3.08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天然气探明总储量的 1.6%，出口量居世界第七位。

^①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663284.html>

①澳大利亚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也相当丰富，包括煤层气、致密气和页岩气，煤层气的资源总量约为 153 万亿立方英尺，其中已证明有经济意义的资源量为 27.3 万亿立方英尺。截至 2008 年，澳大利亚已探明有经济意义的铀矿资源量约为 116.3 万吨，占全球铀矿资源总量的 38%，雄踞世界首位，2009 年产量为 7941 吨。②

二、中俄、中澳能源合作之异同

俄罗斯与澳大利亚都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但是两国在能源结构、管理制度、产销方式、地缘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中俄、中澳的能源合作也不尽相同。本文拟从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作一简要比较和评析。

（一）合理性

从能源结构看

中俄能源合作重点在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巨大，而人口只占世界的 2.5%，能源消耗相对较小，其石油、天然气产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虽然近年来有多家机构及专家预测西西伯利亚地区油气产能达到顶峰并逐渐降低，将会影响俄罗斯油气供应的稳定性。但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油田的开发，俄罗斯油气产能在一段时间内较为稳定。③

中澳能源合作的重点在煤炭、天然气、铀矿和能源技术。虽然澳大利亚的煤炭、天然气储量并不算高，但是澳大利亚的人口相对其能源储产量来说要小得多，因此其产出大多用于出口。澳大利亚的铀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因为澳大利亚实行无核化政策，所以铀矿产出全部用于出口。此外，澳大利亚在清洁煤技术、煤层气生产和煤层气转产液化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①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663284.html>

② 同上。

③ [日]本村真澄：“俄罗斯 2030 年前能源战略——实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55-58 页。

目前我国石油进口约 60%来源于中东和非洲，进口地较为集中。中东和非洲地区政治局势不够稳定，恐怖袭击时有发生，石油供给的稳定遇到挑战。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可以降低对中东市场的依赖，保障石油进口的多元化。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量，中国已经着手改变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增加天然气、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从俄罗斯、澳大利亚进口天然气可以减少煤炭、石油的使用量，从澳大利亚进口铀矿可保证我国现有和新增核电站的原料供应，与澳大利亚的能源技术合作可以实现两国的优势互补，有利于我国占领低碳经济的制高点。

从运输线路看

当前，我国 80%的进口石油要途经马六甲海峡这个狭窄的运输通道^①，线路较为单一。马六甲地区海盗出没频繁，美国势力影响较大，可能成为运输通道的不安全因素之一。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有漫长的边境线。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可采用铁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过境，选择较多，且可长期使用，相较于我国从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通过海运进口能源，安全性较高。但是，管道建设的成本较高，若管输距离太长，带来的损耗会较大。

我国能源储藏分布不均匀，煤炭、天然气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与能源的主要消耗地东部沿海地区距离较远。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和铀矿，可经海路直接运抵我国东部沿海主要能源消耗地区，而不必转运。造船、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较建管道的花费要少许多，既节省成本，又避免了管输可能造成的沿途环境问题、损耗和对管道安全的担忧。此外，经海运进口的澳大利亚能源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沿途并非海盗经常出没之海域，风险较小。

从经济结构互补性看

俄罗斯与澳大利亚都是资源出口型国家。俄罗斯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

^① 我国主要能源运输路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洋—南海—中国大陆；或者非洲沿岸—好望角（北端走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印度洋—马六甲海洋—南海—中国大陆。参见张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及中国的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127页。

得益于国际油价的高涨，能源出口对财政收入具有重要作用^①，但是国内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需要巨额投资。澳大利亚除能源产业外，农业和服务业较为发达，并且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方面具有优势，与俄罗斯相同的是制造业较弱，竞争力不强。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在耐用消费品和机械制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被称为“世界工厂”。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用于购买能源和进行海外投资。因此，我国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在经济结构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

概而言之，从能源结构看，中俄、中澳能源合作各有重点，优势突出；从运输线路看，中俄间的陆上运输和中澳间的海上运输，有利于我国进口能源来源和运输渠道的多元化，对于保障我国能源供应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结构看，我国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结构互补性强。所以，中俄、中澳开展能源合作是合理的。

（二）有效性

从能源贸易增速看

根据图 3、表 1 和图 4 的数据，2000 年至 2009 年，中俄石油、中澳煤炭和天然气的贸易量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中俄石油贸易的提升，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用油紧张的难题，更具意义的是，降低了对中东石油市场的过度依赖。^②与石油进口相比，中俄天然气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较大的合作空间。^③

① 详见孙溯源：“俄罗斯对世界石油体系的挑战及其局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三期，第 106 页；[日]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43-45 页；公正，吴杰：“俄罗斯油气税收政策发展动向研究”，《资源与产业》，2009 年 2 月，第 24-26 页。

② 参见郝瑞彬、王伟毅：“21 世纪中俄石油安全与中俄石油合作”，《中国矿业》，2006 年 3 月，第 5-8 页；陈松、刘仕华、胡国松：“中俄油气合作浅析”，《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57-58 页；刁秀华：“中俄两国的能源安全与合作”，《东北亚论坛》，2007 年 11 月，第 47-52 页。

③ 参见陈小沁：“中俄能源合作的地缘政治视角”，《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29-30 页；史春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东部战略与中俄天然气合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 年 11 月，第 124-126 页；冯保国：“关于中俄天然气合作的冷思考”，《国际石油经济》，2011 年第 6 期，第 9-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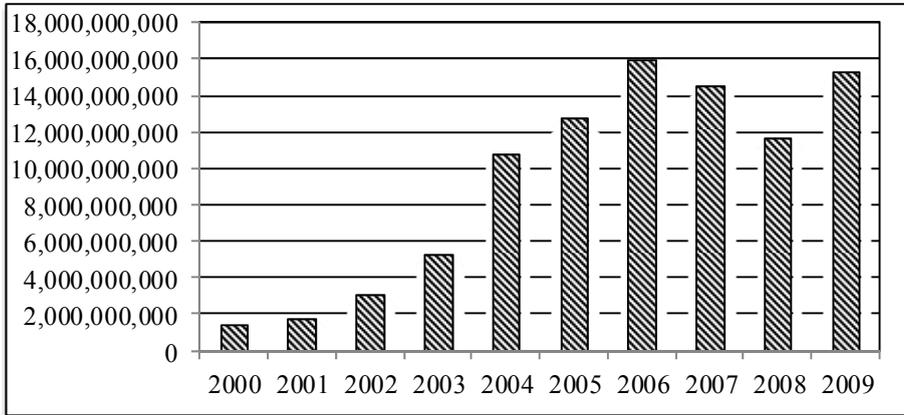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自俄罗斯原油进口量，单位：千克

数据来源：<http://comtrade.un.org/db/>

表1 中国自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 单位：千克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4	2005	2009
数量	120,874	456,410	325,483	2,453,500	2	190,457,392

数据来源：<http://comtrade.un.org/d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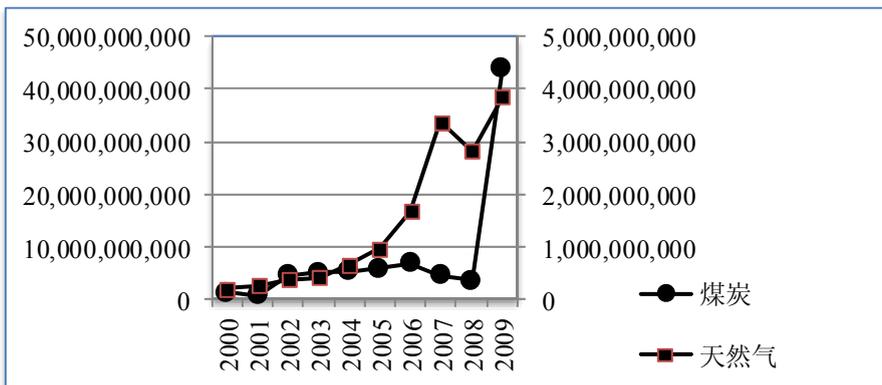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自澳大利亚煤炭、天然气进口量 单位：千克

注：左边坐标代表煤炭，右边坐标代表天然气；数据来源：<http://comtrade.un.org/db/>

2009年中亚管道天然气开始输入我国之前，我国进口的天然气是液化天然气。有一定规模的进口始于2006年5月澳大利亚首船液化天然气运抵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也正是从 2006 年开始，中澳液化天然气贸易大幅提升。最近几年，来自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占到了我国进口天然气的大部分，为缓解我国内天然气供应的紧张状况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2009 年我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当年进口煤炭约 1.26 亿吨，其中 4395 万吨为澳煤，澳大利亚成为该年我国最大的煤炭供应国。

中俄、中澳能源贸易近年来的稳定增长，缘于中国与两国签订的长期购销合同。现有大部分的中俄、中澳能源合同的价格安排都是长期的固定价格或者半固定价格。^①尽管双方都从这种定价方式中得到了好处，但是一旦国际市场现价剧烈波动，双方就会产生潜在的价格争议。2004 年中俄为期 7 年价值 60 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协议、2009 年中俄为期 25 年价值 250 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均执行固定或半固定定价，协议签署后，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俄方要求价格补偿，双方在价格问题上产生矛盾。且据测算，虽然俄出口到中国的原油平均价格基本高于出口欧洲的价格，但是出口中国的利润却远低于出口欧洲的利润。^②所以俄罗斯更倾向于增加对欧洲的出口。2003 年中海油与澳大利亚高庚液化天然气项目签订购买液化天然气的框架协议，后因谈判时中方难以接受澳方提出的报价而被迫放弃。三个看似相互独立的案例，却有着同样的原因。中国能源市场长期以来相对封闭，国内能源价格受国家控制，使得国内消费者和企业的消费成本低于世界基准。能源进口的高定价将使我国能源市场遭受严重冲击，带来经济损失。因此，我国能源报价相对国际能源价格偏低，导致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在能源贸易中的价格矛盾。如何制订一个双赢的定价机制，成为中俄、中澳能源贸易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从投资看

中国的能源战略不仅将眼光放在增加能源进口上，且鼓励能源企业走出

① 中俄长期供油价格根据原油价格计算公式确定，例如 2004 年中俄“石油换贷款协议”规定了原油价格公式，它与欧洲北海原油市场的布伦特原油的月平均现货价格挂钩，在此基础上加上一个固定调整值。引自刘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价格分析的角度”，《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65 页。

② 刘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原油贸易——价格分析的角度”，《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66 页。

国门，直接到能源产地，通过收购、合资的方式进行能源开发，以进一步保证我国能源供应的稳定。中俄、中澳能源合作在投资、企业并购、建立合资公司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表 2 对中俄、中澳投资合作项目的成功案例进行了整理，比较显示，中澳在项目数量、投资领域、股份权重等方面要优于中俄投资合作。迄今，中国在澳投资的 75%以上在能矿领域，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的头号非债券投资目的地，累计直接投资额达 340 亿美元，而中国在俄罗斯非金融领域累计直接投资仅有 16 亿美元。^①

中俄能源投资合作项目较少，金额较低，涉及范围较窄，过程较为曲折，深层次原因在于：第一，近年来俄罗斯强化了对油气产业的控制，并不断加强国内包括《关于外国投资者向对俄罗斯国防和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进行投资的法律》在内的关于能源产业的立法，限制外国公司投资俄罗斯国内能源产业。^②第二，俄“控制上游，开放下游”，在有条件地允许外国公司投资本国能源产业的同时，要求进入对方国内的油气零售市场。但我国的能源产业链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一直未对俄罗斯完全开放国内市场。^③第三，俄罗斯十大油气企业中私有油气公司所占比重较大，俄政府虽然加强了对能源产业的控制，但是仍然主要是为企业进行服务，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油气企业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在与我国的能源合作中，经济利益的考量居于首位；而我国油气企业均为国有，直接受国家领导，在合作中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考量。第四，俄能源决策机制较为分散，存在着联邦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油气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俄在能源合作谈判、签订协议、合同执行等方面往往受到多方掣肘。中石油被迫退出收购斯拉夫石油公司、收购斯基姆尔石油公司股权争端、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的久拖不决，都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虽然以上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双方正在踊跃尝

① 《俄国家发展战略需巨大投资和国际合作》，中新社莫斯科 3 月 12 日电，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0-03/13/content_19599361.htm

② 参见李中海：“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38 页；陆南泉：“中俄能源合作或重大突破的缘由分析”，《俄罗斯中东欧市场》，2010 年第 9 期，第 1-6 页。

③ 参见[俄]米洛夫：“中俄能源领域合作前景：消除壁垒 加强联系”，《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59 页；朱光强：“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17-118 页。

试突破困境，例如：“上游换下游”——以股份方式共同组建合资公司。^①

表 2 中俄、中澳能源投资合作成功案例

中石化与俄石油建立合资企业共同参与俄远东“萨哈林-3”油气田的开发	兖州煤业出资 32 亿美元并购澳大利亚菲利克斯煤矿企业
中石油购得俄石油 5 亿元股份	中石油联合壳牌公司出资 35 亿澳元,收购以生产煤层气为主的澳大利亚箭牌能源公司
中石化与俄石油合作收购乌德穆尔特油气公司 96.86%股份	华能集团收购麦卡瑟煤炭公司在蒙托电煤工程中所拥有股权中的一半
俄石油与中石油组建东方能源公司, 资本为 1000 万卢布	中海油成功收购必和必拓与科麦奇公司在澳大利亚 Outer Browse 盆地勘探区块的权益
中俄石油管道工程	中钢集团与 Pepin Nini 公司合作开发克洛克尔·维尔铀矿田和芒特·维多利亚铀矿床, 投资达 1100 万美元
中俄天然气管道工程 (谈判中)	澳大利亚 HRL 公司与中国哈尔滨电力工程公司合作,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拉筹伯峡谷合作建立拥有 400 兆瓦发电能力的示范电站, 双方各占 50% 的股份。
	重庆煤炭集团与 Pulse Energy 公司合资建造、运营 4 个电厂, 总额达 31.2 亿美元
	中澳两国企业在中国多个省份也在风能、太阳能开发方面展开着积极有益的合作
	中海油获准收购澳西北大陆架天然气项目 5.3% 的权益、柯蒂斯液化天然气项目一条生产线 10% 的股权, 以及英国天然气公司在澳大利亚一些资源资产利益的 5%; 中石化获准认购澳大利亚太平洋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15% 的股份

资料来源: 自制

相较于中俄, 中澳间的能源投资合作较为顺利, 其原因在于: 第一, 澳政府仅对能源的勘探开采权进行分配, 对环境要求进行管控, 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批, 而对企业具体的开采、并购、销售等不予干预, 谨守“守夜人”的职责。第二, 澳能源企业多为跨国能源公司, 在能源贸易、投资、合作过程中遵循市场规则, 以获利为标准, 政治考量相对较少。第三, 澳在清洁煤、

^① 朱光强: “困境与协调: 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 《俄罗斯研究》, 2009 年第 4 期, 第 117-118 页。

煤层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技术方面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与中国在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拓展了中澳能源投资合作的领域。第四，澳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完备，税收和投资政策总体上有利于引进外资。以2009年中石油与美孚澳大利亚公司签订的为期20年、价值412.9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销售协议为例，中澳虽因热比娅访澳、力拓间谍案等事件双边关系一度受损，但是中石油与美孚澳大利亚公司的合同仍得到澳政府的批准。而兖州煤业并购菲利克斯煤矿也是在2009年两国关系的敏感时刻获堪培拉批准的。这两个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澳在中澳能源合作中较多注重经济利益考量，比较遵守市场规则。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能源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并购也有失败的经历，有些是由于我国能源企业缺乏运用市场规则的经验、竞争力不足所致；另一些则与中俄能源投资合作失败案例相似，澳政府、民众对中国能源企业的政府背景和对本国利益受损产生严重担忧，从而阻挠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

从合作机制看

中俄能源合作的突出特点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巩固成为能源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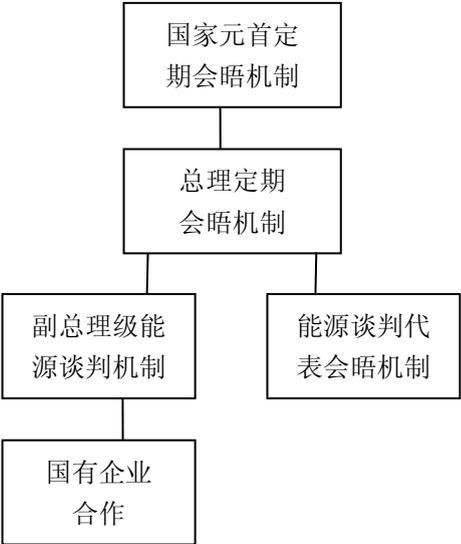


图 5 中俄能源合作机制

如图 5 所示，中俄能源合作机制较为成熟，层次分明，功能明确，各机制之间互有联系，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结构。双方国家元首、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之下又专设就能源合作进行谈判的副总理级谈判机制与能源谈判代表会晤机制。中俄能源合作机制的系统性结构，有利于集中商讨双方所关心的问题，更有效地实现各自的意愿。

如表 3 所示，相较于中俄合作机制，中澳能源合作机制类型多样，但较为松散，双方推动能源合作的资源较难聚合，各机制之间有待于加强协调和沟通。中澳尚未建立国家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有关能源合作的政府间对话、谈判层级较低，功能性不够显著，有针对性地解决合作难题的能力较弱，不利于中澳长期的能源合作。但是，与俄罗斯相比，澳大利亚法制较健全，商业信誉较高，社会更稳定，这弥补了合作机制上的不足。另外，中澳正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将对中澳能源合作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能源合作的持续发展。

表 3 中澳能源合作机制

双边机制	多边机制
中澳能源合作联合工作组	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
中澳经贸合作框架协议	
中澳高层经济合作对话机制	
中澳清洁煤技术联合协调工作组	
中澳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	
中澳年度战略对话机制	

资料来源：自制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机制的差异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在于政府作用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在能源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不同所导致的。俄罗斯能源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普京国家不仅强化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强化了对企业的微观调控，^①在能源产业表现为国家控制力较强，能源企业的商业行为受政治影响较多，这一点与中国相似，所以中俄两国可通过政府间合作机制的系统性克服能源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缺陷，能够较好地促进能源合作。而澳大利亚能源市场经

① 李中海：“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37 页。

济体制相对健全，能源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商业运作，遵循市场规则，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两国政府间合作机制较弱，政府只起推动作用而不是像中俄政府那样起主导作用。

从国际干扰因素看

中俄、中澳能源合作除受到价格、机制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国际因素的竞争或干扰。日本能源资源匮乏，国内能源消耗基本依靠进口，与中国在能源进口方面存在较大的竞争关系。中俄石油管道一路波折，日本竞争是影响因素之一。中俄石油管道由于俄内部利益博弈存在“安大线”、“安纳线”之争，寻求与俄罗斯进行能源合作以降低对中东市场依赖的日本抓住机会，通过高层领导人访俄、许诺进行贷款投资、拉拢相关地方高级官员等方式，成功取得了俄官方关于“亚太地区输油管道尚未最终确定”的结果，直接阻碍了中俄石油管道的合作进程。^①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早于中国，通过市场手段广泛投资于澳大利亚的能源产业。日本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能源贸易伙伴，在能源市场经济成熟度以及运用市场规则方面，日本好于中国，更具竞争力。例证之一为，2003年，日本接受了中海油所不愿接受的高庚液化天然气项目的价格而拿走了订单。在政治和安全战略层面，日澳关系也优于中澳关系。2006年日澳建立了防务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之后与日本有防务合作关系的第二个国家。次年，日澳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双部长对话启动，两国也已开启了首脑定期会晤机制。

相较于中日之间直接的能源竞争关系，美国对中俄、中澳合作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战略层面。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潜在威胁，通过各种手段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能源层面，制造“中国能源威胁论”，指责中国的“单边能源外交”可能会造成地区形势紧张。但总体来说对中俄能源合作影响较弱。美国是澳大利亚的盟国，二战后即向澳提供军事保护，历来是澳对外关系的重心。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举行美日澳部长级三边战略对话的同时，推动日澳两国在2006年签署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保

^① 详见吴景峰：“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性分析”，《学术交流》，2008年11月，第95-96页；朱光强：“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2-115页。

障联合宣言》，作为美日、美澳同盟的重要补充，并拉拢澳大利亚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美、日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的深入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可持续性

从双边政治关系看

能源属于战略性资源，政府在能源合作中发挥主导或重要作用，政治关系的稳固是国家间能源合作的基础之一。中俄两国同是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与地区一体化，对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有着较为接近的看法，双方还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有着深入的合作，中俄政治关系是稳固并且持续向前发展的。^①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理念，它在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的同时也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是其东西方平衡战略中的一枚棋子，中国的强大也被某些俄罗斯人认为是一种威胁。^②

1972年中澳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基础不够牢固，时有波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政治制度的差异与美国因素的干扰。中澳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中澳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相互认知弱于中俄之间。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对中澳关系有较大的影响力。虽然在9.11事件后，美国因素减弱，澳大利亚政府显示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前几年陆克文执政时期中澳正式确立了“面向21世纪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关系”，但那只是澳稍稍平衡与中、美的关系和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其战略中心仍是美国。

从政治关系层面看，中俄之间的政治关系较之中澳更为紧密，政治互信更为深入，中俄之间的政治关系更有利于能源合作的持续。

从能源战略层面看

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基调是：“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主

① 参见刘古昌：“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第3-10页；崔启明：“关于中俄关系的几点思考”，《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第4-8页。

② 王海运：“中俄关系：战略基础与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第8-9页；田永祥：“中俄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第2-3页；邢广程：“对近期中俄关系的几点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1期，第72页。

要任务是保证长期而稳定的能源供应，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可预测性”。^①美国发生“页岩气革命”后，液化石油气生产大国卡塔尔随即角逐欧洲市场，面对激烈的竞争，以及出于优化出口市场、降低风险因得考虑，此向东发展是俄罗斯的明智选择。俄罗斯 2003 年公布的《202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和 2009 年出台的《203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指出，俄罗斯的对外能源政策将有显著变化，主要变化是俄将加大向亚太地区出口油气的力度和步伐。预计到 2020 年，俄对亚太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在俄能源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将提高至 30%左右，而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将是俄在亚太和南亚的主要市场和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增量地区，可用以平衡俄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以保障其能源出口贸易的安全。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提出一个区域性的、能够照顾到地区利益的政府计划。该计划打算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的石油和天然气提炼、运输和供给体系，以便于向东北亚地区进行出口。^②各种情况显示，俄加强对华油气合作的战略决策已定。俄罗斯推进中的“能源外交”重心东移，以及我国日益重视并推动的“走出去”能源发展战略，为双方扩大能源资源合作创造了战略上的有利条件。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则为油气合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交支持。

与欧洲是俄罗斯主要能源市场不同的是，二战结束后，东亚迅速上升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市场。目前，澳依然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主要能源供应商之一，多年来其制订的能源和外交战略均突出了融入亚洲的重要性。2009 年，澳政府公布了《国家能源安全评估 2009》。2010 年，又颁布了评估和指导性文件《澳大利亚能源 2010》和《澳大利亚能源资源评估》。此外，资源大州如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的政府能源资源部门，也经常发表关于本州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行业的调研报告，并制订发展规划。联邦和州政府制订的所有指导文件均认为，澳大利亚应该为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供应，继续参与国际多边和双边能源合作，尤其是更有效地与中国和印度进行合作。

① [俄]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71 页。

② 同上，第 78 页。

俄罗斯、澳大利亚的能源战略，都将中国列为未来能源合作的重要伙伴，中俄、中澳能源合作的可持续性在能源战略层面是有保障的。

从国内制度层面看

俄罗斯与澳大利亚的国内制度安排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两国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有不同的影响。普京执政时期，尽管加强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减缓私有化速度，但市场经济制度并没有出现倒退。非国有经济在俄罗斯仍占据半壁江山，在可预见的将来，俄罗斯仍将保持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①梅普之间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分歧，政策的延续性应无问题。然而，俄罗斯处于转型过程中，制度建设仍显滞后，国内腐败问题严重，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利益争夺削弱了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能力。

澳大利亚属于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制度安排较为完备，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但正因为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为了迎合选民，各届政府的政策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战略和政策不会有实质性的突变。

因此，从俄罗斯与澳大利亚的国内制度来看，澳大利亚由于较为成熟的制度安排，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将更具有可持续性。

从经济发展层面看

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有利于能源合作的可持续性。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对油气出口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特别依赖国际油气价格，^②但过分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油价暴跌对俄罗斯经济具有较大破坏性影响。俄罗斯经济表现出“荷兰病”的特征，^③但俄罗斯并没有完全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根据“资源诅咒”理论，经济增

① 李中海：“论俄罗斯混合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及特点”，《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第37页。

② [日]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50页。

③ 中日两国俄罗斯研究专家均持自种观点，详见曲文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俄罗斯经济增长”，《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1期，第27页；李新：“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日]田畑伸一郎，“俄罗斯油气资源依附型论析”，《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32-51页；郭晓琼：“关于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实证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第91-101页。

长与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成负相关关系，但是通过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完善制度建设、扩大制造业投资等方式，俄罗斯有效地控制了“资源诅咒”。俄罗斯的现有条件是：工业体系虽然老化，但仍较完备，有较大的改造潜力；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完整，人口素质较高；军工、航天仍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三产业比重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俄罗斯注重能源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技术提升与增加投资双管齐下；加大科研投入，2006年用于研发的投入达到2888亿卢布，是2000年3.8倍，占GDP的比重为1.07%，其中国家投入占27%，占政府预算支出的比例为2.27%，这一指标比2000年提高了34%，^①并建立了一系列高新技术园区。其结果是，除了能源外，俄罗斯的其他产业也有效地促进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政府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上未来制度的完善，俄罗斯有可能有效地制约资源寻租和腐败行为，其经济保持良性发展有较大潜力。

澳大利亚同俄罗斯一样也是一个资源出口国，但澳经济多年来保持良性增长，较好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布局合理，形成了能源、农业、服务业、信息知识产业等多个支柱型产业；市场开放程度高，具有有利于商业的税收体系和低贸易投资壁垒；完备的制度有效地制约了资源寻租行为和腐败的滋生；注重人才的培养，重视对创新科技的投入。随着澳大利亚进一步融入正在崛起的亚洲，将会保障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澳大利亚的前景要优于俄罗斯，但如果俄罗斯转型成功，其经济也可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结果还有待观察。

三、结语

研究显示，中澳能源合作虽曾产生波折，但现阶段贸易、投资等方面的情况总体较中俄合作顺利。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模式的差异，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三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中俄都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还有待时日，政府主导的能源合作模式短期内不会改变；中、澳经过多年合作的

^① 李新：“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页。

磨合，中国能源企业在合作中逐渐学习和掌握市场竞争原则和手段，未来的合作应该更富成效。

能源属战略资源，因此除了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考量外，也应该注意到国家战略方面的考量。尽管现阶段中俄能源合作落后于中澳能源合作，但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战略意义更为突出。中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转型国家，有着诸多相近的战略诉求：两国都曾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在转型的路径、经验以及进程方面有着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两国对时代特征、世界发展趋势有着相似的看法，都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稳定，在打击国际恐怖势力、国内分裂主义，保障地区安全、促进地区繁荣，参与多边全球治理等方面都需要两国积极协调，密切合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从“以政治、安全为重点的战略协作发展为以经济与安全为主的全面发展战略协调”^①阶段。能源合作是两国全面发展战略协调的重要内容，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更增强了中俄政治互信以及合作制度的建设；随着中俄政治互信的不断增强以及合作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将有效推动作为战略资源的能源的合作。因此，尽管中澳能源合作现阶段在数量和质量上优于中俄，但综合考察，中俄能源合作的过往成绩以及前景不仅具有实际利益，而且更具有战略意义。

我们也应从中俄、中澳能源合作的失败经验中寻求推进合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包括如何弥补或消除中国自身在双边能源合作中的不足，目前有必要采取的举措有，逐步取消能源产业的国内壁垒，进一步提高政策透明度；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重视经济因素在双边能源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制订长远能源发展与合作规划，提高信息透明度；适当放松对国有能源企业经营的管制，淡化能源企业的政府意图，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增加双边政治互信，加强对俄、澳相关政策措施、国情民意的了解和民间交往，提高双方的认知度，淡化直至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利影响。

【Abstract】 With a strong attempt to reduce the over-dependence of energy

^① 冯青淑：“中俄战略关系的内涵变化：从政治战略协作到国家发展战略协调”，《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4期，第44页。

imports on the Middle Ea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for some years,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a strategy of diversifying its import sources, including imports from Russia and Australia, which have become China's major partners for energy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d analytical study on China'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Australia respectively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rationality,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with a hope to benefit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two countries in energy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Sino-Russia, Sino-Australia, Energy Cooper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 целью уменьш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итай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ю импорт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проводит стратегию расширения зарубеж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энергии, укрепля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с Россией, Австралией и друг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Россия и Австралия являясь ключевы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Китая, имеют сво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 план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нутренней системы, моделе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Китаем и т.д. Проводитс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что помогает нам исследовать успешный опыт двух моделе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 также понять,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ожно преодолеть влияние негатив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китайско-австрал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етик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哈萨克斯坦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

J·库兹涅尔**

【内容提要】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受制于能源经济和依靠石油寻租的油气生产国。国有大型油气公司的高级主管对该国的能源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石油精英通过与政治精英建立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不仅影响本国能源部门的发展，而且还介入政治决策和政治制度。而哈萨克斯坦普遍存在着制度的不透明性、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总统决定的随意性，助长并养成了非正式政治体制的固化，加强了威权主义的趋势，并进一步鼓励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延续。

【关键词】石油精英 依恃关系 非正式 威权政体

【中图分类号】 D6(36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2)01-0125-(29)

导 言

由于油气工业富有活力的增长和丰厚的利润，油气经济部门的精英已在哈萨克斯坦的政治中占据关键位置，成为该国精英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不仅在能源部门的发展方面与政治精英联系密切，而且还介入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本文分析哈萨克斯坦国有大型油气公司的主管对国家能源政策和政治体制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政治精英与石油精英之间相互关系的详细案例研究，验证石油部门影响政治体制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着重考察这两个群体之间非正式关系的建立，是如何帮助哈萨克斯坦非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号：11JJDGJW011）的阶段性成果。

** J·库兹涅尔（Julia Kuszniir），德国雷根斯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

正式政治体系的形成和促进独裁倾向的增强的。

选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研究的原因，是该国是一个依靠石油寻租的国家，是里海这一经济结构已被能源经济型塑的地区中最重要的油气生产国之一。油气工业在哈萨克斯坦的 GDP 结构中至关重要：其产值在 GDP 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10% 增至 2008 年的 22%。该国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收入，约 35% 的国家税收来自石油部门。2008 年的石油总产量大约为 7000 万吨，而出口就达到了 6300 万吨。哈萨克斯坦政府希望 2010 年的石油总产量增加到 8000 万吨，2015 年增加到 1.3 亿吨。该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 2017 年跻身世界十大油气出口国之列。^①因此，能源政策构成了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哈萨克斯坦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表现为新世袭式（neopatrimonial）的政治体制。^②其特征是行政过程中政治权力的集中、个人统治和有限的政治参与机会。统治精英的利益被伪装成国家的利益，政府职务的委任往往通过非正式的网络而不是公开的决策渠道。公共行政效率低下，且极其腐败。此外，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还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前苏联的遗产、家族或利益集团（clan）的成员、具有某种形式的种族联系。市场化改革和自由化导致精英集团内部产生变化和竞争：具有不同背景和出身的新生代（newcomers）能够控制许多经济和大众传媒机构。这些新的群体形成了独立的权力基础，从而削弱了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③

① Ernst & Young, *Kazakhstan oil and gas tax guide 2009*, p.3.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FILE/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pdf](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FILE/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pdf) (accessed 17.06.2010)

② Anja Franke, Andrea Gawrich and Gurban Alakbarov, “Kazakhstan and Azerbaijan as Post-Soviet Rentier States: Resource Incomes and Autocracy as a Double ‘Curse’ in Post-soviet Regimes”, *Europe –Asia Studies*, 2009, Vol. 61, Issue 1, pp.109-140.

③ 参见 Andrea Schmitz, “Elitenwandel und Politische Dynamik in Kazachstan”, Berlin: SWP, *SWP Studie*, S39, 2003; Neil J. Melvin, “Authoritarian Pathways in Central Asia: A Comparison of Kazakhstan, the Kyrgyz Republic and Uzbekistan”, in Yaacov, Ro’i (Ed.)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in Muslim Euras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19-142; Sally N. Cummings, “Kazakhstan: Power and the Elite”, London: Tauris, 2005; Beate Eschment, “Elitenrekrutierung in Kasachstan. Nationalität, Klan, Region, Generation”, *Osteuropa*, 2007, No.8-9, pp.175-194; Heidi Kjærnet, Dosym Satpaev and Stina Torjesen, “Big Business and High-level Politics in Kazakhstan: An Everlasting Symbiosis? ”, *China and Eurasia Quarterly*, 2008, Vol.6, No.1, pp. 95-107.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在政府和国有油气公司主管的互动中形成了怎样的利益联盟。公司能否俘获政治？还是政府利用企业？这种关系对政治制度的维护有什么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将对理论分析框架作一概述，随后介绍石油精英和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接着介绍能源工业的重组、能源领域重要行为体的出现、相关行为体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联盟。本文将研究这些联盟，分析石油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互动形式，进而研究能源部门的非正式性是否是石油精英通过资源分配成功操纵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最后探讨在石油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互动中形成的制度如何影响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本文认为精英们在经济资源分配上的高度联合是维持哈萨克斯坦威权政体的决定性因素。

理论框架

本研究试图通过考察行为体的互动，补充现有的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的新世袭主义体制的概念，因此本文的理论框架是结合新世袭主义和寻租国家理论，研究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制度主义（actor-centred institutionalism）。该工具使得分析相关行为体、制度、国家和经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方式成为可能。

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制度主义，以理性选择模型为理论基础。该理论假设行为体以自身利益和实现优势最大化的战略为基础进行理性选择。如果政治—经济部门中的个体和集体行为者采取战略性行动，对他者的行为作出回应，那么就有可能分析出政治—经济的决策过程。

沙普夫（F. W. Scharpf）提出了分析政治结果的四种基本解释因子：一是行为体，行为体利用它们的能力和资源参与政治过程，这些能力和资源决定了它们的战略和偏好；二是行为体的组合，这一要素推动行为体与他者互动以实现其目标；三是互动的方式，该要素设定形成决策的方式；四是体制框架，该要素决定行为体理性的环境。^①这一分析方法假设包括组织、正式

^① F. W. Scharpf,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MPIfG Working Paper* 00/3, March 2000, pp.84-95. <http://www.mpi-fg-koeln.mpg.de/pu/workpap/wp00-3/wp00-3.html#1>

和非正式的规范在内的机制构造了行为体的行为和互动，其中特别是长期被比较政治学研究所忽视的非正式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四个要素不仅描述政治行为，而且塑造参与政治过程的行为体的愿望和动机，它们促进政治行动并使行为体的互动成为可能。

诺斯（Douglass C. North）对两种形式的机制进行了区分，一方面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另一方面是或多或少牢牢嵌入体制框架中的各种组织和其他行为体。^①根据诺斯的观点，为政治经济中的互动和协调制定规则的制度，包括那些涉及政治和经济资源处置权的规则。它们包括正式的机制，如宪法、法律、法规和由官僚委员会起草并经官僚程序通过的行政规范。这些制度确定政治体制中的正式权力结构和三权分立的形式，它们由政治或法院的判决而产生、变更或撤销。另一方面，它们也包括政治行为体和经济参与者之间非正式的交换规则，如依恃关系（clientelist relationships）。因此，制度的作用是确保规则的稳定，以规范行为体的互动和减少不确定性。这些因素确定权力的分配和行使、权威主体和依附体的关系、权威的性质和行为体对政治—经济资源的使用。^②

非正式制度源于个体、集体或公司行为体之间的常规性互动，不一定遵守正式制定的规则。这个概念涵盖了“从个人网络、腐败、依恃、部族到黑社会，以及从传统文化到不同的立法和官僚规范”的各种现象。^③这些现象出现在利益生成结构中，影响政治决策乃至政治体制的各个层级。它们充斥于职权平行的机构，涉及多个司法层面，介入政治进程参与者的“谈判系统”，使得参与者在没有正式规则的条件下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它们迫使正式的制度进行改革，或者适应新情况。与此同时，非正式制度塑造政治影响的形式，确定政治影响的界限。

统治精英从非正式规则中获益，非正式规则允许精英调整法律和宪法中的规则以适应自身的特殊利益。非正式规则是威权政体中政治体系的核心组

①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R. Mayntz and F. W. Scharpf (Eds.), *Gesellschaftliche Selbstregulierung und politische Steuerung*. Frankfurt a.M.: Campus, 1995, p.40.

③ G. Helmke and S. Levitsky,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search Agend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4, Vol.2, No.4, p.726.

成部分。总体而言，赞助、依恃、院外游说和腐败围绕着利益冲突展开，而不是依照公开合法的宪法程序进行。^①根据诺斯的理论，由并存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产生的诱惑和局限，使各种具体组织（如政党、企业和协会）和非正式虚拟组织（如网络）得以形成，这些组织服务于实用主义的或个人的利益的实现。^②

本文采用新世袭主义理论的方法研究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新世袭主义源自马克斯·韦伯的世袭制（*patrimonialism*）^③概念，即“一种组织形式的混合物，在这个混合物中，普遍的世袭关系充斥于由理性—合法的正式渠道形成的政治行政体制。在官僚机构中任职的官员拥有明确规定的正式权力，但他们却在尽其所能地为了私人财产而不是为公共服务行使这些权力。官员与他人的关系也同样陷入世袭模式中的主人和附庸的关系，而不是理性—合法制度中的上下级关系，因而官员的行为则是显示个人地位而非履行职能。”^④

换言之，新世袭主义国家拥有强大的官僚机构干预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集中在保护人（如总统）手中。宪法赋予总统拥有比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如议会或司法部门）明显大得多的权威。此外，总统权力不仅基于正式建立的权威，而且还建立在已经长期存在的保护关系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权力不仅正式地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而且还会频繁地通过非正式的等级网络进行非官方的运作，在这个等级网络中，资源和法令的流向只遵循它们自己的规则。在新世袭主义中，与世袭主义相似的手段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的守护人

① 参见 R. Mayntz, “Informalisierung olitischer Entscheidungsprozesse”, A. Görlitz, HP Burth (Hrsg.), *Informale Verfassung*, Barden-Barden: 1998, p.59; Wolfgang Merkel and Aurel Croissant, “Formale und informale Institutionen in defekten Demokratie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2000. Vol. 41, No. 1, p. 19.

② Douglass C. North,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in John Harris, Janet Hunter, Colin M. Lewis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Routledge, 1995, p.7.

③ 在马克斯·韦伯的统治类型理论中，他将世袭主义描述为在现存传统规则中通过统治者的专制权和独裁者纯粹个人的行政和军事班子建立的亚范畴。与此相反，理性—合法规则不是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之上，而是以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完全区分开来的行政机构—官僚机构为基础。

④ Christopher Clapham,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5, p.48.

(patron) (如总统) 扮演了所有政治和行政中心仲裁者的角色, 涉及政府、部委、地区和地方行政机关、国有企业, 包括部队与保密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 相互竞争的精英则寻求保护人的庇护。新世袭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以下几个属性: 其一, 权力高度集中在守护人, 即总统手中; 其二, 个人好感或偏袒的分配, 通过守护人和受庇护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换, 建立在忠诚和依附关系基础之上; 其三, 为了政治合法性滥用国家和经济资源。^①

在新世袭政治体制中, 经济行为体 (如大公司) 的代表、党派的领导和协会的主席, 是这个由总统创建的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在世袭主义中那样, 经济行为体通过私人关系获得保护人的关照, 并接受忠诚规则的束缚。精英集团的每个代表都得到不同的位置。因此, 新世袭主义中每个精英的立场都是为了进入决策过程而竞争。为了避免某个集团获得太大的权力, 守护人必须能够平衡不同的力量。这种情况经常通过系统化的过程循环发生。通过为国内和外国企业的发展设置具体规则, 总统制定了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策。总统 (保护人) 和国家经济行为体 (受庇护者) 之间约定非正式协议, 企业家为了获得各种优势、预算资源和其他实惠, 而接受由保护人制定的行政法规。经济行为体不得不参与官僚政治的竞争, 而不是市场竞争。如果不能与国家政治领导人建立关系网络, 他们就无法在全国市场站稳脚跟并获得成功。

此外, 总统和政治经济部门的关键人物依然彼此相互依赖: 总统为了自己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和在竞选中成功地维护自身权力而依靠政治和经济精英。与此同时, 政治和经济精英也依赖于总统的资源, 因为总统的庇护能保全他们在权力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因此, 政治体制的稳定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②这些规则体系的特征是, 精英们拥有大量的能够成功保护他们免遭国内威胁和国际危机的政治战略。规则体系的稳定与从能源资源中获得的收入密切相关。高昂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使得经济精英对于

① 参见 Gero Erdmann, Ulf Engel, “Neopatrimonialism Revisited: Beyond a Catch-All Concept”, *GIGA Working Papers*, 2006, No.16.

② 参见 Robin Theobald, “Patrimonialism. Research Note”, *World Politics*, 1982, Vol.34, Issue 4, pp.548-559; Gero Erdmann, Ulf Engel, *Ibid*; Oliver Schlumberger, *Autoritarismus in Der Arabischen Welt : Ursachen, Trends Und Internationale Demokratieforderung*, Baden-Baden: Nomos Verl.-GGes., 2008.

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失去了信心。因而中期内似乎极不可能出现民主化。最后，这种依附关系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国家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的政治经济寻租行为。^①

因而，在哈萨克斯坦的例子中，新世袭主义可以同寻租国家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寻租理论假设丰富的资源（其中以石油、天然气和黄金为最）巩固了威权政体的耐久性。^②从自然资源出口中获得的租金收入使政治领导层有能力采取手段保障他们的规则，一种手段是通过创建和扩建综合性的安全监视管理系统，另一种途径是招贤纳士把精英吸纳到重要的社会集团和权力结构中。此外，资源出口收入还有助于统治阶层向社会提供服务设施（如食品补贴、免费或廉价的教育和卫生系统），减少甚至免除征税等，以提高他们在民众中的合法性。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民众对要求统治阶层信息透明化缺乏兴趣。^③

另一方面，对于经济精英来说，寻租至关重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需要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帮助，才能赚取超过在自由市场上的收益的租金。企业寻租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得到国家对公司业务的支持和促进（如政府的合同、补贴等）；二是获得国家的特权（如减免税收、获得垄断地位、或者出口配额优惠等）；三是规避国家法规条例对公司业务的影响（如对外贸易壁垒、安全或环境法规、牌照义务等）。^④

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关系

哈萨克斯坦是苏联解体的产物，它的成立并非是自主自愿的。前苏联时期共和国的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就成了这个独立国家的总统。然而，国家元首无法将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民族国家传统或者新的精英群体之上。此外，一

① 参见 Oliver Schlumberger, Ibid; Peter Pawelka, *Der Staat im Vorderen Orient : Konstruktion und Legitimation politischer Herrschaft*. Baden-Baden: Nomos 2008.

② 参见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eds.), *The Rentier State*, Routledge, 1987.

③ 参见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Ibid; Peter Pawelka, *Der Vordere Orient Und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W. Kohlhammer, 1993.

④ Heiko Pleines, *Wirtschaftseliten und Politik im Russland der Jelzin- Ära (1994-99)*, Münster: LIT Verlag, 2003.

些地方行政长官曾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任职，他们继续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内政治中，这就意味着哈萨克斯坦的精英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总统委任那些前苏共高官负责关键岗位，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亲属或者亲信。因此，总统在自己周围建起了一个忠诚的人脉圈，同时确保了高层次政治精英的连续性。^①

这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基本特征。在该国共产党内，对如何重建国家毫无共识。新当选的总统可以游刃有余地在现有的国家结构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家的权力机制。因此，尽管共和国推出了保障公民权利、自由选举和多党体制的自由民主宪法，但这些制度屡遭侵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是宪法的根基。但是总统还设立了总统办公厅（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其权威在实质上削弱了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权力空间。此外，总统可以通过总统法令或者举行全民公决，废除令他反感的法律，总统拥有否决权和启动宪法变更的权力。而且，总统有权调整或取消国家行政机关，有权任命或罢免地方行政机关（Akims）的领导。^②因此，总统是哈萨克斯坦政治中的主角和监管人。

然而，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化改革和自由化，使精英的组成发生变动并引发内部竞争：具有不同背景和来历的“新生代”能够控制一定数量的经济部门和大众传媒。这些群体的形成建立了独立的权力基础，从而削弱了国家对政治经济的垄断权。然而，他们并非同质性的群体，他们之间通常会因为经济、行政和地区利益的竞争、向中央行政施加压力等问题而产生冲突。这使纳扎尔巴耶夫面临着整合国内政治和经济精英的问题。正如卡明斯（Sally N. Cumming）所说，“这种专制不是简单地产生于自上而下的强制，而更是现在的精英进行高级别谈判、讨价还价和收编拉拢的产物。正式的宪法和法律条文的最初议定，只不过是为主要政治人物竞相确立权威提供一个框架。”^③

因此，不同的非正式集团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分离，如大型制造商和技术

① 参见 Jonathan Murphy, “Illusory Transition? Elite Reconstitution in Kazakhstan, 1989-2002”, *Europe-Asia Studies*, 2006, Vol.58, Issue 4, pp.523-554; Sally N. Cummings, *Kazakhstan: Power and the Elite...*; Кан Пхён К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Сравнение и оценки. Социс, 2006 №1, С.147 -152.

② 哈萨克斯坦 1995 宪法：第 40-48 条。

③ Sally N. Cummings, *Kazakhstan: Power and the Elite* p.140.

专家，以及他们对总统个人的忠诚，为高度个人化的规则体系奠定了基础。这种情况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权力结构，这一结构的基础不是权威分配的制度化，而是权力的非正式转移，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通过非正式渠道转移到忠诚于总统的群体手中，总统则扮演中间人和法官的角色。总统和忠诚群体的相互支持，使当权者得以在保持规则延续性的同时又能将权力与财产合为一体。^①

研究人员已从不同的角度，包括民族和民族政策、集团成员、地区和区域起源等视角，研究了总统的人事政策和哈萨克斯坦政治中派别的形成。在这些调查研究中，对于部族在哈萨克斯坦精英形成中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尚无明确一致的认识。对其定义、组成和部族重要性的界定都比较模糊不清。一些研究将部族理解为通过亲属关系或由于共同的起源而捆绑在一起的大家族，部族中存在着强烈的群体身份意识，其成员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支持，竭力维护家族的权力。^②

哈萨克部族的特殊性是，部族在传统意义上划分为三个部族领地集团，也就是所谓的玉兹（Zhuz）。大玉兹（Uli Zhuz）控制着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东南部的大草原，中等部落也称为中玉兹（Orta Zhuz）占据中部、北部和东北部，小玉兹（Kishi Zhuz）在西部和西北部。游牧部落不是部族，而是氏族联盟。对游牧部落的角色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其作用令人费解——相对民族身份和出生地来说——游牧部落和氏族联盟的成员既不在官方正式记录中，也没有出现在官方网站上，或者拥有明确的哈萨克斯坦身份。在哈萨克斯坦人身份的辩论中，对于氏族联盟和游牧部落的区分以及游牧部落在哈萨克斯坦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都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一些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被当作部族的游牧部落之间的无形战争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然而，纳扎尔巴耶夫能设法在这些部落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也为自己所属的大部落的成

① 参见 Sally N. Cummings, *Ibid*;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 Isaacs, “‘Papa’ Nazarbayev: The Discourse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2010. Vol.10 (3), pp. 435-52.

② Beate Eschment, “Elitenrekrutierung in Kasachstan. Nationalität, Klan, Region, Generation”, *Osteuropa*, 2007, Vol.57, No.8-9, p.180;

员安排重要职位。^①柯林斯 (Kathleen Collins) 和沙茨 (Edward Schatz) 两位学者也对部族身份的研究产生影响。^②沙茨认为, 哈萨克人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主要以部族归属确定身份。沙皇和后来的苏联当局试图压制他们的部族认同, 但是哈萨克身份从未消失。在前苏联经济匮乏的年代, 由于哈萨克人在资源分配机制中至关重要 (这些资源都是难以获得的), 所以当局允许部族存续。在沙茨对当代政治学的分析中, 他集中研究被他界定为 “伞状氏族” (umbrella clans) 的游牧部落。他仔细检查了那些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和他们的游牧部落成员资格, 结果发现, 游牧部落继续在重要职位的分配上保持着决定性的作用。^③由哈萨克斯坦学者叶塞诺娃 (Saulesh Esenova), 阿梅尔库洛夫 (Amerkulov) 和乌姆别塔利耶娃 (Umbetalieva) 等人得出的研究结论则与此相反。第一代身份的地位增加了部落在哈萨克斯坦政治中的份量。总体而言, 他们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在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了。^④

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界定的部族 (clan) 不足以分析哈萨克斯坦精英的构成, 在许多方面也存在问题。这会使人将哈萨克斯坦理解为一种 “传统社会”, 从而忽视了对部族的理解。部族是一种 “派系、经济和依恃关系的集团” (a factional economic and clientelistic group), 认识这一点对理解当代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条件至关重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 随着新的经济精英

① Нурбулат Маса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элита: клановая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и внутриэтническ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естник Евразии. 1996. №1.С. 46-61; Nurbulat Masanov, “The Role of Clans in Kazakhstan today”,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Prism, 1998, No.3,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20207&tx_ttnews%5BbackPid%5D=220 (accessed 07.06 2010); Beate Eschment, “Elitenrekrutierung in Kasachstan. Nationalität, Klan, Region, Generation”,...

② 参见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Edward Schatz, *Modern Clan Politics. The Power of “Blood” in Kazakhstan and Beyond*,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Edward Schatz, *Ibid.*

④ Saulesh Esenova, “‘Tribalism’ and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 The Case of Kazakh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1998, Vol.17, No.3, pp.443-462; Нурлан Амеркулов. Жузы 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0. №3.С.131-146; T Umbetalieva, “Kazaks Hold Their Tongues”,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Reporting, RCA No.57, 2001.

出现，“部族”这个概念也被用来指称社会精英中的商业集团。商业集团（business clans）的代表们拥有直接接触权力顶层人物——总统和他的亲信——的特权。后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商业集团的经营活动，并从这些战略性联盟关系中获益。商业集团产生于依附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在这种关系中，民族、出身于什么地方和家族关系的作用微不足道。保护人（patrons）建立了这些等级网络以追求政治和经济的“共生”（symbiosis）利益。^①这个网络往往具有非对称性结构，符合交换资源、信息和偏好的需要。商业集团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经济资源和它们的代表与总统的私人关系。根据伊萨克（Isaak）的研究，“集团政治的现象反映了权力核心制定的采掘业政策（extractive policies）导致派系之间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争斗。因此，派系之争（factionalism）不一定是基于亲缘认同和家族关系，而是以差异更广泛的因素为基础，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经济分歧和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网络。”^②根据艾思克门特（Beate Eschment）的研究，虽然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巧妙地在集团的竞争中找到了折衷办法，但他还是很难以类似的手法控制商业集团。^③

学者们还用地区主义（regionalism）理论来解释总统的人事政策和国家政治中不同集团的结构。使用这一方法的研究人员认为，前苏联的政策破坏了部落身份认同，用州（oblast）这个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地区身份来代替哈萨克人的部落身份。前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将旷日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带入政治等级结构中，推动了地区身份在哈萨克的形成。地区（regions）因此成为哈萨克斯坦政治中的重要因素，这一意识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得到了加强。这种观点认为，导致纳扎尔巴耶夫的中央集权政策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地区行政长官多次人事变动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总统加强个人权力的欲

① Нурлан Амеркулов. Жузы 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0. №3, С. 131-146.

② R. Isaacs, “‘Papa’ Nazarbayev: The Discourse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Nation-Building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p.5.

③ Beate Eschment, “Elitenrekrutierung in Kasachstan. Nationalität, Klan, Region, Generation”,.... p.187.

望，更多的是由于中央和行政地区之间以及双方支持者的冲突所导致的。^①

石油精英的构成

2009 年底，本研究项目的哈萨克斯坦合伙人开展了一项调查，评估了 50 位石油精英领导人的履历并对他们进行了访谈。调查发现，这些精英是一个非常同质的社会群体：都为男性。大多数曾在理工科专业学校或者石油天然气专业研究机构学习工程学或地质学。多数人持有工商管理学的第二学位，并已经取得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一些人是国家科学院，如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的自然资源研究院（Academy for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Kazakh Academy of Sciences）或国际人才学院（International Personnel Academy）的成员，有些在哈萨克斯坦的理工大学，如哈萨克斯坦国立技术大学（K.I. Satpaev Kazakh 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和阿特劳石油天然气研究所（the Atyrau Institute for Oil and Gas）担任讲师。所有的领导成员都是哈萨克族人。调查结果还显示，石油精英中存在两种群体：一类是“哈萨克石油商人”（Kazakh oilmen）（neftianiki），他们也被称为“石油大亨”（oil generals），由企业董事和国家或前苏联国有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另一类是“新生代”（newcomers），他们是一批更年轻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来自建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转型期的大型私有金融机构和综合性大型工业企业。

“哈萨克石油大亨”这类石油精英来自蕴藏丰富石油的地区，如阿特劳（Atyrau）、曼吉斯陶（Mangistau）等地。他们在上世纪 60 年代从哈萨克斯坦各地涌向产油地区，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随着岁月的积累，他们的经营发展成家族企业，有两到三代人都从事石油行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前苏联时期——一般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提拔起来的。大约 70% 的石油商人开始从事石油业的时候，担任着地区行政负责人或地方党委的领导。党中央委派他们到能源行业的各个公司里从事管理工作。他们通过与政治决策层和大公司管理人员的双向联系，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人脉。因此，

^① Pauline Jones Luong, “Economic ‘Decentralisation’ in Kazakhsta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Pauline Jones Luong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States and Societies from Soviet Rules to Independence*, London: Ithaka, 2004, pp. 182-210.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私有化阶段，他们能够保证拥有经济上的特许权，往往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低价收购产油区的石油公司。他们保持着与国家官员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他们委以要职，派他们到国家部委、行政当局和国家石油公司担任关键职务。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拉维尔·谢尔达巴耶夫（Ravil Cherdabaev）和他的两个兄弟，鲍里斯（Boris）和玛加维亚（Magauia），努尔别尔格恩·巴尔吉姆巴耶夫（Nurbergen Balgimbaev），萨菲·乌捷巴耶夫（Safi Utebaev），阿斯卡尔·库利巴耶夫（Askar Kulibaev）和孟杰斯赫·萨里霍夫（Mendesh Salikhov）。

“新生代”——由年轻商人转变而来的技术官僚，也被称为少壮派石油精英（mladoturki）（Young Turks）。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背景。他们都是男性，二十来岁的时候就从事商业经营，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们在前苏联的知名学府或者在国外求学。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们受益于刚刚起步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一跃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人士曾是前苏联共产主义青年组织（Communist youth organisation）共青团（Komsomol）的成员。他们抓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规范的转型时机，在家族与统治精英纽带关系的帮助下，利用国有资金，成功地建立起中等规模的公司或银行。这些商业活动的特征是，自己的资金不必冒巨大风险就能赚取大额利润。他们利用市场机制刚刚创建的机会，在私有化了的公司之外组建大型金融产业集团（FIGs）和重组国有银行。总统雇用他们，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来克服经济危机。因此，很多年轻的商人成了“垂直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施加影响的能力有限。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受国家资助在国外接受教育，并已与西方的商业圈和金融界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因此他们在同外国投资者的联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很多人受总统任命在行政管理部门或在大型石油公司任职。他们都有在美国石油公司实习的经历。他们组成了一个与总统和政府密切合作的小型金融财阀集团。他们被冠以“寡头”（oligarchs）的称呼，在哈萨克斯坦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这个集团最重要的人物有：阿斯卡尔·库利巴耶夫（Askar Kulibaev）的儿子铁木尔·库利巴耶夫（Timur Kulibaev），总统的侄子努尔兰·卡帕罗夫（Nurlan Kapparov），乌拉兹·赞多索夫（Uraz Zhandosov），

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 (Mukhtar Abliasov) 和萨乌亚特·缅恩巴耶夫 (Saut Mynbaev)。

此外，石油精英的组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人事政策，人员构成经常发生变化：石油精英的成员担任部长、总统顾问和国家能源公司董事的平均时间一般只有两到三年。他们经常由于种种原因丢掉职位，如涉嫌腐败、被控越权、或重塑石油工业权力分配结构的计划失败等等。有些人一次次地被纳扎尔巴耶夫委以要职，又一次次地被罢免。失去职位后，他们经常回到他们早期曾经担任过管理工作的公司，或者组建自己的顾问公司，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市场。

石油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互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蕴藏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其大型工业部门曾是前苏联经济的动力源泉之一。由于缺乏将工业地区与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交通设施，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工业在苏联解体后随之瓦解。由于哈萨克斯坦缺乏石油加工业，许多石油产品不得不从俄罗斯进口。哈萨克斯坦缺乏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机制来组织和规范石油生产部门。此外，在前苏联管辖之下，哈萨克的石油生产已经严重依赖莫斯科的补贴。获得独立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将能源部门作为最优先发展的对象。^①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按照“先经济后政治”的施政纲领，决定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向外资开放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哈萨克斯坦的各种经济发展战略都强调长期发展计划。这些战略模仿前苏联在上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经济计划，即对商品劳务的生产与分配实行集中管理、建立等级结构和确立经

^① 参见 Brill Martha Olcott, *The Kazakh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regory Gleason, *Markets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Structural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Ariel Cohen, *Kazakhstan: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Energy Policy and the Birth of a Nation*, Stockholm: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m, 2008.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inside/publications/Cohen.html>(accessed 15.05.2010); Ашимбаев Данияр. 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Казах -стане: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Алма-Ата, 2008; Ашимбаев Данияр. Власть, нефть и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ловой журнал Kazakhstan. 2008.№4. <http://www.nomad.su/?=2-200810170328>(accessed 03.06.2010)

济行为体的从属关系。^①

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第一波谈判始于苏联垮台之前。1988年12月，前苏联石油部同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oration）签署了一份关于开采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田吉兹油田（Tengiz oil field）的协议。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决定撤销该协议，并同雪佛龙公司重新签订一份合同。经过两年的谈判，新协议在1992年达成。双方成立了一家名为“田吉兹雪佛龙联合运营公司”（Operation Tengizcherol）的合资公司。^②同时政府还同英国天然气公司（British Gas，现在的BG集团）和阿吉普（Agip，现为埃尼公司）签订了第二大的合同，开发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卡拉查干纳克（Karachaganak）气田。^③这些合资公司的成功建立，迫使哈萨克斯坦政府加快国内部门的重组。^④

政府不得不从两方面着手推动这一任务的完成。首先，它需要建立必要的部委和国有公司，以整合不同的国家石油公司。另一方面，它必须建立法律框架，以规范不同机构之间的关系。消除权力结构真空的第一步，是要将从事油气开采生产和提炼加工的国有经营单位纳入到一个单一的国有公司，即1992年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Kazakhstanmunaigaz）中。该公司有权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府处理油气开采合同。与此同时，政府成立了两个部委，分别是负责规范油气生产的能源与燃料资源部（Ministry of Energy and Fuel Resources）和地质矿产资源保护部（Ministry of Geology and the Protec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有两个重要因素阻碍着国有公司与这两个

① Верхотуров Д.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опыт, АПН – Казахстан, 2006-3-17, <http://www.apn.kz/publications/article259.htm>(accessed 07.06.2010)

② 哈萨克斯坦政府授予雪佛龙公司40年的开采权。哈萨克斯坦拥有这家合资公司800亿美元的资产，雪佛龙约占20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获得净收入的80.4%，雪佛龙获得19.6%。参见 James Dorian, Shakarim Zhanseitov and Indiyanto Hartono, “The Kazakh Oil Industry: A Potential Critical Role in Central Asia”, *Energy Policy*, 1994, Vol.22, No.8, p. 691.

③ 1997年另外两个公司，德士古（Texaco，现为雪佛龙公司的一部分）和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加入合资。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几家公司签订了一个为期40年的产品分成协议（PSA），成立了卡拉查干纳克石油运营公司（Karachaganak Petroleum Operating），其中BG集团和埃尼公司（ENI）是联合运营商，各占32.5%的股权，雪佛龙和卢克石油分别占有20%和15%的股权。参见 Anne E. Pec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azakhstan: The Role of Larg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London: Routledge Gurzon, 2004, p.188.

④ Brill Martha Olcott, *The Kazakhs...*, pp. 148-149.

部门之间的结构调整和职责分配：一是前苏联时期石油工业部门由许多部委负责管理，这个组织传统遗留下来，影响着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石油业；二是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如石油公司的领导们）为了自身利益试图操纵和驾驭石油工业进程。^①1993年政府宣布了对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进行私有化的计划后，不同部委机关之间的冲突公开爆发了。意见分歧集中在与外国公司谈判哈萨克斯坦公司私有化的责任问题上。地质部的领导认为应该由他们的部门来掌控谈判，因为他们负责签发许可证和开采油田。能源与燃料资源部则反对政府的计划，认为出售国有股意味着“出卖国家利益”。^②

私有化计划也在议会的民族政党代表中激起抗议。许多国会议员指责总统违背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利益，不同意通过有关法律。这导致了总统和议员之间的公开冲突。因此，总统于1993年12月解散了议会，这一举措得到议会中亲总统势力的支持。直到1994年3月新议会选举之前，总统以法令统治国家。在此期间，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能源与燃料资源部，在原有基础上重建了两个新部门——能源与煤炭工业部（Ministry of Energy and the Coal Industry）和石油天然气工业部（Ministry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此外，他扩大了地质部的权力，赋予其与外国投资者谈判和签署合同的权力。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更名为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Munaigaz）。然而，这仍是一家国有公司，不隶属于任何新的部委。许多专家将此解释为总统采取的深思熟虑的战略，目的在于阻止石油决策部门出现强大的集权化倾向。^③此外，总统还任命来自阿特劳的石油大亨切尔达巴耶夫（Cherdabaev）担任石油天然气工业部部长。切尔达巴耶夫因参与同雪佛龙公司成功达成协议而受到总统的青睐。专家们认为，对切尔达巴耶夫的任命是总统长远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此举旨在平衡哈萨克石油大亨和部委之间的利益，同时还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对私有化计划的关注。切尔达巴耶夫将自己人安排进石油天然气工

① Wojciech Ostrowski, *Politics and Oil in Kazakhsta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33.

② 参见 Mikhail Ustiugov, “Big oil moves i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 (Special Issue: Kazakhstan), October 1, 1993, Vol.49. No.8, pp. 44-47; Oleg Puzanov,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ast”,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 (Special Issue: Kazakhstan), October 1, 1993, Vol.49. No.8, p. 47.

③ Wojciech Ostrowski, *Politics and Oil in Kazakhstan*,...p.36.

业部，使得“石油大亨”控制了该部的重要职位。石油天然气工业部为石油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计划，包括对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进行重组，使其成为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国家石油公司——哈萨克石油公司（the Kazakh Oil Company）——将所有国家石油公司纳入一个整体。此后，哈萨克石油公司的部分资产将被私有化，而绝大多数资产将继续由国家控制。

该计划并没有得到纳扎尔巴耶夫的同意，因为他担心失去对石油工业的控制和大权旁落到哈萨克石油大亨手中。六个月后，切尔达巴耶夫被解职，接替他的是一位更加忠诚的“石油大亨”努尔兰·巴尔吉姆巴耶夫（Nurlan Balgimbaev）。新部长提出了新的改革计划，构想对分公司进行大规模重组，但是该计划不包括私有化和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股份。这些计划得到了部委和石油产区的支持，然而却违背了纳扎尔巴耶夫的意愿。这些事情的发生正好与哈萨克斯坦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同期发生，因此改革的提议遭到挫败。为了解决国内问题，哈萨克斯坦不得不转向外国投资者。因此，1994年10月巴尔吉姆巴耶夫和其他部长们纷纷被解职。一个同旧“石油大亨”没有直接联系的完全由新人组成的集团，进入哈萨克斯坦行政机构的核心位置。阿克让·卡热格尔金（Akezhan Kazhegeldin）成了哈萨克斯坦的总理，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曾在地区行政机关和克格勃工作过。

1994年10月，总统颁布了一项法令，赋予自己无需咨询国会就可以作出重大社会和经济决定的权力。随后的议会选举使得纳扎尔巴耶夫得以将更多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安排到立法机关中。这些举措后来加快了新宪法的形成，新宪法大大拓展了总统在制定预算和社会经济发展方案方面的权限。因此，纳扎尔巴耶夫以法令的形式就规范石油开采和与外国投资者签订协议颁布了两项基本法律，即1995年6月26日的“石油法”和1996年1月27日的“地下资源及其使用法”。这些法律为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生产规定了两种地下资源使用合同：产品分成协议（PSA）和超额利润税（EPT）。^①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范，相反这些法律规定由各部委具体负责执行。因而，每个产品分成协议都需要有一个单独的必须由行政当局认可的协议来规范

^① Ernst & Young, *Kazakhstan oil and gas tax guide 2009*, pp. 9-12.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FILE/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pdf](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FILE/Kazakhstan-oil-and-gas-tax-guide-2009-EN.pdf) (accessed 17.06.2010)

投资者的选择、税收水平、合同期限等事宜。这些条款对惠及投资者的合同规定了整个合同期间的约束性税率。^①此外，纳扎尔巴耶夫试图消除或调和地方上的反对声音。他通过了一项改革地方政府的新法律，明显地限制了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例如限制他们与外国投资者谈判和签署产品分成协议。然后他将行政区进行了合并，将其数量从 19 个减少到了 14 个。^②这些法律有助于加速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的私有化，有利于将同外国投资者的协议延伸扩展到开发新油田方面。两年中，三家大型国有石油生产企业出售给了外国投资者：印度尼西亚的梅科（Medco）能源集团以 2.48 亿美元收购了哈萨克斯坦 MMG 油田公司（MangistauMunaiGaz）85% 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以 1340 万美元收购了阿克纠宾油气公司（AktobeMunaiGaz）60% 的股份和乌津（Uzen）油田 60% 的股权。^③与外资的成功合作也增加了卡热格尔金的政治影响力，这令纳扎尔巴耶夫有些难以接受。与此同时，一直被排挤在私有化之外的哈萨克石油商人和地方行政机构（Akims）开始提出抗议。来自哈萨克斯坦 MMG 油田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无数雇员在曼吉斯陶（mangistau）地区组织的一场公开抗议活动将局势推向了高潮。因此，纳扎尔巴耶夫在 1997 年 3 月颁布了名为“改革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实体机构的补充措施”的法令，解散了负责石油工业的有关部委，以“哈萨克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Kazakhoil 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y）取而代之。该公司的权力大增，例如可以代表国家利益与外国投资者谈判合资公司和产品分成协议。此外，90% 的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的国有石油生产商被转移到新建的哈萨克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Kazakhoil）。同月，巴尔吉姆巴耶夫，即前石油与天然气部长，成了哈萨克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负责人。卡热格尔金辞职，但他的政治野心丝毫不减。1998 年他创立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of Kazakhstan）。1999 年，他试图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没有得到许可。此后不久，税务机关对他发起

① Редакционный обзор.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разделе продук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еловой журнал Kazakhstan №3, 2000 год. <http://investkz.com/journals/26/408.html>

② 参见 Назарбаев Н. А.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путь, Караганда, 2006.

③ Sergei Smirnov, "Oil strategy of Kazakhstan: Dreams and facts",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2000, No.6, p. 163; Anne E. Pec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azakhstan*,...pp. 165-172.

了一项逃税调查。于是卡热格爾金离开哈萨克斯坦前往国外。^①

在 1997 年和 1998 年间，纳扎尔巴耶夫在部委和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了人事调整，将“新生代”石油精英安排到关键职位上。一批杰出的哈萨克斯坦寡头进入政治层：让多索夫（Uraz Zhandosov）成为第一副总理和国家投资委员会主席；阿布利亚佐夫（Mukhtar Abliazov）被任命为电力工业和贸易部长，緬巴耶夫成为财政部长。总统也开始将自己的家庭成员安排到领导岗位。他的女婿铁木尔·库利巴耶夫当上了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财务总监和副总裁。库利巴耶夫在分公司为自己的一批亲信和朋友安排了重要位置，由此增强自己在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影响力，^②这就导致了“新生代”石油精英与公司总负责人巴尔吉姆巴耶夫之间的公开冲突。巴尔吉姆巴耶夫试图提醒总统注意“新生代”对石油业发展带来的危险，但是，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新生代”管理者。1997 年巴尔吉姆巴耶夫被免去公司的职位，但被任命为总理。“新生代”和总统女婿库利巴耶夫的亲信努尔兰·卡帕罗夫（Nurlan Kapparov）成为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新任领导。此外，“新生代”石油精英的管理能力证明了只有专业商人才能成功实施石油领域经济改革，因此他们担任管理者具有充分的正当性。^③

随着新生代接替各部委和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中的职位，新生代积极地推动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公司的私有化。两年内有十多项产品分成协议签署，并与外国投资者成立了一批合资公司。“新生代”成功地向外国人出售了 60% 以上的国有公司，这些企业的资产往往通过境外公司受控于哈萨克斯坦商界精英成员。不仅库利巴耶夫，而且总统的女儿达丽嘉（Dariga）和她从哈萨克斯坦 MMG 油田公司中获益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丈夫拉哈特·阿

① 参见 Wojciech Ostrowski, *Politics and Oil in Kazakhstan*,...; Olcott Brill Martha, “Kazmunaigaz - Kazakhstan's 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y”, paper was written for the joint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Japan Petroleum Energy Center Policy report,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Kaz_Olcott.pdf (accessed 15.05.2010); Barbara Junisbai and Azamat Junisbai, “The Democratic Choice of Kazakhstan: A Case Study i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Demokratizatsiya*, 2005, Vol.13, No.3, pp. 373-392.

② Wojciech Ostrowski, *Politics and Oil in Kazakhstan*,...p.49.

③ 参见 Pauline J. Luong, “Economic ‘Decentralisation’ in Kazakhsta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eate Eschment, “Elitenrekrutierung in Kasachstan. Nationalität, Klan, Region, Generation”...

利耶夫 (Rakhat Aliev), 也都进入了石油业。^①这就造成寡头与阿利耶夫为在石油业中的影响力展开竞争, 这一竞争后来蔓延到其他经济部门。寡头们不能接受总统的家庭成员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并要求总统将“游戏规则”正常化。为了保护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 寡头们成立了“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党”(Democratic Choice of Kazakhstan, DCK)。尽管该党对总统的批评非常有限, 但总统认为这是一个不忠诚的反对党。政府对此作出了反应, 对阿布利亚佐夫和他的公司及其他人启动了多种法律程序, 如逃税调查。阿布利亚佐夫被判刑六年。他在提前释放后逃往国外。2005 年法院命令解散该党。^②

石油商人们没有卷入总统与寡头之间的冲突。但是, 他们间接地支持纳扎尔巴耶夫, 比如禁止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党在他们的地盘活动。奥斯托维斯基 (Ostrowski) 认为, “石油商人支持纳扎尔巴耶夫是由于在私有化期间和之后, 总统向他们保证了国营公司向私有企业的平稳过渡。近年来纳扎尔巴耶夫已经象征性地表彰了他的盟友, 将主要石油家族的代表和与新旧石油项目有关的人士安排到新成立的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 (Kazmunaigaz) 的高层职位上, 给予哈萨克石油商人获得新石油协议的优先权。^③

2002 年 2 月, 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了一项法令, 对能源部门的国有资产进行新的重组。这项法令将“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Kazakhoil) 与“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Transportation of Oil and Gas) 合并为“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National Company Kazmunaigaz)。这一举动背后的深层次目标, 是制定关于原材料使用的统一的国家政策, 建立中央监管机构, 尤其是管理里海大陆架产品分成协议项目。这家新成立的公司的最高职位给了“哈萨克石油大亨”: 来自阿特劳产油区的克林诺夫 (Liazat Klinov) 当上了公司总裁, 卡拉巴林 (Uzakbai Karabalin) 成了公司的董事长。代表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利益的库利巴耶夫则是公司的副总裁。这项新政策的受益者决

① Anne E. Pec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Kazakhstan: The Role of Larg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p.169; Wojciech Ostrowski, *Politics and Oil in Kazakhstan*,... p.56.

② Barbara Junisbai and Azamat Junisbai, “The Democratic Choice of Kazakhstan: A Case Study i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Barbara Junisbai, “A Tale of Two Kazakhstans: Sources of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onflicts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Europe-Asia Studies*, 2010, Vol.62, No.2, pp.235-269.

③ Wojciech Ostrowski, *Ibid*, p.56.

定支持购买外国投资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此外，在 2003 年年底，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代表们开始强烈地公开批评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软弱态度。他们指责政府向外商征收极低的税赋和给予外商特权，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侵害了国家收入，对国内生产者构成歧视，从而损坏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利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建议制定一项能考虑到国有公司利益的产品分成协议法(PSA law)。为了回应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提出的倡议，政府委托法律专家起草了相关的法律文本。此外，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组织了联合协商会议，与政府公开讨论税收法、产品分成协议的一般规则，以及其他解决争端的方法等等。数月后，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将该法律草案提交议会。^①经过漫长的辩论之后，该法案未经重大改动在议会通过，并于 2005 年 7 月初获得总统签字批准。在众多规定中，这一法律保障国有公司在新的产品分成协议中拥有最低 50% 份额的权利。此外，政府授权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 (Kazmunaigaz) 公司在产品分成协议中代表国家利益，管理国家在生产利润中所占的份额和监督外国投资者的工作 (2005 年产品分成协议法第 11 条)。产品分成协议法还包括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配额”，规定外国公司有责任购买一定数量哈萨克斯坦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雇用当地人进入公司工作。配额准确的水准以及其他细节，将在每个产品分成协议中单独规定。(产品分成协议法第 27 条)。到目前为止，配额介于 0 到 30% 之间。然而，政府希望到 2015 年将这一额度提高到 70%。由于产品分成协议法中商定的条款在合同期内保持不变，因此投资者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只有得到双方的认可才能变更合同。(产品分成协议法第 25 条)。

然而，在 2009 年 1 月 1 日，新生效的税收法取消了给予石油公司的一系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代表强烈批评了新税

① “Нефтяники и теоретики-юристы Казахстана выступают за ужесточе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й базы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ефтяных компаний”, “Хабар”, 21 августа 2003 года. [http:// www.nomad.su/ index.php?a = 3- 200308220027](http://www.nomad.su/index.php?a=3-200308220027) (accessed 16.06.2010); “При активной добыче нефт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ую базу—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НК “КазМунайГаз”, “Казинфом”, 21 августа 2003 года. [http:// www.nomad.su/index.php?a= 3-200308220027](http://www.nomad.su/index.php?a=3-200308220027) (accessed 16.06.2010) ; Петр Новиков. Тендер: вечно теневая сторона// Gazeta.kz, 01.08.2003. [http://articles.gazeta.kz/ art.asp?aid=32079](http://articles.gazeta.kz/art.asp?aid=32079)(accessed 04.05.2010)

法，认为新税法的规定没有考虑到石油生产的特殊情况，或者世界市场的不稳定，会造成公司成本的大幅上升。政府则回应，承诺调查税收基础。但是，国家还表示，如果公司保证不会裁员，可以降低税收水平。此外，新税法取消了产品分成协议中一项最重要的条款——产品分成协议安排下的税收稳定。然而，对某些产品分成协议和由总统批准的合同却网开一面。不过新的税法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产品分成协议享有例外。因此，所有在 2004 年 1 月 1 日以前签订合同的生产商丧失了稳定的税收制度保障。新税法影响到了 600 个已签订的合同，其中包括 15 项同卡沙甘公司（Kashagan）和卡拉查干纳克公司（Karachaganak）签订的产品分成协议，约占哈萨克斯坦原料采掘业合同的 80%。^①但是，国家反复强调新税收规则将在定价和计税方面更加透明。尽管如此，两种税收的差距和新税法中的苛刻措辞将对企业造成更多问题，使税务机关有更多机会找企业的麻烦。

政府在实现石油业国有化和约束外国投资者权利方面继续努力，颁布了一项新法——“地下资源及其使用法”（Law On Subsurface and Subsurface Use）。该法由议会与相关责任部委在 2009 年共同起草，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2010 年 6 月 24 日签署生效。该法废除了产品分成协议的合同形式，代之以三类合同：勘探合同、开采合同、关于难以获得的原料的勘探和开采合同（第 61、69 条）。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国有石油公司获得了颁发原料开采和加工许可证的优先权，也有权优先收购参与原料开采的公司的股份（第 12 条）。此外，地下资源及其使用法规定，如果合同担保影响到国家安全、环境安全、税收法律或者海关规定，可以变更法律来制约合同担保。这使得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改税收制度，在协议没有达成或对国家、经济或生态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改变合同条款，单方面解除合同（第 30 条、72 条）。而且，签订合同的公司不得不接受“哈萨克斯坦配额”，也就是优先采购当地的产品和劳务，优先雇用当地工人（第 71-72 条）。

但是，在地下资源及其使用法规定，在该法生效前签订的合同在合同存

① Ирина ФЕЛЬ. СРП не пересмотрят, <http://www.kursiv.kz/weekly/industriya-weekly/1195203940-srp-ne-peresmotryat.html> (accessed 18.06.2010); Досым Сатпаев. Соглашения о разделе продукции будут пересмотрены// Наша Агаша. ново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а. <http://www.nashaagasha.org/news/652/> (accessed 01.06.2010)

续期中仍具有合同效力，尽管这些合同必须适应“哈萨克斯坦配额”（第 129 条）。专家相信，这一妥协表明政府担心失去外国投资者这一合作伙伴。如果失去外国合作伙伴，哈萨克斯坦将不得不单独开发新油田。由于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既缺乏技术又缺少专家，开发新油田将面临重重困难。此外，哈萨克斯坦或许会迅速丧失支持其实施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哈萨克斯坦政府不太可能单方面取消已经签订的产品分成协议。相反，政府将利用其他手段向外国投资者施加压力，如改变税收规则、由环境和反垄断机构定期调查，检查公司对“哈萨克斯坦配额”的执行情况等。

政府不仅通过更改法律框架，而且通过补贴的形式支持国内公司。例如，在 2009 年，政府与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hamber）共同拟定了哈萨克斯坦 2010—2014 年工业发展新计划，总统于 2010 年初签署了该计划。根据总统 2010 年第 958 号法令，该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发展石油加工业，促进石油业的设施建设，提高哈萨克斯坦三大重要炼油厂的产能。政府从国家基金中拿出了 80 亿美元用于实施这项计划。为了同一个目标，政府再次重组了石油产业：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失去了管理投资项目和与外国投资者签订合同的权力，这些权力转给了 2010 年 5 月新成立的石油天然气部，其理由是“石油天然气部可以在功能上将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从国家和商业利益间的冲突中解脱出来”。^①此外，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必须将它的许多子公司交给中小规模的公司。具体移交事宜将由石油天然气部决定。缅甸巴耶夫作为一位“新生代”石油精英、库利巴耶夫的好友，被任命为石油天然气部部长。^②

这里需要指出的有趣之处是，在石油天然气部成立的同时，铁木尔·库利巴耶夫正身陷腐败官司之中。他被指控通过宣布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

①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н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ефти и газа// BNnews, 12.03.2010, <http://www.bnews.kz/main/economics/v-kazaxstane-budet-sozdano-ministerstvo-nefti-i-gaza/> (accessed 18.06.2010)

② Гаухар Жолдубекова. Эксперты оценили рокировку Назарбаева, 22.03.2010, http://news.nur.kz/14_6739.html (accessed 18.06.2010); Айдар Якубов. Назарбаев ослабил Кулибаева на фон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войны Аблязова// Радио Азаттык, 13.03.2010, http://rus.azattyq.org/content/Timur_Kulibaev_Kazmunaigaz/1982387.html (accessed 18.06.2010)

司有利可图的分公司为“无用资产”而从中非法牟利。阿布利亚佐夫，一位失宠的寡头、当局的对头，揭露了这些交易。他把证明库利巴耶夫非法活动的文件寄给了纳扎尔巴耶夫、国会议员、公诉人和反腐败委员会。此外，这些材料还在反对派报纸的网站上披露出来，激起总统的反对派和哈萨克斯坦媒体的强烈批评。^①对库利巴耶夫的调查随之展开，但是由于缺乏证据，几个月后便不了了之了。^②然而，纳扎尔巴耶夫以猛烈的批评予以回应。在2010年2月一次有哈萨克斯坦大公司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总统指责他们干预政治，他再也不能容忍。他认为，为了避免对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造成重大威胁，必须同“寡头资本主义”（oligarchic capitalism）的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总统宣布，国家的财政支持将只给予那些对国家保持忠诚并不将政治和商业混在一起的公司。^③由此，总统向企业精英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他将不会容忍任何没有经他同意的政治活动。不过，可以将对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库利巴耶夫腐败事件的处理理解为一种战术上的策略：既限制总统女婿的权力和制约有影响力的公司，同时又捍卫总统自己的集团利益和地位。

找寻正式的互动模式

自2000年以来，总统一直努力使商业和政治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新的院外活动法的出台，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启动。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律草案几易其稿。与此有关的政府、公司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很多方面，例如国家对院外活动的规范、对说客的权利和影响

① Мухамеджан Адилов. Аблязов «слил» компромат на Кулибаева// Газета “Голос Республики”.2010.№. 03 (134) , [http:// www. Respublika - kz. info/ news/ politics /7338/](http://www.Respublika - kz. info/ news/ politics /7338/) (accessed 10.06.2010); Дияраам Аркин. Финполиция начала доследственную проверку по заявлению Аблязова против Кулибаева, [http:// www. zonakz. net /articles/ 28186](http://www.zonakz.net/articles/28186) (accessed 10.06.2010)

② Аскар Ирismetов: Мухтар Аблязов contra Тимур Кулибаев: неравный поединок// <http://www.ia-centr.ru/expert/7405/> (accessed 16.06.2010)

③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не будет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 Назарбаев// <http://www.bnews.kz/main/economics/v-kazaxstane-ne-budet-oligarxicheskogo-kapitala-%E2%80%93-nazarbaev/> (accessed 16.06.2010); Юлия Нитченко. Бизнесмены, не лезьте в политику//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Казахстан» 02.03.2010, <http://www.kp.kz/node/7422> (accessed 16.06.2010)

的规定等，不能达成共识。^①2009年12月的最新版本允许以公民和非国有法人的名义进行游说。但是，说客只能在议会活动。禁止对其他决策机构进行游说，如部委的主管部门、国家机构和行政当局等（2009年院外游说法草案第3条）。由于宪法赋予总统比议会更多的司法权，议会对决策的影响很小，在议会进行的正式游说对公司产生的作用有限。因此，非正式的游说渠道显得格外重要。

使商业和政治关系正常化和促进双方合作的下一个步骤，是2005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hamber *Atameken*）的成立。这个委员会汇集了2000多家哈萨克斯坦公司和200家企业集团，包括哈萨克能源企业协会（Kazenergy）和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它们共雇用了约150万名员工。委员会的宗旨是为国家对商业立法和规则制定做准备，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与政界人士合作的主要场合是在议会，许多议员也是委员会的代表。（2010年作者对库利巴耶夫的访谈）。此外，2005年11月哈萨克油气及能源企业协会（Kazenergy Association）成立，其目的是为了在国家机构中代表和保护行业协会成员的利益，为石油工厂、发电厂和分销公司建立非正式网络，发展当地、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合作和发扬企业家精神。这个协会的成员包括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如参加产品分成协议的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BG集团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协会的工作依靠十个委员会运作，如税收和立法程序协调委员会和能源工业发展协调委员会。由于这两个组织是在总统的建议下成立的，并由总统的女婿库利巴耶夫担任领导，哈萨克斯坦的专家认为，这两个组织都是总统的计划，旨在招募经济精英并对其加以监管控制。^②在将国家经济委员会转化为政党的问题上，控制商人显得很困难。在2005年底，委员会的首领和代表陀斯

① Анна Калашникова. Будет ли законное лобб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 мнения экспертов, <http://www.spik.kz/?lan=ru&id=104&pub=1646> (accessed 16.06.2010); Оптимальная модель лобб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Risk.kz «Группа оценки рисков», Май 29, 2010, <http://risk.kz/12161>(accessed 01.06.2010)

② 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 Так кто стоит за партией “Атамекен”// “Республика”, 23 февраля 2003 года, <http://www.nomad.su/?a=10-200702260218> (accessed 10.06.2010); Ержан Карабек. Ержан Досмухамедов: два года партии «Атамекен», но без клятвы Тимуру Кулибаеву ее не узаконить// Радио Азаттык, 27.10.2008, http://rus.azattyq.org/content/Erzhan_Dosmukhamedov/1333193.html (accessed 03.06.2010)

穆恰梅多夫 (Jerzhan Dosmucharmedov) 宣布, 为了向社会和法律改革施加影响和增加商人对政治的参与, 有必要成立一个政党。那时他还是总统的企业家理事会成员、铁木尔·库利巴耶夫的私人顾问。^① 行政当局也对这一申明表示欢迎, 只要新政党支持亲政府的“祖国光明党”(Otan)。但是不久以后, 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 由于一些委员会领导, 包括陀斯穆恰梅多夫本人, 认为如果新政党支持“祖国光明党”, 将无助于实现委员会谋求改革的政治主张, 因此他们不愿意在 2007 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祖国光明党”。^② 此后, 以陀斯穆恰梅多夫为核心的集团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并同其他自由政党组成联盟参加议会选举。国家以镇压的方式予以回应: 不允许这个政党进行注册, 禁止其参加选举。陀斯穆恰梅多夫的所有职位都被撤销, 不得不逃亡国外。他后来在一次专访中申明, 由于他拒绝与行政当局合作和已经对库利巴耶夫不忠, 他和他的政党遭到了镇压。^③

结 语

因此, 参与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门的有关人士都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正式或非正式的下属。能源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 这种非正式的网络绕开了正式的决策渠道, 而且非正式关系网络有着正式渠道不能替代的功能, 这就是哈萨克斯坦能源政策的基本特征和现实。苏联时代的关系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像在共产党、国家能源公司、地方机构和家族内进行的合作那样。这种个人的、非正式的政策执行方式, 意味着官员的实际决策能力不必胜任所担任的职务。官员得到升迁的最重要原因是对保护人——总统的忠诚。纳扎尔巴耶夫周围的主要人物因此获得了、并运用着正常情况下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 并由此将影响渗透到其他领域, 如经济部门。在这种世袭体制下, 通过任命到部委、进入行政当局、担

① Глава союза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и работодателей “Атамекен”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в будущем ег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партию// Интерфакс-Казахстан, 8 июля 2005 года. <http://www.pomad.su/?a=3-200500507110127> (accessed 04.06.2010)

② <http://www.zonakz.net/articles/16001> (accessed 04.06.2010)

③ Ержан Карабек. Ержан Досмухамедов: два года партии «Атамекен», но без клятвы Тимуру Кулибаеву ее не узаконить

任资源区的行政长官和在国家石油公司中担任要职等手段，石油精英被总统吸纳到权力等级中。他们以这种方式与政治精英塑造着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政策。总统有规律地操纵着两类石油精英——“石油商人”和“新生代”的利益，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从中渔利。因此，石油精英发现他们处于持续的相互冲突之中，而无法建立内部联盟。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哈萨克石油商人中没有一个集团成立反对党组织，或加入到反政府运动中。只有少数个人的政治立场与领导层不同。实际上，“石油大亨”一直支持纳扎尔巴耶夫政权，对总统保持忠诚，回避总统与他们的对手——寡头之间的冲突。哈萨克石油商人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持久而有利可图的老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能够赢得对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控制和确保在产品分成协议中的份额。此外，哈萨克石油商人能够在执法机构和立法部门中对 2005 年产品分成协议法和 2010 年自然资源法的起草施加影响，他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税收优惠政策、贷款和国家合同，保护了自己在能源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本研究所要揭示的是，“国有化”以及其他外国投资者面临的问题，并非如一些作者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石油精英中两个集团之间的持续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一进程。“石油大亨”们赢得了胜利，他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成功地塑造了石油国有化的观念。油价飙升和迅速致富已经强化了石油精英自己决定石油游戏规则和鼓励国有化的意图。另一方面，库利巴耶夫集团，也就是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已经通过对哈萨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哈萨克能源企业协会的控制，实现了经济地位的巩固，通过任命库利巴耶夫的亲信到石油天然气部当部长而稳固了政治地位。总统的家族集团得以控制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领域。纳扎尔巴耶夫由此与确保国家金融资产、掌握国家合同分配和控制各种石油收入的石油商人达成了某种妥协（*modus vivendi*）。同时，总统还挫败了哈萨克石油商人中的政治反对派。

与此相反，那些有远大抱负的“新生代”试图反对当局，他们成立了反对党，组织公众示威和支持政治反对派等。但是虚弱的政治制度和缺乏社会基础注定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他们不能整合为一个稳固的力量，每一方

都追求各自的目标。纳扎尔巴耶夫能够利用多种镇压手段将“新生代”从政治和石油领域排除出去。

纳扎尔巴耶夫还试图通过成立各种商业协会，如哈萨克能源企业协会和院外活动法等，使国家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但总统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必须承认的是，正式的结构的确建立起来了。然而，他们在决策进程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依然只是在国家和积极活动的公司之间充当寻租工具。石油精英中行为体的多样性，软弱的国家机构和执行机关对石油部门强大的控制，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石油精英的成员只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能为石油工业中的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通过院外活动法草案使游说活动正规化的努力不会对游说的正规化和透明化产生太大的影响，而院外活动正规化的努力，反而使最重要的国家决策机构，如权力当局、部长，与说客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因此，国家的政治结构阻碍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市场、议会和反对党没有提供控制政治经济资源的机制，任由执政精英单独决定如何分配寻租资源。由于根本不可能划分官僚和政治家的个人利益、私人财产和政治优先权，私财和公产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国内和外国商人如果不接受和不适应石油行业的主导性游戏规则，将很难在哈萨克斯坦从事石油经营。大量石油出口收入是一种推动力量，促使哈萨克斯坦政府进一步发展石油业以保证稳定增长。政府忽视了其他产业的现代化和通过教育创新发展人力资源的努力。国内普遍存在的不透明性、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总统决定的随意性，加强了非正式机制，并进一步鼓励寻租和腐败行为继续存在。哈萨克斯坦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新世袭体制的绝好例证。

(孙溯源 译)

【 Abstract 】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is a rent-seeking state heavily dependent on petroleum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whose economic structure has been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energy sector. 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al large oil and gas firms play a vital role in Kazakhstan's energy policies. Informal political relations have been created between national oil and political elites,

through which the national oil elites are able to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energy sector, the decision of political policies and process of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However, what prevails in Kazakhstan politics is the opacity of institution, the uncertainty of legislation and the arbitrariness of president's decisions, which helps to cause and consolidate the informal political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trend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further encourages the existing behaviors, such as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 Key Words 】 Oil elit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Informal, Authoritarian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Казахстан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ной-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м нефти и газа, чь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ерьезно ограничен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и зависит о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енты на нефть. Топ менеджеры круп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нефтегазовых компаний играют жизненно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страны. Нефтяная элит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создания неформальной сет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ой не только влияет на развит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отраслей, но и участвует в принят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Казах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общей непрозрачностью, правовой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ю и произвольностью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решений, что благоприятствует укреплению неформ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усилению авторитарных тенденций, а также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енты и коррупц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ефтяная элита, отношения клиентуры, неформальный, авторитар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责任编辑 常喆)

斯拉夫·欧亚

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吕 鹏**

【内容提要】一些学者认为“后共产主义”一词现今已经过时，理由是转型的成果在那些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已经定型。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转型却否定了“后共产主义终结”这一理论，因而即使是在抛弃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的二十年之后，“后共产主义”仍不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相反，在东亚和东、中欧的比较研究中，重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变量，能显著地增进我们对转型国家多样化轨迹和形式的理解。

【关键词】 后共产主义 后-后共产主义 社会理论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1-0154-(23)

一、后-后共产主义：欧洲学者的偏见？

1991年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两年之前开始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席卷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要素市场的政商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1CSH038）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欧社会保障重建与政府职能转变与借鉴”（项目编号：06JCGJW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此感谢Iván Szelényi、孙立平、Andrew Walder、Edmund Wnuk-Lipinski、Michael Kennedy、William Outhwaite、Larry Ray、Lawrence P. King、沈原、郭于华，他们在我致力于这篇论文时于不同阶段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宝贵的意见。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转型研究读书小组”成员的许多想法也在多个层面上启发了我，在此一并致谢。

**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整个东欧。二十年后，就在一些人“庆祝”或“哀悼”苏联的终结之际，一些学者却已经开始指出，后共产主义本身也在走向终结。一位政治学教授2004年9月24日在中欧大学的一个午间讨论会上曾声称：“正如无论是德国还是意大利在196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15年之后）都没有被称作‘后法西斯’一样，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共和国也已经在共产主义衰退15年之后摆脱了‘后共产主义政权’这一头衔”。^①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并不仅仅只有他持有这样的观点^②，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想法，只不过没有公开发表罢了。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后共产主义是否完结”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后社会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③从字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应该通过它的历史终结^④以及在它之前的历史而非它本身^⑤来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术语，理由是它标示着一些人所认为的那个“共产主义体系”

① Andras Bozoki,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a speech at an EES noon discussion on September 24, 2004, <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MR306Bozoki.doc>.

② Charles King, “Post-postcommunism: Transition, Comparison, and the End of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Vol.53, No.1, 2000, pp.143-72; Stephen Holmes, “Introduction to ‘From Postcommunism to Post-September 11’”,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Winter, 2001; Peter Gross and Vladimir Tismaneanu,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in Romani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2005; Kubicek, “Problems of post-post-communism: Ukraine after the Orange Revolution”, *Democratization*, Volume 16, Issue 2, 2009.

③ “后共产主义”与“后社会主义”在含义上显然有微妙的不同。“后社会主义”一词本质上是指一党专政和计划经济。我个人反感“共产主义”这一标签，因为它有时总是含有消极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意味。一个更加公正中立的用词如“国家社会主义”（Szelény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1-2, 1978.）或者是“古典社会主义”（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也许会更好一些。尽管如此，本篇文章出于建立一个讨论实质议题平台的需要，仍使用“后共产主义”以及“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此外，这两个术语以及与他们相近的术语（如“后苏维埃”），在我的文章论述中是交替使用的，毕竟它们都是在探讨“真实的现存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④ Zolkos Magdalena, “Bringing Human Rights in the Enlargement Politics: the EU as a Human Rights Promoter in the Central Eastern Europe”, 2004, <http://www.cepsr.com/clanek.php?ID=210>

⑤ Andrew Stroehlein, “Czech Intellectuals and ‘Post-Communism’”, *Central Europe Review*, Vol.1, No.14, 1999.

的“死亡”，并转向“一个更开放、‘放任’的政治形态”^①。由此，除非这些国家又变成了共产主义政权，否则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这个术语。换个角度来说，毕竟这个词有着暂时的“秩序的消解”^②这一层含意。因而，当短暂的时期最终完结时，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术语来取代“后共产主义”，听上去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而言，当给中、东欧国家重新命名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后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变成“正常国家”。鉴于此，我们有了定义“后共产主义终结”的第一个版本，也就是“转型的终结”：转型的起点是“共产主义”，终点是西方范式的“市场和民主”。如果我们进一步往深里挖掘，不难发现支撑这个观念的是一个“作为一种趋同的全球化主题”的进化模式，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过程会产生一个单一的同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这种论调的拥护者而言，共产主义（在东、中欧或欧亚国）^③仅仅只是一个插曲^④。一旦达到常态并稳定下来，长期的转型也就结束了，这些国家所面对的新问题也就不再是有关“转型的”了。

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东欧—欧盟八国）而言，这八个后社会主义新成员国家在2004年完成了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东

① Richard Sakwa, *Postcommu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② Staniszkis, *Ontologia socjalizm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dwiga 1992, p.16.

③ 区别中欧和东欧，也许对理解现今欧洲“后共产主义”的布局很有帮助。在冷战期间，东欧这一标签的意义基本上等同于在苏联之外此前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或多或少与“苏东集团”一词同义。这个定义在我看来已经过时，理由是跨区域的国家已经和国家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各式各样“中欧”的定义成了一种时髦。对于很多学者而言，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由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定义而成一个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概念。在本篇文章里，秉承 Ivan Szelenyi（2008）的概念，我使用了中欧一词来描述“东欧—欧盟八国”（EU-8 countries），而东欧则指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乌克兰。如何划分之前的南斯拉夫国家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是富有争议的。但大体上可以说，由于它们加入了欧盟，它们正在从东欧转向中欧国家。在本篇文章的论述里，它们被暂时地划入“欧亚国”，就是也包含蒙古和此前在中亚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一个概念。

④ 对此的反驳可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mmunist Interlude, or Interpretation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SA Regional Colloquium, “Building Open Society and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in East-Central Europe”, Krakow, Poland, Sept. 15-17, 1996.

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考虑在内。在学界颇具影响的一种说法认为，成功的转型有三个表征：（1）（稳定的）自由民主；（2）（制度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3）一个明确民主的政治社会和国家认同。“正常国家”论者指出，欧盟组织在 2004 年的扩大是东欧八国在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中迈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个新阶段可以被解读为“后共产主义的终结”。^①

然而，大批学者对此并不表示认同。他们呼吁，“后共产主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转型”（transition），即直线发展的、目的论模式下的社会转变；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多方位的、异构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来回往复的。有些时候，他们更愿意使用“转变”（transformation）一词，因为与“转型”相比，它所包含的目的论意味更少。^②

另一方面，不是所有“反对目的论者”或是“多元论者”都坚持使用“后共产主义”一词。对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而言，“回归多元性”而不是“回归西方”，恰恰是一个抛弃“后共产主义”这一“无用”概念的正当理由。例如，早在 2000 年，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就宣称：“随着各个国家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政府的联合形式就有从兴盛的社会民主到苏丹化甚至是王朝政权这样的各种形式，继续将所有 27 种（甚至更多）的转型看成是自然现象，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指出，“这个附在转型上十年的标签（后共产主义）现在显得似乎越来越奇怪，波兰和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称谓应该完全不同”^③。于是“后—后共产主义”（post-post communism）或是“后—后转型”（post-post-transition）这样的词被学者们创造出来，用以描述除共产主义以外种种可能的路径情形。在这里，我们就有了“后共产主义”的另一个不同的定义：终点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而不是建立在“华盛顿

① Andras Bozoki,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a speech at an EES noon discussion on September 24, 2004, 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MR306Bozoki.doc

② 有关这两个用词的讨论，可参见 Susan Bridger and Frances Pine, *Surviving Post-Socialism: Local Strategies and regional respons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John Pickles and Adrian Smith, *Theorizing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③ Charles King, “Post-postcommunism: Transition, Comparison, and the End of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Vol.53, No.1, 2000, p.168, 154.

共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系。

依据上述概念的澄清，“后共产主义的终结”一词实际上所指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对于坚持“常态化”的转型论者而言，“终结”是指“回归欧洲/西方”（即自由的政权）过程的完成阶段。因此，他们会将这个用词限制在东欧八国，即便有时候会纳入那些“后橙色革命”国家（如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而我更愿意称这个概念为“‘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本”。与此相反，对于指称一个更广义范围的共产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至少包括俄罗斯和那些“东南欧国家”）的比较主义者而言，“后共产主义”随着东欧和前苏联之间愈来愈大的分歧已经终结。我用自己的术语将其概括为“‘后共产主义终结’的多元主义版本”，这个版本是对前面提到的“‘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一种否定。

这两种“后共产主义终结”的阐述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在抛弃共产主义 20 年之后，转型或者转变的成果，无论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稳固下来了。^①也就是说，对于欧洲和欧亚国来说，“后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或者从“新铁幕”的争论中借用一个更激进的表述——它们属于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东欧八国。大多数关于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它的后果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稳固的民主国家在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是少数。第二个阵营中，俄罗斯是老大，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很少在比较分析中被涉及。中亚、蒙古和高加索地区则更少出现在比较主义者的视野里。

中国和越南构成共产主义的第三个“阵营”。本文将重点放在中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既不符合“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也不符合多元主义的版本。很明显，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因此无法满足自由主义者设定的“常态化”或“民主化”标准。在市场经济方面，正如我在下面的章节将展开叙述的那样，说经济转型已经定局还为时过早。换句话说，“后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终结”也许大体上可以说得通——虽

① Gwendolyn Sasse, “Lost in Transition: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No. 1, 2005.

然所谓“向欧洲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在很多学者看来仍然值得商榷。^①相反，“后共产主义”仍是用以描述中国正在进行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一个有效术语。因此，如果任何有关“后共产主义的终结”的论点没有考虑东亚的话，它就是一种欧洲的偏见。^②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声讨”欧洲和美国的的社会学家。正如下一节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学者也存在偏见。在中国社会学界，对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区域和专题研究的兴趣都在下降。

二、“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危机

并非所有在“超越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无视中国和越南的做法，都是源自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有时将中国看作是一种“变种”，多数社会学家并不否认将中国定性为一个重要的“后共产主义”政权。对研究“后共产主义”的一些学者和学生而言，他们几乎不谈东亚“后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很难找到中国国内的个人或研究机构做合作伙伴，此外，语言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对“转型的终结”这一争论里中国的缺失感到歉疚。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缺乏合作和语言困难仍然是最主要的障碍。此外，比较主义者更多地关注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或是先进国家，这主要可能是这些项目更容易融入主流的研究，也可能因为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资助，或两者兼而有之。

然而，合作关系、资金和语言并不是导致“后共产主义”的理论探讨在第二个十年明显不足的最主要的障碍。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学者认为，相

① Michael Burawoy and Katherine Verdery, *Uncertain Transition: Ethnographies of Change in the Postsocialist Worl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King Charles, 2000; Carothers Toma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1, 2002; Outhwaite William and Ray Larry, *Social Theory and Post Communis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Szelényi, “A Theory of Transitions”, *Modern China*, Vol. 34, No.1, 2008; Ray Larry, “At the End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Normalization or Imagining Utopi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2, No. 3, 2009.

② 这其实是 Andrew Walder 的观点。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的杰出的、资深的社会学家。这是 2008 年他在北大办公室与我进行非正式谈话中表达的看法。

比二十年前，东亚和东欧之间的比较已经不怎么让人兴奋了。例如，在欧洲，一些研究人员“搁置”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几乎没有在所谓“民主化革命”中发生剧变的国家。但这种“搁置”也让他们忽略了这两个国家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基层公民运动。^①不过，我此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判断欧洲和美国比较主义者的是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对关于“后共产主义”的研究作自我反思。^②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正是由于某种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漠不关心，导致“比较后共产主义的研究”正在被边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上的倒退，因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作为“第二次大转型”^③，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沃土，可以去收集更多的资讯，从而去检验基于其他地区提出的其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契机，让我们可以重建一门具有革命性的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我们已经从现存古典和当代理论中所掌握的知识。^④

当然，作为补充，我想提出两个“限制性的说明”。

首先，我不是在建议对“后共产主义”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与此相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

① Abuza Zachary, *Renovating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Li Cheng,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② 然而，在 2009 年有关东中欧的报告再次成为焦点，它们的重点几乎全部集中这些国家的财政危机方面，以及有时作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的反面教材。由于语言障碍，中国的社会学家极其依赖英语或翻译的材料来获得最新的东中欧的信息。因此，一旦“主流”媒体停止这方面的密切关注，研究人员也无法保持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对这方面的无知。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交流机构或平台来承担这项“全职工作”。

③ Burawoy, “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 693-695.

④ Eyal Gil, Iván Széleá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 London: Verso, 1998; “The utopia of post-socialist theory and the ironic view of history in neo-class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4), 2001; “On Irony: An Invitation to Neoclassic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73, 2003; Sun Liping, “Societal Transition: New Issues in the Field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Modern China*, Vol.34, No.1, 2008; Outhwaite and Ray, 2005; Aurore Merle, “Towards a Chinese Sociology for ‘Communist Civil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2004, [Enlign], mis en ligne le 23 avril 2007. URL: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document801.html> Consulté le 18 avril 2008.

方法论上对后社会主义世界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相比与其他文明的研究（如伊斯兰文明研究），社会学和其他邻近的社会科学中的“后共产主义”研究在整体上做得要更好一些。但相比于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蓬勃兴盛的景观，不能不说，当下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缺憾。

其次，仅仅是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它的“遗产”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要素。事实上，将中国和越南纳入“后共产主义”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地理层面上的。人们可以去做一个包括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和东亚与拉美之间的比较研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换言之，东亚和东、中欧之间的比较分析可能在未来会不断增多，但它们并不是我所主张的真正意义上的“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因为含有“后共产主义”语境意识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独特要求。^①

“后共产主义语境”的独特意识在于，要将这些国家与“古典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区分开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和重新思考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并将这段过往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解释这个地区的多元性。例如，在1998年，Iván Szelényi和他的同事^②指出，“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经典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一些人也许会认为这没有什么新意，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多种形式。^③但与这些“古典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变种”有所不同的是，“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门类，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市场秩序在一个之前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甚至没有私有财产萌芽的社会中发展起来”；“此前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很少就这种独特的情况提出见解，因为他们总是假定，一个资产阶级总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于是，

① Paul Pierson, “From Area Studies to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 in: GrzegorzEkiert and Stephen Hanson (eds.),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② Eyal et al, 1998; 2001; 2003.

③ Gösta Esping-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 Whurr, 1991; Hart Jeffrey, *Rival Capitalis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David Coates, *Mod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olity Pres, 2000.

“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就与其他的“转型”区别开来：东亚“四小龙”和拉美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也经历了民主转型或经济腾飞，但这与“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或多或少已经存在市场经济，而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几乎为零。

正如 Bunce 注意到的那样，“区域研究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研究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①塞勒尼（Szelényi）和他同事们的杰出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论证了如何通过“共产主义”的视角来促进一般性的比较研究。这正是继续在多元化的情境下使用“后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含义：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其持久的遗产。我在本文的最后一节将重申中国（和越南）作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是为了呼吁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综合比较研究之中。有意思的是，现今“后共产主义”研究在社会学中地位的下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它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兴盛时期所埋下的种子。因此，有必要重新回顾近二十年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但是相关的文献实在是太多了，试图做个全面的文献回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篇论文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学视角的比较研究上。

三、“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社会学争论

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学分析就其产生和发展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989 年，倪志伟（Victor Nee）根据他以往的实证研究^②，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到市场”的论文。^③这篇文章和他随后的

①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3.

② Victor Ne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85-203,1986.

③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163-81,1989.

文章^①激起了海外华裔社会学家和致力于“共产主义研究”的国外学者的强烈反响和争议。在1996年,《美国社会学期刊》组织了一个关于市场转型的专题,标志着第一阶段争论的高潮和“停战”。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和学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标志着“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趋向更加多元化的第二阶段。关于“后共产主义”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在1996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回顾,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简要概括这些争论所产生的两种后果:第一,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二,我们错失了什么。

尽管通读这些文献会产生许许多多的主题,但将它们划分为几个大类也并非一件难事。以下八组议题是当时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其重要性的主观认知):(1)地位获得和职业流动,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精英;(2)教育分层;(3)代际流动;(4)工作和就业过程;(5)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及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的回报;(6)文化消费和政治行动;(7)组织和市场机制的转型;(8)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对中国研究有极大热情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议题,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整个学科的热点。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个别的议题被排除在了“主流”之外?

上述议题尽管关注点各异,但大致可被划归为两类:(1)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更具体地讲是“在市场转型中的分层结果”^②; (2)经济社会学(组织和网络)。鉴于这两个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在美国社会学的相对强势地位,它们在深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话语霸权”并不令人惊奇。然而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充分的,因为还有其他的领域,例如文化研究和历史比较社会学也是美国社会学课程的主流,但直到最近,试图从这些角度研究“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变化的有影响的著作还不多。对于这一现象,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

① Victor Nee, “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1991;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1996.

② Lisa Keiste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n Market Transi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6, Issue, 4, 2009.

由那些长期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带头学者形塑的。^①由于这些学者大多主张“市场转型”的框架，因此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成了中国社会学界“后共产主义研究”主导议题，甚至“市场转型”的标签比“后共产主义”还要被频繁地使用。总之，知识上的历史渊源起着很大的作用。

然而，另一个因素也在促使这些议题成为“主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与欧洲“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同行”所做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让我们以围绕着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而引发的争论为例。简单说，倪志伟在1989年和随后文章中的核心论点是：中国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的分层结构，从本质上消除了“再分配者”也就是行政精英的相对权力。^②倪志伟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他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但是他成功地引发了一个与市场化有着普遍关联的问题：谁会是新兴的市场经济的赢家？而谁又会输掉？

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中国问题专家（如 Andrew Walder, 边燕杰, John Logan, Jean Oil, 林南, William Parish, Donald Treiman 和周雪光），还是对中国略有研究的其他知名社会学家（包括 Iván Széleányi, Peter Blau, Randall Collins, Glen Elder, Barbara Entwisle, Neil Fligstein, Alex Inkeles, Michael Kennedy, Phyllis Moen, Nancy Tuma），他们都对倪志伟提出的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应。于是，反过来，在中国进行的“市场转型的争论”对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也产生了交互影响。^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双赢”的沟通最终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

① Guthrie Doug, “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Victor Nee and Andrew Walder”, *Sociological Forum*, Vol.15, No.4, 2000.

② Nee, 1989; 1996; Nee and Matthews, 1996.

③ Iván Széleányi, and Szonja Széleányi, “Circulation or Reproduction of Elites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trodu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4:615-38,1995; David Stark and Laszlo Bruszt,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Michael Burawoy, “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volution: Russia through a China lens”,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24, Issue 6, 1996; Rona-Tas Akos,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0, 1994, p.40-69; Rona-Tas, Akos, *The Great Surprise of the Small Transforma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Hung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Nee and Briton, 1998.

大量地在欧美顶级刊物上发表。

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就存在一个主要的缺点。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地位/收入的获得、职业流动和社会网络在就职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农村、民营企业、地方一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等少数的议题上。^①尤其是领头的社会学家的权威地位，使得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热度不断升温。在 1996 年以前，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当时，许多研究把兴趣集中在所谓“从下至上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农村集体合作社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而国企的所谓“私有化进程”仍比较缓慢。

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已经逐步得到改善。因此，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有趣而正合适的时点来进行反思：在过去二十年的转型研究中，是否有什么我们所遗漏了的其他重要方面？或者，随着 2002 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中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是否有新的具有可比性的议题可以供我们审慎细究？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灰色”领域值得我们关注：（1）社会福利体制改革；（2）政府对市场的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研究这两个领域需要我们对在 20 世纪 90 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甚至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80 年代所谓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如 Falk^②谈到的，摆正我们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更好地端详我们 20 年前不知道而现在终于知道的一切。

四、“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新议题

（一）“第二波转型危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有关“后共产主义”的“主流”社会学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一个层面上：市场化的浪潮以及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个偏好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一直是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类似“所谓的共产主义福利国家发生了什

① Bian Yanjie,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8, 2002.

② Barbara Falk, “Post-Communism’s First Decade: A Primer for Non-Specialist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 2, 2003.

么？”这样的关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能在社会学的转型研究中得到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学家来说，这种缺失起初看起来并不会带来什么学术上的损失，因为除了政权更迭之外，这些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本来就是“单面的”^①，也就是说，主要就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譬如，大量相关文献指出，在 90 年代刚经历激进的“经济重建”的匈牙利和波兰，它们的旧有社会福利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完好的^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后共产主义合法政府”“不仅保存了旧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而且在转型阶段也极力提升这些福利计划。”^③至于俄罗斯，尽管它对社会福利的自由改革是在 1991 年到 1993 年间进行的，但这一举措在 2000 年之前基本上因反对势力过于强大而停滞失败。^④

然而新世纪发生了一些变化。面对低效和财政赤字的旧有系统，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试图进行自由主义范式的制度改革，即减少福利和津贴，以及对医院系统进行私有化^⑤。这些举措在当时激起了亲福利的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甚至引发了骚乱（例如 2006 年在匈牙利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将此称作是“第二波转型危机”，与“第一波转型危机”时由于产权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而导致的 GDP 迅速下降以及大量的失业形成了一个对比^⑥。尽管有这些骚乱，但市场导向的

① Iván Szelényi and Katarzyna Wilk, “Poverty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capitalist regimes”, In: Ian Kubik (eds), *Justice, Hegemony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SSRC, 2009.

② M. Seeleib-Kaiser,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③ Tomasz Ingłot, “Historical Legacies,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89-1999”, in: Grzegorz Ekiert and Stephen Hanson (eds.),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④ Nick Manning, Ovsey Shkaratan, and Nataliya Tikhonova, *Work and Welfare in the New Russia*, Ashgate Publishing, 2000; Cook Linda,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s: Reform Politic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Cook, 2007; Ingłot Tomasz, *Welfare Stat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919-200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erami Alfio and Pieter Vanhuysse, *Post-Communist Welfare Pathways: Theorizing Social Policy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⑥ Szelényi and Wilk, 2009.

改革在财政压力的刺激下或是在像普京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推行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中欧则更为明显。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很有趣：中国的社会配置系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也是类似的私有化或商业化的改革吗？直接的回答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欧和东欧的社会福利体制的自由主义改革受到阻碍之际，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却都在经历市场化和去中央集权化的过程^①——激进的医疗体制改革甚至被形容为一个“大逆转”^②。但是，就在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开始抛弃它们以往的公共卫生体制的时候，财政实力雄厚的中国党和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体制，计划在 2011 年用 1240 亿美元来补贴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增加医院的数量^③。针对人们对卫生服务体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越来越多的怨言，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出承诺：“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达到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总体上，从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历史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与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是走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径：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的市场很不景气而中国的商业化程度却很高；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欧洲政府正在努力退出，而在中国，强大的政府又回来了。问题是：那又怎样呢？

首先，它强有力地证明了“转型并没有终结”。对于“后共产主义”三大主要地区——虽然对东欧、中欧和东亚而言，称它们形成了不同的福利政权或是福利国家政权还为时尚早。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作者就已经试图将这些情况标记在“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的地图上，尤其是与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④的经典论述结合起来。在 1996 年，安德森自己曾

① Ho Lok-Sang, “Market reforms and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41, No.8, 1995; Huang Yanzhong, “The Paradoxical Transition in China's Health System”, *Harvard Health Policy Review*, Vol. 3, No. 1, 2002, pp.78-84.

② Chen Meei-shia, “The Great Reversal: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William Cockerham(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Alabama, 2001.

③ Hans Rösner, “China's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transformation: Preliminary assessmen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 57, Issue 3, 2004; Wong Edward, “China plans universal health car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2009.

④ Gösta Esping-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拒绝将中欧和东欧看作是一种“新”的福利模型，认为这些国家和他提出的三种福利类型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原因是它们还在转型。但在转型 20 年之后，很显然，福利体制仍处于转型阶段。因此，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点“共识”，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相较于埃斯平-安德森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福利模式，都是有显著差异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同的模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对它持怀疑态度^①；但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出现了福利国家的第四种类型^②；另一些人则将“后共产主义”的福利国家划为三类：前苏联一组（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中欧国家一组和东亚儒家福利体制一组^③。无论是哪种说法，在转型的 20 年之后，对于福利国家的类型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其次，社会福利体制的多种转变路径不仅仅只是福利国家社会学或是医疗社会学的事情，而是组成了“后共产主义”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福利体制的比较都可以是之前社会经济不平等方面主流研究的补充。例如，塞勒尼（Szelényi）就曾指出，本质上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的，因此，由“主导”机制制造的不平等，最终会通过一些次要的机制得到补偿。具体说来，在市场经济中（如先进的资本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资本主义），不平等主要是在市场领域中产生的，但是再分配机制会纠正这些不平等现象；相比之下，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如国家社会主义），不平等主要是来自于再分配，而那些弱势群体则不得不依赖市场领域（如“地下经济”）来补偿他们的劣势。^④但就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展而言，这个“通则”也许就受到了挑战：当一些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由

① Claus Offe and Susanne Fuchs, “Welfare State Formation in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Patterns of Reform in the Post-Communist New Member States”, Discussion Paper SP IV 2007-306,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2007.

② Julia Szalai, “Poverty and the Traps of Postcommunist Welfare Reforms in Hungary: The new challenges of EU-accession”, *Revija za Socijalnu Politiku*, Vol.13, No.3, 2006.

③ H.Fenger, “Welfare regim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corporating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 a Welfare regime typology”,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Ideas in Social Sciences*, August, 2007.

④ Iván Szelény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1-2, 1978; Kligman Gail and Iván Szelényi, *Pover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Unpublished report, available on line, 2002.

于市场化丧失了收入来源之际，经济再分配机制却正通过强化干部及其子女的特权扩大了贫富差距；更糟糕的是，福利再分配体制并没有缓解反而通过将人们最需要的医疗服务商业化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换句话说，再分配和市场化导致的不平等开始相互强化，而非如预期的那样相互抵消。有意思的是，塞勒尼注意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恰恰也发生过类似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的非同期比较分析，以及这两个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同期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市场转型期间产生不平等的机制的理解。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列出其他所有从社会福利转型中可以提炼出的比较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体制转型并没有完结，相反，在某些领域序幕才刚刚拉开。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好是坏，你会发现，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域在变革，经济体制的转型很有可能只是孕育期。

（二）重新国有化或国家的重新归来？

早在“后共产主义”第一个十年末期，就有了“市场转型是否终结”这一争论。大量现有文献反映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什么是“(市场)转型的终结”这一问题上，定义模糊不清。在安妮特·布朗(Annette Brown)编辑的一部文集里，收录了一些转型研究专家在这方面的意见。布朗在这本 1999 年出版的书里所作的概括，即使在过了十年之后的今天也是有用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转型会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由化和稳固化，第二阶段则包括了无数结构上的改革……他们大体同意第一阶段在多数国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进展和成功却出现了分化。”^①

尽管对经济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很多社会学界研究“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带头学者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市场)转型已经终结”的呼吁也许有些夸张，但大的趋势——“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②

① Annette Brown,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Kalamazoo, Michigan: 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9.

② Burawoy, “Public Sociology on a Global Scal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 2, 2006.

——已不容否认。例如，倪志伟^①就认为，中国已经在 2002 年左右成功地转向了市场经济，尤其是在股市方面已经完成了市场转型。总体上说，在市场转型的 30 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市场转型的过程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逐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条路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了。”^②

在另一方面，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介入或是国家所有制，同样已经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站稳了脚跟。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便在一些被认为是自由化的国家（比如波兰）也是如此^③。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所有制，因为国企也可以市场化。后共产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认为，“机制”才是市场转型是否终结的试金石^④。魏昂德（Andrew Walder）曾指出：“市场转型并不是指将市场机制作为这些结构的补充，而是指市场机制占据主导的体制转型，即便它们还没有完全取代政府计划。”^⑤

在中国，公认的是，在产品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市场原则所主导^⑥。然而，对于生产要素市场，要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垄断了金融、电力、石油和通信部门（当然事实上它们的确垄断了），而是在于政府是否能在供给来源、稳定物价、补贴营利机构等经济领域继续扮演“计划者”的角色。尽管国有控股的垄断性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已经在市场化管理方面取得相当的进步，但很多人认为，其主要的机制仍是计划经济的。^⑦我没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全面数据，但

① Victor Nee, “China in Transition”, *Accounts* 7, 3-8, 2008, p.4.

② Andrew Walder and Giang Hoang Nguyen, “Ownership, Organ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Market Transition in Rural Vietna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3, 2008, p.252.

③ Stuart Shiel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ish State: 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 or Transnation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1, No. 1, 2004.

④ Szelényi, 2002.

⑤ Andrew Walder and Giang Hoang Nguyen, 2008; King Lawrence, Jakob Treskow, “Understanding Russian Oil”,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13, No.2, 2006.

⑥ 当要评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最好是先对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区别进行一定的分析。要素市场的概念在本篇文章是广义上的，它是指生产要素的市场。这些生产要素，又称为投入，包括生产性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和各种原材料（如石油、电力、煤炭和钢铁）。

⑦ Lin Chun, “Against Privatiz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Argum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No.1, 2008.

是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在越南和俄罗斯，境况是类似的（甚至更严重）^①。那么，这样的事实与本文的主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这提醒我们，在比较无论是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的经济成就时，将“转型”视为单独的一个变量是有必要的。进一步讲，就是我们需要区分三种各自独立的宏观机制：工业化、全球化和市场转型。事实上，东亚“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工业化过程与欧洲的“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像已经工业化乃至“过度工业化”的中、东欧，中国和越南并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积累的过程，尤其是农业这一部分。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历史和文化遗产（比如行动者的关系、宗教传统、集体记忆等），与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的地缘邻近程度，以及尤其重要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的时点及其与民族特性发育的关联——所有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为型构阶级、建立联盟以及阶级内外的冲突，创造了不同的机会结构，而正是本土各阶级之间和内部的力量格局，对特定国家沿着哪条轨迹建设市场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②

“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全球化”和“计划经济的市场转型”不仅是决定不同社会结构以及解释各种转型路径的变量，也应该被视为三种导致企业或国家层次上不同经济后果的分析性并行机制。以中、俄高利润的石油产业的比较为例，它可以是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上升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走出之前的大萧条而走向经济复苏的结果。但是政府制定价格政策以及准入门槛，也许是一些企业超过另一些企业的主要原因。这些机制在现实中相互交织。为了分析它们的特殊作用，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如设置

① King and Treskow, 2006; Collins Ngan, Ying Zhu, and Malcolm Warner, “HRM and Asian Socialist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China, Vietnam and North Korea”, in: Chris Brewster and Wolfgang Mayrhofer (eds.), *The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9.

② King and Szelényi, 2005; Walder,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 1978 - 1996”,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2002.

适当的控制变量^①，或是在比较研究的不同阶段结合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②。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留下了这样一笔遗产：即使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多年后，依然可以将“后共产主义”经济（或者至少说是它的一些部分）与其他的发展状态相区分。

将要素市场纳入到市场转型研究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意味着市场转型在中国和其他有类似现象的经济体制中没有完结，而且它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们的最新进展加以关注：朝向市场化还是国有化？是否存在有一天“倒退”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趣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之际，政府的“回归”也许不仅仅限于社会领域。

政府投资驱动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 2009 上半年占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88%，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做到的，而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占据了主要股市的近七成。^③全球经济的衰退给了中央政府这么做增加了更多动力。尽管私营企业仍控制了经济的一半以上，但很多中国观察家都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将会扭转局势，因为据说到目前为止 90% 以上用来刺激经济的资金都投到了国有控股的企业。^④

在生产要素市场中，“战略资产”的国家控制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国家在电信、电力和房地产这类行业的固定资产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因此，有媒体甚至学者猜测，是否可能发生一场新的“（重新）国有化”运动。由于国有化之前曾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代名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见证国产主义的复兴或是共产主义文明的一种新形式？国有化会不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新药方，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风靡私有化那样？

① 梁玉成：“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4 期。作者指出，市场转型讨论中往往将 1979 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仅仅当作市场化转型，却忽视了同时存在的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转型。他试图提出一个能够将工业化转型的效应剥离出来的市场转型模型，以探讨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布的“净市场转型效应”。

② Matte Dogan,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ume 1, issue 1, 2005; Esping-Andersen Gösta,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Rana Foroohar,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 *Newsweek*, Oct 17, 2009.

④ John Le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China to pursue political reform”, *Executive Highlights*, No. 859, 2009.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参与或是拥有国民经济的特定部门，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在上个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偶尔将铁路、煤矿和钢厂国有化，甚至为了国家利益而控制银行。但国家控制的企业在政府的管理下很快就回归到私人的手中”^①。至于中国，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零星的国有化基本上都是基于市场准则来进行操作的^②。

但是，我在这里并非打算讨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会出现“共产主义经济”或所谓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修订版。我想强调的是：对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比较研究来说，看上去的或事实上的国家所有权加强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浪潮中真正发生了什么。20 世纪 80 年代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创业型资本主义”或“改革型社会主义”的时代，而 20 世纪 90 年代被认为是私有化、分散化、市场化的时代。中国是如此吗？事后看来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旨在恢复一个合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而这之前它被混乱的“文革”中断，这种与东、中欧不同的改革起点对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市场经济的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③其他学者则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 1998 年发起了一场“双轨”改革，“抓大放小”的方针最终将在 21 世纪创造众多的巨型国有企业^④。我们需要更坚实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历史和比较研究，来解决这些尚不确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所谓的“北京共识”^⑤、“新发展模式”^⑥或“新文明国家”^⑦时，一些之前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双轨改革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① Lohr Steve, “Nationalization Has Happened Before in 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② 崔之元：“国进民也进是大趋势”，《亚洲周刊》，2009 年第 23 卷第 48 期。

③ 秦晖：“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3 年第 3 期。

④ Lin, 2008.

⑤ Ramo Joshua Coo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⑥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7.

⑦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2009.

五、结论

“我们是在‘转型的转型’之中？还是‘转变’？‘后转型’？甚至是‘一体化’？还是仅仅是简单的‘发展’？谁在意吗？”祖尔克（Suhrcke）^①提了一个好问题。如果仅仅是术语上的争论并不会引起人们关心，但它确实不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比较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变迁仍是有裨益的。

科尔奈^②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时，即意味着转型的终结：执政党不再具有垄断权力；主要生产工具掌握在私人手中；经济活动主要是市场在协调；此外，福利国家的改革也很重要。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还是中欧和东欧或东亚国家，都不能满足上述所有标准。首先，东欧八国和俄罗斯的福利国家制度的自由改革仍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且结构转型也在放慢速度。其次，戈尔巴乔夫在2009年曾指责普京政党“比苏联共产党还糟糕”——这可能是唬人的，但俄罗斯的“可控民主”的确在走下坡路。其市场化改革也停滞不前。第三，尤其在东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生产要素市场的主导机制绝对不是市场。更别说，对美好未来的乌托邦式幻想仍然在影响很多地方当下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此外，如果我们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化，转到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尤其是社会记忆，我们会发现更多“后共产主义”持久性的证明^③。

本文并不否认如今在这一区域各国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但正如有学者^④注意到的那样，“并不能仅仅因为前共产主义国家自1989年以来已经形成了

① Marc Suhrcke, “Is transition over?”, *Intereconomics*, Volume 35, Number 3, 2000, p.105.

② János Kornai, “Reforming Social Welfare State in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In: Annette Brown (eds.),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Kalamazoo, Michigan: 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9.

③ Alison Stenning and Kathrin Hörschelmann, “History,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the Post-socialistWorld: Or, Do We Still Need Post-socialism? ”, *Antipode* (compilation), 2008; Sun 2008.

④ William Outhwaite and Ray Larry, *Social Theory and Post Communis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p.23.

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就认为‘后共产主义’是一个多余的概念。”萨克瓦^①认为，“后共产主义”概念的提出，“是一大批‘后’哲学家披露了我们这个年代太多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后共产主义”一词提醒理论家们，对这个区域的比较分析应该与共产主义文明在我们当下迫切的问题上留下的长长的身影相结合。在极其多元化的“后共产主义”世界，比较东中欧，欧亚国和东亚并不是在比较苹果和橘子，而是要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和比较^②。如果不考虑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型而来的历史特点，我们就不能完全地或是正确地理解某些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在收入或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并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或社会主义医疗体制商业化的结果，也应该从特殊利益集团——或使用更准确的术语，“单位（situses）”^③残留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或国家层面的多元化经济表现并不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同时受工业化、全球化以及从计划经济转型的不同策略影响的复杂问题。

在具体考虑共产主义的遗产和“后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时，使用比较分析方法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问题，更不是说比较研究就肯定优于其他方法。无论是只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还是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讨论，都应该是任何学科自我反思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减少隐性或显性的国家中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各种文明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培养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打好基础。不幸的是，经过二十年的转型，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正越来越少。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的今天，重新呼吁这一点尤其重要。

【Abstrac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term “post-communism” is already out of date as the results of transition in those European socialist regimes

① Sakwa, 1999, p.125.

② Richard Locke and Kathleen Ann Thelen, “Apples and Oranges Revisite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 and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abor Politics”, *Politics & Society*, 23 (3), 1995.

③ Daniel Bell, *The Winding Passage: Sociological Essays and Journeys*,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xxv, 1991; Lawrence King, “Explaining Postcommunist Economic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Number 559, 2003, p.44.

have already been finalized. However, China's continu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has denied the theory of "ending in post-communism". Therefore, even two decades after the Soviet-style socialist system was abandoned, the concept of "post-communism" is still not superfluous. In contrast,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n East Asia,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laying emphasis on the past of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and taking it as a substantive explanatory variable will significantly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in diverse trajectories and forms of transition countries.

【Key Words】 Post-Communism, Post-post-communism, Social Theories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екоторы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термин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уже устарел, основанием тому служит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уже ощутимы в бывш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Однако продолжающиеся в Кит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опровергли теорию «конца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а», поэтому даже после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отказа от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является утратившей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концепцией.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опы придаётся значение прошлому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он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реальной объясняющей переменной, ч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наше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траекторий и форм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ющихся стран.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пост-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

(责任编辑 黄翔)

近二十年波兰外交转型刍议*

郭洁**

【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转型,波兰外交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总体看来,这一过程既带有东欧国家的普遍共性,亦表现出波兰自身的鲜明个性。对1989年以来波兰外交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化背景及走向加以考察,并且进一步分析波兰与主要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就后冷战时期波兰外交转型的目标、业已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及与国内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做出分析与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波兰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轨迹,对于把握波兰外交的未来走向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波兰 外交 转型 欧洲化 大西洋主义

【中图分类号】D187(5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1-0177-(28)

在冷战结束后的地区研究中,有关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相关成果数量之多,用匈牙利学者拜伦德·伊万(Berend T. Iván)的话说,简直可以填满一个图书馆。^①多数讨论的是政治或经济领域的转型及相关问题,有关中东欧各国1989年以来外交领域的变迁,成果相对有限,而以地区或国别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著作则更不多见。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漏由笔者承担。

** 郭洁,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① Ivan T. Berend, "The 'Crisis Zone' Revisit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90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15, No.2, 2001, p.251.

就本文所涉及的波兰二十年来外交领域的转型或变迁而言,据所做资料普查表明,目前国内尚缺乏集中论述的大部成果,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将中东欧外交关系作为整体加以考察或是就波兰外交中较受关注的一些重点领域或问题加以追踪或评论的著述中。^①比较之下,与此相关的外文成果略显丰富,分析问题的视角也相对多样。^②不过同样,若对照对波兰国内政治、经

① 前者如朱晓中:《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朱晓中主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郑羽主编:《俄罗斯中东欧中亚国家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孙晓青、王莉:“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等等。后者可参看如孔田平:“波兰的欧盟政策与入盟谈判战略”,《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杨焱:“欧盟东扩中的‘波兰现象’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4期;熊昊:“空难事件后波兰对美欧俄政策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周伟:“浅谈冷战后波美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

② 比如,有对波兰外交转型的长线梳理(如 Ilya Prizel and Andrew A. Micht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Ryszard Zięba, “Transformation of Polish Foreign Policy,” *The Polish Foreign Affairs Digest*, Vol.4 Iss.13, 2004; Sarah M. Terry, “Poland’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89: The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c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33, Iss.1, Mar. 2000; George Sanford, “Overcoming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9, Iss.3, Sep. 2003), 亦有对波兰外交重点问题的综合研究(如 Witold M. Góralski, ed., *Poland-Germany 1945-2007: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in Europe: Studies and Documents*, Warszawa: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7; Katarzyna Pełczyńska-Nałęcz, “How Far do the Borders of the West Extend? Russian/Polish Strategic Conflicts in the Period 1990-2010”, *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 (OSW) Studies*, Warsaw, March 2010; Kerry Longhurst and Marcin Zaborowski, *The New Atlanticist: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iorities*, London: Chatham House, 2007; Marcin Zaborowski, *German, Poland and Europe: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Europeanis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cin Zaborowski and David H. Dunn, eds., *Poland: A New Power in Transatlantic Security*, London: Frank Cass, 2003; Aleks Szczerbiak, *Poland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New Awkward Partn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Maciej Celewicz, Monika Nizioł-Celewicz, “Relations between Poland and Its Eastern Neighbors after the 1999 NATO Enlargement”,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No.10, January 2006; Helmut P. Gaibauer, “Euro-Scepticism Revisited: Poland after EU Access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8, No.1, Apr. 2007), 还有一些对波兰外交变迁所作的整体或局部的理论分析与总结等(如 Tadeusz Chrościcki,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land'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olish Foreign Affairs Digest*, Vol. 5, No.4 (17), 2005; Adam Szymanski, “The Position of Polish Political Elites on Future EU Enlar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23, No. 4, December 2007; Beata Wojna, “Spain's and Poland's Road to NATO: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Democratising State”,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Vol. 15, Iss. 5, Oct. 2008)。

济等转型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界对波兰外交转型的研究还有着较大的延伸、整合以及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的要旨,即在于对1989年以来波兰外交的阶段性发展轨迹及转型时期的外交重点等加以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就其转型目标、难题等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解读。

一、波兰外交转型的几个阶段

1989年政治剧变后,波兰的外交转型大致可以较具转折意义的三个年份(1993年、1997年、2005年)为界前后划分出四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反映了伴随着内外环境的变迁,波兰向欧洲一体化目标迈进的进展、与东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外交走向呈现出的新特点。

第一阶段:1989-1993年

1989年夏,以反对派赢得大选为标志,波兰政治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直至1993年在团结工会及其派生各党执政期间,波兰经历了转型初期的剧烈震荡:三次议会大选、四度政府更迭、五任总理的上上下下,加之1990年突然来袭、影响达数年的大规模经济衰退,使得波兰的民主化、市场化转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此种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局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期波兰的外交转型却奇迹般地保持了连贯性。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根据1989年春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外交事务由总统统领,这使得政治斗争(特别是总统与总理间的政治斗争)对这一领域的影响相对较少。其次,转型最初这四年间,尽管内阁成员更换频繁,但外交部长一职始终由无党派人士斯库比谢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ewski)担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避免了政策发生显著波动。^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多少反映了政治精英对于同时进行的民主化、市场化转型的战略、政策、理念等仍难以达成一致甚至存有很大分歧的话,那

^①事实上,斯库比谢夫斯基也是这四年间唯一未被更换的政府部长。

么在外交领域，无论围绕总体的转型目标抑或具体的政策选择，各派力量更多表现出的是高度共识。^①

剧变之初，波兰为其外交转型所规划的蓝图是清晰的，亦即摆脱以往意识形态的干扰及同苏联不平等同盟关系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通过努力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保障自身独立与安全，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安全与共同边界的基础上同所有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不过，目标明确并不意味着实践过程的现实、可控。在1989年秋至1990年初这段时间，由于受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波兰自主外交所能践行的空间还相当有限。在诸多制约因素中，以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与苏联的联盟关系尚未完全终结，境内仍有数万苏军驻留。其二，德国统一的步伐越来越近，敏感的波德边界问题重又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波兰外交采取了一种有针对性的双轨政策：在西部，一方面继续推动波德和解，另一方面试图打苏联驻军这张“牌”，用以牵制德国可能提出的领土要求；在东部，继续对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乌克兰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表示同情，但同时力避做出任何可能惹恼莫斯科的举动。^②总之，此期除了继续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外，波兰外交并无多少弹性空间。“德国因素”甚至还使波兰决定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以一种新的泛欧体系取代北约和华约的主张表示支持。^③

自1990年春，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波兰的变化。首先是西部边界问题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解决。是年3月，在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斡旋下，东西两德议会共同发表声明，承认奥德—尼斯河为波德边界。11月14日，统一后的德国与波兰签署边界条约，正式对此予以确认。^④伴随着西部边界隐患的消除，波兰对境内苏军和华约的态度随即发生转变，华沙当局开始频频敦促苏联就从波兰撤军问题展开谈判。同时，斯库比谢夫斯基亦放弃此前“模

① Louisa Vint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89-1993”, in Prizel and Micht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pp.24-25.

② Ilya Prizel, “Warsaw’s Ostpolitik: A New Encounter with Positivism”, in Prizel and Michta eds., *Polish Foreign Policy Reconsidered*, p.100.

③ Longhurst and Zaborowski., *The New Atlanticist*, p.26.

④ 详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关于确认两国目前边界的条约》，1990年11月14日。Góralski, ed., *Poland-Germany 1945-2007*, pp.364-365.

棱两可”的态度立场，转而加入到匈、捷两国外长呼吁解散华约的行动中来。

① 1991年夏，数十年来支撑着苏东阵营的两大支柱经互会和华约组织先后宣告解散，波兰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就此不复存在。同年末，苏联自身的轰然解体及作为其继承国的俄罗斯在此后一年间所奉行的“亲西方”路线，赋予波兰外交以更大的回旋余地。1992年，在与俄罗斯就苏军撤离问题最终达成一致后，波兰开始同新独立的东方邻国正式建交。截至是年夏，除立陶宛以外，波兰同所有邻国签署了新的双边条约，确认了彼此主权和共同边界。

进入1993年后，外部环境的改变对波兰外交转型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波黑战争不断升级以及东欧地区民族关系的普遍趋紧，促使西方大国开始认真考虑通过推动欧洲一体化机制的东扩来达到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冲突蔓延的目的。西方态度的这一变化，对波兰而言，意味着回归欧洲这一梦想开始启程。另一方面，在其东方，“亲西方”政策带来的幻灭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重新以强硬姿态示人。1993年4月，在新出台的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公开声明将努力重获对前势力范围的控制。②在波兰看来，俄外交路线的这一调整，无疑对自身独立与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面对此情，波兰外交当作何反应，方能及时避免昔日“梦魇”重现，同时抓住历史机遇，迎头赶上即将驶来的西进列车？随着新一届议会选举的日趋临近，这一系列问题将由斯库比谢夫斯基的下任去思考和解答。

第二阶段：1994-1997年

1993年9月的大选，共有1442万选民参加了投票，转型带来的社会阵痛加之团结工会掌权后的四分五裂，多数选民将票投给了在野的左翼政党。

③ 赢得大选的民主左翼联盟（SLD）与农民党（PSL）携手组阁，年仅35岁的农民党主席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出任总理。波兰剧变四年以

① Longhurst and Zaborowski., *The New Atlanticist*, p.27.

② Terry, “Poland’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89: The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ce”, pp.19-21.

③ 选举数据详见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1993年9月23日公告。URL=<http://isap.sejm.gov.pl/Download;jsessionid=25C30F40DDA75D682F07F9828858657E?id=WMP19930-500470&type=2>

来由团结工会派生政党执掌政权的局面由此改变。不过，左翼政党的上台并未影响到各派力量在外交转型问题上的政治共识。换言之，重返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的总体目标未有动摇。相应地，“斯库比谢夫斯基时代”业已确立的亲西方取向，在 1994-1997 年帕夫拉克及其后几届左翼政府执政期间得到了延续。这种延续从政策层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寻求加入以北约和欧盟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组织；第二，继续加强并密切同德、美两国之间的关系。^①

加入北约和欧盟，是实现重返欧洲这一战略目标的两大基石。早在剧变之初，波兰便公开表达了加入欧共体的愿望。加入北约的申请，则直到 1992 年即波德边界问题尘埃落定、苏联也已复存在的情况下才正式提出。而北约虽然早在 1990 年就表示愿同所有华约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此后三年间，由于担心危及同俄罗斯的脆弱关系，并无真意推进东扩。^②1994 年初，北约峰会通过了“和平伙伴计划”，提议将始于 1992 年的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框架下的政治协商扩展到军事合作领域。尽管如此，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北约东扩未见有大的动作。直到 1996 年底，情况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成功获得连任，并任命了坚决支持北约扩大的奥尔布莱特出任国务卿，在此之后，北约扩大被置入了快车道。1997 年在马德里峰会上，北约正式向波、捷、匈三国发出了邀请。如果说加入北约进程多少有点曲折的话，对东欧国家来说，通往欧盟的道路则可谓艰辛、坎坷，较之前者有所不同的是，俄罗斯因素在此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构成“路障”的是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就 1994-1997 年这一时段来看，比较突出的三组问题包括：第一，申请国采纳并落实繁冗的欧盟既有法规（*acquis communautaire*）的问题；第二，欧盟内部久已存在的许多分歧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有关扩大前对欧盟现有机制进行改革的问题。^③以上问题的繁复纠结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接近尾声之时，波兰入盟的问题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97 年 12 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做出了第五次扩大的决定，

① Longhurst and Zaborowski, *The New Atlanticist*, p.30.

② Terry, “Poland’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89: The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ce”, p.13.

③ Ibid, p.32.

波兰被列入首批入盟候选国行列，并获邀就入盟问题展开谈判。

1990年代中后期，波兰在向欧洲一体化组织迈进的过程中所以能取得上述进展，除了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与其他中欧各国以“维谢格拉德集团”为平台展开的有效配合与努力外，来自德、美两国的大力支持与助推在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北约东扩的钥匙并不掌握在其欧洲成员的手中，对此问题拥有最后发言权的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美国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以及北约先于欧盟实现扩大的事实，加强了波兰外交甚至整个波兰社会的亲美取向（或所谓“大西洋主义”），美国也由此渐渐被视作相较西欧更为可靠的一个盟友。如果说北约的扩大与美国态度的上述转变直接相关的话，欧盟的扩大则不能不说是德国不懈努力的结果。自1989年起，德国一直是欧共体/欧盟内部在东扩问题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且每每不忘强调尽早吸收波兰入盟的重要性。^①为此，波兰在几乎整个1990年代始终将德国作为一个关系非同寻常的“特殊朋友”加以看待。

在波兰外交转型的第二阶段，亲西方虽然仍是外交战略的主要取向，不过，随着局势发展，波兰愈发意识到，位处欧洲“心脏地带”的地缘现实，使得采取一种完全排他的亲西方立场不可避免地蕴含风险，如今它亟须一个清晰连贯的、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实现其欧洲梦的东方政策。1994年2月，新任外长、来自支持改革无党派联盟的奥莱霍夫斯基（Andrzej Olechowski）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就波兰的东方政策做了正式表述。从很多方面看，这一政策基本上是对斯库比谢夫斯基时期所奉行的“双轨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它一方面寻求改善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和介于波、俄两国之间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积极展开互利合作。^②此后，波兰开始采取主动拉近同乌克兰、立陶宛两国的关系，同时寻求与白俄罗斯保持友好开放的关系。1995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当选总统后，决心将东方政策打造为任内波兰外交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此背景下，波兰的东方政策内容亦更趋

① 有关德国支持欧盟东扩的原因，可参见 Karl Cordell and Stefan Wolff,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Ostpolitik Revisit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44.

② Terry, "Poland'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89: The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ce", pp.26-27.

明朗，概括来讲，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俄奉行特殊对待的原则；第二，将与乌克兰、立陶宛两国之间关系提升到与波俄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三，通过支持上述两国加入中欧地区合作组织，促其向西靠拢；第四，积极发展旨在能减轻对俄能源依赖的经济合作。^①

总体看来，较之前一阶段，波兰外交在 1994 至 1997 年间无论是主动性还是方向感均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除了继续奉行积极的亲西方外交外，波兰开始寻求在东方为自己打造一个有利的地区角色。自 1997 年后，这种倾向西方同时关注东方的特点在波兰外交中愈益清晰地展现出来。

第三阶段：1998-2004 年

如前所述，1997 年在波兰外交转型中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自此时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景变得越来越现实可触了。作为大选年，1997 年同时也带来了国内政治的一些新变化。任期届满的左翼政府在过去四年间，虽说在内外政策方面均取得不凡成就，但由于未能赢得多数农民的支持，在 9 月下旬举行的大选中痛失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此后，获胜的右翼政党团结选举行动（AWS）联合得票率位居第三的中派政党自由联盟（UW）组成新一届中右翼政府。来自自由联盟、强烈支持一体化的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被任命为第三共和国第五任外长。这样，在柏林墙倒塌八年后，用历史学家罗斯柴尔德的话说，“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拥有了一个主张无神论、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总统，一个新教徒的总理和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外长”。^②尽管如此，左派总统、右派总理、中派外长共处的格局一直保持到了 2001 年 9 月第四届议会大选之时。这一次，政治钟摆再度左摆，在野四年后，左翼政党重新赢得大选上台执政，10 月 10 日，组成了由米莱尔（Leszek Miller）领导的民主左翼联盟—农民党—劳动联盟联合政府。同样来自民主左翼联盟、曾于 1996-1997 年间担任政府总理的齐莫舍维奇（Włodzimierz

① Longhurst and Zaborowski, *The New Atlanticist*, pp.32-33.

② Joseph Rothschild and Nancy M. Wingfield,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4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15-216.

Cimoszewicz) 受命出任外长一职。米莱尔领导的联合政府一直执政到 2004 年 5 月, 随后财长贝尔卡 (Marek Bellka) 接任总理直至 2005 年秋大选。

1998-2004 年, 是波兰外交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虽然此前向北约和欧盟迈进的过程中一路磕磕碰碰, 但到 1998 年时, 两个组织的扩大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不过起初, 波兰能否顺利成为首批新成员国中的一个以及它将在欧洲大家庭中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 前景尚不明了; 除此之外, 波兰外交中日渐凸显出来的“大西洋主义”色彩会否就此发展为波兰外交的一种永久性特征, 当时也仍充满不确定性。事实上, 这些问题恰好构成了 1998-2004 年间波兰外交转型的一条主线。

1999 年 3 月 12 日, 北约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四次东扩, 波、匈、捷三个前华约国家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加入北约的梦想。就其初衷而言, 波兰是期望北约这个以集体防御为目的的组织能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抵御外部威胁。不过, 就在波兰入约后不到两周, 北约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 在科索沃展开了针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此种情形意味着已是成员国的波兰必须在以下两种选择中择取其一, 即要么继续坚持北约应恪守其作为集体防御组织这一定位, 从而反对北约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 要么则接受北约角色和功能的这一转变, 支持北约的行动。事实上, 波兰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不仅如此, 在整个战争期间, 它都坚定地同北约内部“单边主义”的支持者站在一起。波兰的这一表现, 不由令欧盟国家隐隐担忧: 一旦波兰获准进入欧盟, 它将会在欧洲和美国二者间作何选择? 事实上, 随着后来美国反恐战争的打响, 这一问题很快便有了答案。

1998 年春开启的入盟谈判对波兰来说并不顺利, 进展异常缓慢。所以会这样, 其中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 亦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就前者而言, 众所周知, 波兰是“卢森堡集团”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 (其一国面积超出了其余五国之总和), 它的入盟准备过程自然会较为复杂和漫长; 就后者来讲, 由地理面积催生出的“大国心态”, 使得波兰在许多问题上较之其他候选国往往表现得更加不愿妥协, 相应地, 谈判进程也就慢了下来。波兰的这种状况很快引起了其他五个“卢森堡集团”国家的不满。围绕波兰的入盟问题, 争论持续了很久。由于不想自己的入盟进程被波兰拖了后腿, 其中个别国家

(如匈牙利),即提议欧盟先进行一次小规模东扩,将“卢森堡集团”中那些条件业已成熟的国家先吸收入盟。不过,此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德国的强对反对。据时任匈牙利总理的迈杰西·彼得(Péter Medgyessy)回忆,当时德国领导人表示,他们“欠波兰人一份没有偿付的账单,在道义上应该予以处理”。在德国作了上述表态度后,波兰被纳入扩大计划。后来,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也相继被纳入首批东扩候选国之列。^①

2002年11月,欧盟各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正式邀请包括波兰在内的八个前苏东国家和两个地中海国家加入欧盟。次年春,在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以上十国正式签署加入欧盟的协议。与此同时,除塞浦路斯以外的九个候选国先后在国内就加入欧盟举行了全民公决。根据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3年6月7~8日,共有58.8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77.45%的人赞成加入欧盟。^②2004年5月1日,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艰苦的努力之后,波兰终于梦想成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

第四阶段:2005-2011年

然而,几乎就在踏进欧盟大门的同时,波兰国内政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重返欧洲这一目标的实现,使得15年来支撑着各派政治共识的一根主要支柱随之消失,政治舞台出现了新的分裂,一种更趋保守的意识形态日渐占据主流。2005年9月,曾带领波兰成功加入欧盟的民主左翼联盟,因未能妥善解决国内面临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加之政府内部涉及权钱交易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结果在议会选举中被打着“道德复兴”旗号的两支中右政治力量联手击败。这两支力量分别是:2001年由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创建的持民族主义和社会保守立场的法律与公正党(PiS),以及同年从自由联盟中分离出来、由图斯克(Donald F. Tusk)领导的具有自由保守性质的公

① [匈]迈杰西·彼得:《走在仕途上的公民——匈牙利前总理迈杰西·彼得自述》,杨永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② 参见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网站数据:URL=<http://referendum.pkw.gov.pl/sww/kraj/indexA.html>

民纲领党（PO）。以上两党共夺得 51.1% 的选票，而民左联党得票率仅为 11.3%，甚至不及剧变后首次自由选举的成绩。^①选举结果揭晓后，人们普遍认为，两大中右政党会联合组阁。^②然而，当第二个月莱赫·卡钦斯基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后，法律与公正党已无意同公民纲领党合作，先是于 10 月 31 日成立了由马尔钦凯维奇（Kazimierz Marcinkiewicz）领导的少数派政府，次年 5 月又与议会中两个较小的极右翼民粹政党自卫党（Samobrona）和波兰家庭联盟（LPR）组成了多数派联合政府。7 月中旬，法律与公正党主席、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孪生哥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A. Kaczynski）接替马尔钦凯维奇出任总理。波兰进入到了卡钦斯基兄弟主政时代。

2005 年的选举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政权在左右两翼之间的再度易手，但随后许多迹象表明，以上两场选举实际上构成了 1989 年以来波兰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标志着波兰政治的分化和组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③继承了团结工会右翼传统的法律与公正党在其竞争纲领中明确宣称，自己的目标在于同过去彻底决裂，即不仅要跟剧变前波兰四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划清界限，还要与 1989 年以来主导着波兰转型进程的政治共识和核心信条分道扬镳。^④很快，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诸多带有民粹主义、反共和社会保守色彩的激进主张和实践，也外溢到了外交领域，尤其突出表现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的态度变化上。在对欧政策方面，疑欧情绪明显上升、排德倾向有所显现。无论是在竞选期间还是执政之后，法律与公正党一再宣称，作为民族利益最坚定的捍卫者，它所领导的政府要使波兰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大欧洲国家地位的共和国”。^⑤在此驱动下，法律与公正党政

① 详见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相关统计数据(URL=<http://www.wybory2005.pkw.gov.pl/SJM/EN/WYN/M/index.htm>)

② Gavin Rae, *Poland's Return to Capitalism: From the Socialist Bloc to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8, p.107.

③ 关于 2005 年秋议会和总统选举对 1989 年后波兰政治发展的意义，可参见 Timothy Garton Ash, “The Twin’s New Polan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3, Number 2, 9 February, 2006, pp.22-25.

④ 详见 Gavin Rae, *Poland's Return to Capitalism*, pp.156-162.

⑤ Krzysztof Bobiński, “Polish Foreign Policy 2005–2007”, URL= http://www.isp.org.pl/files/20057622980998926_001192005247.pdf

府在欧盟内外政策问题上屡屡提出异议。对于德国这个“特殊朋友”，该党的态度也与前几届执政党亦有很大不同。在它看来，鉴于欧盟正在或已经成为德国控制欧洲的一个工具，波兰应向德国“将自己的繁荣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上的霸权野心发起挑战。^①在与俄罗斯关系方面，对抗色彩也日渐浓重。在这方面，2005年的“天然气管线事件”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当时，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与德国化学公司 BASF 达成一项关于穿越波罗的海海底铺设一条天然气管线的协议，用以替代1993年曾与波兰签署的一项关于铺设第二条经由西伯利亚、过境波兰然后抵达德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天然气管线的协议（即亚马尔—欧洲管线二期）。俄德的协议，在波兰看来，对其地缘政治地位和能源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为抵制此项计划，波兰政府提出了组建一个“能源北约”的设想。根据这一设想，需要俄罗斯供给能源的国家可向“能源北约”订购；如果俄罗斯决定切断供给的话，各国可相互支持、协调行动。虽然提议后以失败告终，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此届波兰政府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担忧是何其之深。^②

2007年夏，由于法律与公正党、自卫党、家庭联盟党在众多核心问题上分歧难调、纷争不断，执政联盟走向破裂。10月21日，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公民纲领党以超出法律与公正党近十个百分点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随后与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图斯克出任总理。^③较之法律与公正党，公民纲领党对欧洲持积极友好的态度，在图斯克的领导下，波兰在强调本国利益的同时，积极奉行融入欧洲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就前任对德政策做出相应调整。2011年下半年，波兰在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多次强调了支持欧洲朝着进一步一体化方向迈进的立场，并表明波兰不仅愿意而且有能力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一段时间来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炙手可热的利比亚问题等，波兰也借各种场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主张。所有这些都表明，波兰希望在欧盟事务中争取更多发言权，成为欧盟的主导

① Krzysztof Bobiński, “Polish Foreign Policy 2005–2007”.

② Andreas Heinrich, “Poland as a Transit Country for Russian Natural Gas: Potential for Conflict”, Koszalin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ies (KICES) Working Papers, No. 9-10, September 2007, p.74.

③ URL= <http://www.wybory2007.pkw.gov.pl/SJM/EN/WYN/M/index.htm>

力量之一。^①此外，在继续保持亲美外交的同时，图斯克政府也非常注意推进波俄关系的平衡发展，相较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前者更强调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2011年10月9日，公民纲领党凭借执政四年间取得的突出业绩，以39.18%的支持率再度赢得大选，图斯克也由此成为剧变二十多年来首位获得连任的总理。^②在11月18日正式组成的新政府中，外交部长一职仍由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担任。根据近期波兰总理和外长在一些重要场合的政策表述，可以预期此届政府将会继续把在欧盟内政外交中扮演积极角色置于外交全局的重心。^③此外，维持波美同盟关系，加强对俄经贸关系并审慎处理两国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不和与摩擦，继续鼓励和支持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东方邻国以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高加索国家的民主化与市场化转型、努力推动其加入欧洲一体化组织，也将依然是贯穿新政府外交政策的一条主线。当然，不排除个别外交重点或领域会有新的调整。

二、转型时期的外交重点

1989年以来的波兰外交，很大程度上主要围绕着如何处理同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各主要大国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同欧盟以及同其他邻近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层面来展开的。其中第一方面是近20年多来波兰外交的重点，篇幅所限，以下择取其中最为关键的几组双边关系分别加以讨论。

① 参见：图斯克在欧洲议会的讲话，2011年7月6日。URL=http://pl2011.eu/sites/default/files/users/shared/spotkania_i_wydarzenia/speech.pdf。

② 具体数据详见：<http://wybory2011.pkw.gov.pl/wyn/en/000000.html#tabs-1>

③ 参见：图斯克在波兰议会就新政府施政纲领发表的讲话，2011年11月18日（URL=<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asternapproaches/2011/11/tusks-speech>）；西科尔斯基在柏林发表的名为《波兰与欧盟的未来》的讲话，2011年11月28日（URL=http://www.msz.gov.pl/files/docs/komunikaty/20111128_BERLIN/radoslaw_sikorski_poland_and_the_future_of_the_eu.pdf）

波俄关系

冷战的结束从两个方面根本改变了波俄关系：首先，它使波兰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进而加入了欧洲一体化组织；其次，它重新点燃了两国对“中间地带”的历史争夺。简言之，波兰从一个前苏联的“卫星国”变成为俄罗斯的地区对手。回顾苏联解体以来波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甚顺畅，矛盾与摩擦时有发生。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两国关系的负面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恶化趋势明显加剧。不过，要想对波俄关系有更为全面的理解，仅关注眼前出现的种种不和是不够的，还需对其背后的历史根源和地缘因素做进一步探究。

波俄关系的历史纠葛由来已久，至远可追溯到16世纪。1507年由于莫斯科公国对立陶宛的侵犯和蚕食，波兰被拖入与莫斯科的战争之中。1537年战争结束后，双方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但很快在争夺波罗的海统治权的立沃尼亚战争中，再度兵戎相见，结果波胜俄败。1605年，为满足向东扩张的愿望，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对俄国发动战争。次年9月，波军占领莫斯科，此事后来被俄作为民族耻辱载入史册。17世纪下半叶，双方力量对比倒转过来。18世纪后半期，俄国开始向西扩张，并于1772、1793、1795年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共占领波兰近三分之二的领土。1939年9月签署的苏德秘密补充协定，事实上造成了波兰第四次被瓜分。^①冷战结束后，诸如此类的历史积怨一一浮出水面，给当代波俄关系造成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对波兰来讲，上百年国之不存的历史、二战初期的再度沦亡、1943年爆出的卡廷惨案、损失惨重的华沙起义、战后四十多年主权受控的经历，这一连串的民族伤痛都与这个东方邻国有着直接的关系。1990年代以来，波兰政府多次重提往事，希冀俄方还历史也还波兰民族以公正，然而，莫斯科方面的反应似乎总难令人满意。以卡廷事件为例，1989年波兰剧变之后，苏联/俄罗斯领导人也曾就此事做出种种歉意表示。比如，1990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主动将1939—1940年间涉及卡廷事件的部分内务人民委员会档

^① 条约文本详见“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The Documents”, edited by Saulius Sužiedėlis, *Lithuanian Quarterly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35, No.1, Spring 1989.

案移交到访的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1992年，俄总统叶利钦解密了表明苏联最高领导层对此事负有责任的文件，并将其交给了波兰；一年后，在对波兰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叶利钦拜访了华沙波沃斯基公墓（Powązki Cemetery）并向卡廷纪念碑敬献花圈；挖掘工作亦大致同时展开，1990年代末位于哈尔科夫、卡廷和梅德诺耶的军墓建成并于2000年对外开放；2010年4月7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前往位于俄斯摩梭斯克附近的卡廷墓地祭奠，向事件受害者致哀并跪献花圈等。不过在波兰人看来，以上这些与真诚的忏悔仍相距甚远，至少俄罗斯直至目前还不愿就此事做出正式的道歉。此外，对于华沙当局多次提出的诸如解密所有相关文件、就事件做出解释以及将其定性为“种族屠杀”等要求，莫斯科方面亦予以了拒绝。^①2010年，围绕着卡廷事件旧伤未去、又添新痛。4月10日，赴俄参加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的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所乘专机在斯摩梭斯克上空坠毁，连同总统夫妇在内的机上96人全部罹难。此次空难事件又为“卡廷”二字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悲情色彩。事实上，在与二战相关的诸如战争的起源、爆发、结果以及冷战时期的涉及两国关系的许多问题方面，波俄双方的看法均存有较大分歧，有些甚至截然相对。当然，“翻历史旧帐”的并非只是波兰。2005年，俄杜马宣布取消十月革命节（11月7日），代之以新的节日“民族统一日”（11月4日），用以纪念1612年的这一天波兰占领军被俄军逐出莫斯科。此事不可避免地给两国关系增添了新的不愉快。所有这些积怨或纠葛，都无疑对两个民族间的情感带来了负面影响。

除历史问题外，波俄关系还深受地缘因素的影响。1991年伴随苏联的解体，波兰东部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以及高加索各国的纷纷独立，使波、俄之间出现了一条中间地带。显然，波兰东部边界的安全与否，同这条中间地带是否稳定息息相关。而后者，在波兰看来，不仅取决于这些国家国内的民主化转型顺利与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们与欧洲和俄罗斯二者之间的关系孰近孰远。从1998年起，波兰不断向欧盟提议吸收这些国家入盟，以期通过联盟的力量将它们

^① Katarzyna Pełczyńska-Nałęcz, “How Far do the Borders of the West Extend? Russian/ Polish Strategic Conflicts in the Period 1990-2010”, pp.65-66.

彻底纳入西方轨道。21世纪初，在获得欧盟准成员国身份后，波兰在推行其东方政策方面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姿态。2004年11-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此间，波兰的表现颇令人关注。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美国的支持和欧盟的默许下，在乌克兰两位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和尤先科（Viktor Yushenko）之间展开斡旋，并对事态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许多波兰的艺术家、反对派领袖以及大量的志愿者来到基辅，向乌克兰示威者表示支持；此外，波兰还派出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支国际观察员队伍前往乌克兰监督重新举行的选举。^①波兰向东扩大稳定地带的努力，与俄罗斯在此地区的地缘政治目标发生了冲突，并被后者视作对其欧洲后院的蓄意侵入。为示“惩罚”，俄罗斯随后以不合健康标准为由对波兰许多肉类和农产品实施禁运；作为回应，波兰亦在2006年欧盟就同俄罗斯签署新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举行谈判的问题上投了否决票。^②此间，两国媒体亦相互展开“大战”。波兰媒体指责俄罗斯惯用“帝国式外交思维”、“仍把波兰看作是自己其势力范围”、意图“削弱波兰主权”、“还生活在过去”等。俄罗斯媒体则驳斥称波兰“干涉乌克兰选举进程”、“在乌、白两国充大哥”、“阴谋破坏俄欧合作”、企图在欧洲大陆“再造出一道新的铁幕”等。^③如此这般你来我往后，波俄关系很快跌至剧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除了历史问题和地缘利益的分歧与冲突外，近些年来能源问题成为引发双边关系紧张的又一诱因。冷战时期，波兰即对苏联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依赖。冷战结束后，这一状况并无改变。在波兰，由于近七成的天然气购自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造成国内能源市场一直被后者所垄断。作为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的中转国之一，多年来波兰一直享受着价格方面的优待。2004年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俄罗斯多次威胁拟就出口波兰的天然气价格重新举行谈判。另外，乌克兰危机也促使俄罗斯决定在对欧天然气供应方面调整政策，一方面提高价格，另一方面设法通过新的

① Minton F. Goldman, “Polish-Russian Relations and the 2004 Ukrainian President Election”,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XL, No. 4, Dec. 2006, pp.409-428.

② Ozbay and Aras, “Polish-Russian Relations”, p.39.

③ Ekaterina Levintova, “Good Neighbours?: Dominant Narratives about the ‘Other’ in Contemporary Polish and Russian Newspapers”, *Europe-Asia Studies*, Vol.62, No.8, pp. 1348,1352.

运输线路使俄罗斯天然气绕开乌克兰、波兰等中东欧中转国，直接输抵欧洲市场。目前俄罗斯计划修建的从北部穿越波罗的海抵达德国的“北溪”管道和从南部穿越黑海抵达保加利亚的“南溪”管道便属此列。^①其中，“北溪”管道颇受关注。2005年俄总统普京访德期间，同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此项目签署协议。如前所述，对于俄德此举，波兰反应甚为激烈。时任国防部长的西科尔斯基后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甚至将其同1939年苏德密谋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相提并论。^②近年来，波兰各届政府虽积极寻求能源供应多样化，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迄今为止收效并不显著，未来波俄关系恐怕还很难摆脱能源因素的影响。

过去二十多年来，波俄关系虽龃龉不断，两个民族间历史形成的不信任感亦很难短期内消除，不过，最近几年许多迹象表明，双方在改善和推进两国关系务实发展方面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共识，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对于波兰来说，俄罗斯不仅是它不可或缺的能源供应国，亦是波兰资本和商品的重要流入地。^③就俄罗斯而言，波兰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眼下双方围绕波美反导合作及俄罗斯威胁在欧盟边境部署导弹问题虽有不少争执，但事实却如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所说，“俄罗斯的导弹”并不是“波兰安全面临的巨大威胁”，如今最令波兰担忧是欧盟能否渡过当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因为后者才真正对波兰的未来和命运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④

① 详见 Rae, *Poland's Return to Capitalism*, p.149; Agata Loskot-Strachota, “Gazprom’s Expansion in the EU: Co-operation or Domination?” OSW Studies, Warsaw, October 2009, pp.8-13.

② Martin Walker, “Russia v. Europe: The Energy War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24, No.1, Spring 2007, pp.1-8; Hans Michael Kloth, “Indirect Hitler Comparison: Polish Minister Attacks Schröder and Merkel,” *Spiegel Online*, January 5, 2006.

③ 图斯克政府上台以来，波俄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已给波兰带来了现实利益，2007-2010年间波兰对俄贸易额增长了一倍之多。参见 “Dancing With the Big Boys: In Its Foreign Policy Poland Has Chosen Realism Over Romanticism”, *The Economist*, Nov. 25, 2010.

④ 西科尔斯基在柏林的讲话，2011年11月28日。URL=http://www.msz.gov.pl/files/docs/komunikaty/20111128BERLIN/radoslaw_sikorski_poland_and_the_future_of_the_eu.pdf

波美关系

与上述波俄关系状况形成很大反差的是波兰同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之间的关系。1989年以来，波美关系的密切程度不断加深。如今，波兰已被普遍认为是欧洲范围内除英国以外最亲美的一个国家，而波兰似乎也有意将自己同美国的关系提升到某种“特殊”层面。

造成波兰对美国怀有“亲近感”的因素可以举出许多。不过，从现实外交角度来看，冷战结束后波兰外交亲美取向的背后更多折射出的是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唯有美国能帮助它摆脱地缘政治陷阱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的产生与二战时的遭遇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二战对波兰造成了重创，战争留下的沉痛记忆连同二战的结果，对此后波兰的安全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1939年的再度亡国以及1944年华沙起义的惨败，使波兰对保卫自身国家安全的能力丧失信心。其次，英、法的绥靖政策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致使波兰对西欧大国保卫欧洲安全与稳定的意愿和决心产生严重怀疑。以上因素，加之后来美国在结束二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催生出波兰早期的亲美情结。而随后冷战年代的经历更使波兰确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愿意并且能够对德国和苏联/俄罗斯这两个给波兰带来无数浩劫的邻国加以牵制和阻遏的国家。^①如今在波兰，还有很多人会不时提到1980年代美国对波兰团结工会曾经给予的支持和援助，认为美国在结束冷战、推动波兰脱离“东方阵营”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照某些波兰学者的说法，对于像波兰这样的国家而言，它需要一个“老大哥”为自己提供安全和保护，而波兰民族的历史和情感决定了，美国是唯一信得过的选择。^②

尽管如此，在剧变之初，由于华约尚未解散、苏军仍未撤离、北约的命运亦不甚明了，这种亲美的取向在波兰外交中并未明确表现出来。但是此间，美国在推动德国统一特别是调处波德边界争端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促使波兰强烈感受到了美国对于欧洲局势发展的重要影响。此后，几乎每届波兰

① 参见 Theresa Kurk McGinley, “Embattled Polonia: Polish-Americans and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XXXVII, No.3, September 2003, pp.325-343.

② 2011年12月与波兰罗兹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系副教授 Dominik Mierzejewski 访谈记录。

政府上台都会强调，支持美国继续在欧洲保持军事和经济存在。^①1990 年代末，由于美国的支持，包括波兰在内的中欧三国顺利加入北约，这对后来波兰亲美取向不断增强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2001 年，美国发起反恐战争，波兰不仅紧随布什政府的反恐路线，且于 2002 年初，应邀派出 300 人的部队（包括来自机动反应作战部队的精锐特种军和后勤支援舰队）参加到美国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中，成为了反恐联盟名副其实的参与者。自阿富汗战争后，波美两国不仅在诸如核扩散、人权、中东欧地区合作、联合国改革等外交领域展开密切配合，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大为加强。2002 年 12 月，波兰政府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举订购了 48 架第 52 批次的 F-16 多用途战斗机。此份订单不仅使美国和波兰可以进行联合训练，共享通用的战术和条令，而且使波兰可以充分地参加美国和北约的地区及国际联合任务，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两国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战略关系。2003 年，当美国将反恐的矛头转向伊拉克时，波兰置欧洲内部激烈的争论与分歧于不顾，继续给予美国无条件的支持，并迅速作出向海湾派兵的决定。波兰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可谓亲美外交的一次集中体现，但其中表现出的对美国战争政策近乎盲目的忠诚，在欧洲引发了众怒，有媒体甚至以“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相称。就连一向对波兰亲美路线持支持立场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波兰这种表达忠诚的方式“走过了头”，会对与德、法两国的关系造成损害。^②

批评之声并不仅仅只来自于外部。2003 年 11 月，当波兰士兵在伊拉克战场上发生了首例阵亡后，民怨终于爆发了。压力之下，政府被迫宣布撤军计划。除了撤军外，此期另外两个与伊拉克战争相关的热点议题也令波兰当局甚为尴尬。其一，波兰原本期望战争结束后能通过参与伊拉克重建赚取现实物质利益，结果大失所望。事实上，除个别特例外，绝大多数参与竞标的波兰公司均空手而归。其二，波兰原本以为如此全力以赴地支持美国，应该

① Igor S. Oleynik, ed., *Poland : Foreign Policy and Government Guide*,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ublications, 2003, p.33.

② Longhurst and Zaborowski, *The New Atlanticist*, pp.45,35,48; Kerry Longhurst, “A Note on Polish Atlanticism on the Mov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No.30, 2008, pp.136-137.

不难换取已为多数欧盟国家享有的免签证入境美国的待遇。然而，当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向布什总统提出这一要求时，得到的却是否定的回答。^①一心努力将自己打造成“美国模范盟友”的波兰，此时也不得不承认，波美同盟关系远不对等，显然，波兰并非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

以上种种尴尬或失望，加之国际、国内不断增强的舆论压力，推动波兰政府对其伊拉克战争政策展开反思，亲美的热情也多少有所降温。2004年在正式加入欧盟后，波兰开始重新审视欧盟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逐渐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采取一种较具建设性的立场。不过，诸如此类的反思或调整并不表明波兰外交业已放弃了亲美路线。事实上，如前所述，2005年中右翼政府上台后，波兰外交的亲美色彩不是减弱而是更趋浓重了。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伊始，便首先取消了前届政府关于2005年开始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声明波兰军队将继续驻留伊拉克，直至完成任务。2007年图斯克政府上台后，虽强调波兰外交应更多地转向欧洲，而不是像法律与公正党政府那样一味地“对美国卑躬屈膝”，但据近几年波美关系的具体实践看，“大西洋主义”并未褪色。^②2008年8月，波兰置国内外种种反对意见于不顾，与美国正式签署反导协议，同意了对方提出的在波境内布置10枚拦截导弹的请求，而美国则承诺与波兰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在波部署爱国者导弹。2009年11月4日，即《里斯本条约》在最后一个欧盟成员国捷克获批的第二天，波兰向美国提出在波境内驻军的请求。12月10日，双方就美国向波派驻军队达成协定并共同签署了《美国驻军地位协定》。2010年，波美两国在波罗的海举行了首次重要的军演，作为对此前俄罗斯发出核威胁的回应。凡此种种均表明，尽管欧盟成员国身份以及卷入伊拉克战争事实上的“得不偿失”对波兰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依靠美国牵制俄罗斯、保障自身安全与防务以及一定程度上借助波美“特殊

① Longhurst and Zaborowski, *The New Atlanticist*, pp.48-50. 2010年12月，波兰新任总统科莫尔罗夫斯基访美时，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强有力地”提出了这一要求，并称“波兰人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波兰所有的邻国，波兰的周边国家，都能享受美国的免签证待遇，而我们却不能”，但结果仍是失望而归。参见“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President Bronislaw Komorowski of Poland”, *Dai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Dec. 8, 2010, Special Section, pp.1-3.

② Longhurst, “A Note on Polish Atlanticism on the Move”, pp.136-138.

关系”提升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等战略意图的驱动之下，波兰外交的亲美本质并未发生改变，维护并加强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形象仍将是波兰外交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内容。

波德关系

如果简单以亲疏好坏来论国家关系，那么 1989 年以来波兰同德国的关系大致可说介乎波美、波俄关系之间。同样，波德关系目前的这种状态也有其历史成因。

与波俄关系相类似，波德关系也有解不开的冤结。两个民族的关系史久远而复杂。早在 10 世纪，波兰与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交往，但很快双方关系因波兰与条顿军团的战争蒙上阴影。结果，普鲁士成了波兰的属地。后来，普鲁士王国强大起来，18 世纪下半叶同俄、奥一起将波兰瓜分殆尽。一战结束后，波兰重新建国，根据《凡尔赛和约》从德国获得了原属波兰的大部分领土，并在国际联盟介入下，与德国划定了上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马祖尔亚等争议地区的边界。祖国的复兴自然令波兰人欢欣鼓舞，然而，对于争议领土内德语区被划入波兰境内，德国人则一直深感不悦。1939 年 9 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国，掀开了两国关系史最黑暗的一页。入侵仅六周后，德军开始大批逮捕、屠杀波兰人，并在波兰建立了数千个集中营和死亡营。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被当作苦力运往德国。1944 年，为反抗纳粹统治掀起的华沙起义，终以悲剧收场，超过二十万军民在与德军的战斗中阵亡，华沙被夷为废墟。二战结束后，波兰的版图整体西迁了二百多公里。随着奥德—尼斯河以东领土被划归波兰，一千多万德国原住民被波兰当局强行驱逐出境。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波德边界的数度变迁，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不过，回顾起来我们发现，虽然同样存在着很深的民族积怨，但冷战结束以来波德关系的发展似乎并不像波俄关系那样备受历史羁绊。至于原因，简单来讲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尽管上千年来波德双方曾发生过战争、流血，但也有过较长时间的和平、合作以及特别是文化的共享。对波兰来说，

德国带给它的历史梦魇是实实在在的，但它对于这个西部近邻的文明认同也是真真切切的，这一点为波兰界定对德关系的最终立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其二，冷战期间开启的和解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两国关系的历史重负。1949年德国一分为二。同为东方阵营国家，波兰与东德的关系自不必说，但与西德的关系在战后最初十几年间始终处于冰点。直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伴随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两国关系开始解冻。1963年波兰与西德签订了首个商贸协定，随后西德在华沙设立了工商代表处。1965年波兰天主教会主教致信西德主教，以一句“我们宽恕对方，并请求对方宽恕”发出了两国应就战争与驱逐问题实现和解的倡议。^①1970年底，两国关系正常化条约的签署、西德对波兰西部边界的承认以及特别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那历史性的一跪，为双方化解怨仇、走向和解打开了大门。^②

1989年，波兰发生政治剧变。11月，德国总理科尔到访，其间西德政府同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首届团结工会政府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声明。此后二十余年间，波德关系总体看来进展顺利，但亦时有龃龉。据其变化特征可大致划分出以下几个阶段。

德国统一前后，两国关系因科尔最初拒绝承认奥德—尼斯河为未来德波边界一度变得紧张微妙。不过，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外交介入下，这段插曲比较快地过去了。1990年秋，双方以条约的形式对现存边界正式予以确认。次年6月获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解决了包括经济关系、双边交往、境内少数民族权益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标志着两国实现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关系正常化。^③此后直至1998年科尔总理在任期间，波德双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互利合作。此间，德国用行动兑现了它在上述《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做出的承诺，即不仅在技术上而且

① Terry, “Poland’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89: The Challenges of Independence”, p.8.

② 对于勃兰特此举的意义，同为前总理的施罗德在其回忆录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勃兰特所做的事情，只有真正伟大的人在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刻才能做到……（它）既是表明‘永远不再发生’，也是表明德国人愿意以正视历史为前提赢得未来。这同样是德国战后政治家的欧洲使命。”参见[德]格哈德·施罗德：《抉择：我的政治生涯》，徐静华、李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③ 条约文本详见 Góralski, ed., *Poland-Germany 1945-2007*, pp.366-378.

在政治上全力支持波兰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①

1998年，德国举行大选。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上台执政。此后七年间，受各自国内政治情势、外交政策变化以及现实利益冲突等影响，波德关系中出现一系列猜疑、分歧与摩擦。首先，施罗德政府上台后对德国的欧洲政策作出调整，更加强调维护德国自身的民族利益，以及深化同对扩大欧盟不甚支持的法国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些动向让波兰开始对德国未来是否仍会支持其加入欧盟的努力感到担忧。其次，随着波兰外交亲美倾向日趋加剧，特别是2003年不顾德、法等欧洲国家的反对坚决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使得德国对波兰产生出越来越多的不信任。^②第三，波德两国对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策分歧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新的不和。如上所述，波兰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对欧洲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因而需要加以遏制的国家，而施罗德政府更愿意把俄罗斯看做自己在东方的一个重要伙伴。^③对于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策方面，波德两国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此期，个别历史议题亦开始浮出水面，对波德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2004年夏，在华沙起义60周年活动前夕，德国被驱逐者协会采取行动，要求波兰归还财产和支付赔款。与此同时，一个受到该协会支持的名为普鲁士托管公司的组织也展开活动，声言要为被驱逐德国人遭波兰没收的房屋、地产等提起归还诉讼。此事在波兰仍引发了极大不满。^④尽管德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支持被驱逐者关于获得赔偿的要求以及享有在其前家园重新安置的特权。但它亦明确指出，一待转轨进程结束，必须允许所有的欧洲公民行使其权利——不管它们曾住在哪里。^⑤总之，1990年代初关于以法德和解与合作

① Marcin Zaborowski, "Power, Security and the Past: Polish-Germ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EU and NATO Enlargements", *German Politics*, Vol.11, No.2, August 2002, pp.165-188.

② Olaf Osica, "In Search of a New Role: Poland in Euro-Atlantic Relations", *Defence Studies*, Vol.2, 2002, pp.24-25.

③ Janusz Bugajski, *America's New European Allie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9, p.98.

④ 参见施罗德：《抉择：我的政治生涯》，第193-197页；亦可参看 Pawel Lutomski, "The Debate about a Center against Expulsions: An Unexpected Crisis in German-Polish Relations?",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27, No.3, Oct. 2004, pp.449-468.

⑤ Cordell and Wolff,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p.148.

为样板发展波德伙伴关系的提法,在不到十年之后便不再有市场。2002~2003年,在上述种种因素影响下,波德关系滑至1989年以来的谷底。

2005年同为波、德两国的大选之年。受各自国内政局变动的影 响,2005年后,波德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如前所述,是年秋,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赢得大选后上台执政。该党在单独和联合执政的两年间,将带有民粹、反共、社会保守色彩的国内政策与疑欧、排德、反俄、亲美的外交政策给合在一起,不仅使波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也给外交实践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对德政策方面,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双方存有争议、分歧或利益冲突的问题上表现得顽固而强硬。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05年11月上台的由基民盟主席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新政府,较之上届政府,更愿与波兰通过增加对话、扩大接触达到增进共识的目的。2007年波兰政府更迭,公民纲领党上台后,及时对上届政府的对德政策做出调整,波德关系得到明显改善。随着图斯克政府越来越将波兰外交的重心放在欧洲,与德国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就成为当务之急。2011年11月28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访问柏林期间发表的一篇讲话在德国和波兰国内引发热议。讲话中,西科尔斯基除敦促德国在当前欧债危机中承担起“欧洲领袖”的责任、“帮助欧元区逃过此劫”、防止其“分崩离析”之外,更明确表示了,波兰愿同德国一道,齐心协力共策欧盟繁荣与稳定。在回顾了剧变以来德国给予波兰的种种支持和助推后,西科尔斯基满怀深情地用德语说道:“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波兰人,我感谢你们。”^①鉴于目前波兰国内对西科尔斯基可能出任下届政府总理多有猜测,他此次在柏林的这番讲话被初步解读为意味着波德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结 论

以上本文就过去近二十多年间波兰外交的转型进程及其重点做了简要分析。总体看来,冷战的结束、东方阵营的瓦解,是开启这一进程的基本前

^① 西科尔斯基在柏林的讲话,2011年11月28日。URL=http://www.msz.gov.pl/files/docs/komunikaty/20111128BERLIN/radoslaw_sikorski_poland_and_the_future_of_the_eu.pdf

提；世界局势、欧洲地缘政治、东西方大国关系的变迁，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内众多新课题的出现，是影响这一进程的外部要素；以民主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国内政治经济转型，在独特的民族历史中形成的政治文化以及外交领域的传统、理念及政策遗产等，则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内在动力。

正是在以上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1989年后波兰外交呈现出一条基本清晰可见的阶段性变化轨迹。在这条轨迹中，不同阶段反映了转型目标在回归欧洲这一总的框架下所发生的调整。这些调整在以下三个节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三个节点分别是：1997年获得北约和欧盟的候选国身份、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2004年成为欧盟完全成员国。首先，在1997年以前，加入以欧盟、北约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机制，摆脱欧洲结束分裂后的身份和安全困境，并分享由其带来的“繁荣”与“稳定”，是波兰外交的核心诉求。欧洲亦由此成为此间波兰外交关注的绝对焦点。从政策角度看，密切与德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在谨慎提防的同时力求保持与俄罗斯的正常交往，是此间波兰欧洲外交的主要特点。1997年在初步获得了北约和欧盟的入场券之后，此前处于隐性状态的一些政策趋向开始显现出来，由此带动波兰外交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波德关系为纽带的亲欧路线发生动摇，亲美取向浮出水面；其二，东方政策的温和色彩加速消退，积极与俄罗斯争夺中间地带的动向愈益明显。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大西洋主义”开始在波兰外交中占据主导地位。2004年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取得，推动波兰外交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之后，特别是2007年以来，如何在欧洲一体化机制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努力影响并参与规则的制定以最大限度促进波兰的国家利益，成为其外交转型的新重点。

从以上线索的梳理中，我们既看到了近二十年间波兰外交的变化轨迹，也发现了一种内在的惯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这种内在的惯性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牵引着波兰外交转型的整个进程，并使波兰外交自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益呈现出鲜明个性。这种个性通过波兰外交中渐趋明晰的四种取向表现出来，即源自历史与情感的亲美、出于经验的疑欧、由历史和现实促成的恐俄以及积极进取的东方政策。当然，前三种取向就其基本方面来讲，

在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外交转型中亦不时有所体现，不过不像在波兰外交中那样清晰可辨。至于东方政策，则一直被公认为冷战后波兰外交转型中最具独创性的一个方面。在上述四种取向的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与历史和地缘紧密相连的深刻的不安全感。如前所述，颇具悲情色彩的民族历史和夹处在欧洲东西方大国之间、位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轴这一现实，对波兰外交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历史和地缘对波兰外交观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无法理解波兰何以对主权独立、国家安全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注，也就无法把握和看清其外交转型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除此之外，以上四种取向还折射出波兰将其自身视作“地区大国”、“欧洲大国”这样一种角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希求在此过程中为自己在欧洲一体化机制中谋得与其大小、“地位”相称的分量。

上述种种既是波兰外交独特个性的体现，同时亦是致使其转型进程遭遇难题的原因所在。概括来讲，这些难题包括：首先，如何克服“大西洋主义”所隐含的风险。进入 21 世纪以后，日渐在波兰外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西洋主义”可谓是把双刃剑。就其政策动因而言，波兰努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意在藉此提升波兰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增强自身防抵俄罗斯的信心和实力。然而，作为欧洲大陆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新兴民主转型国家，波兰目前并不具有制衡以上任何一方的实力和杠杆，在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下介入大国游戏，既可能借大国相互间矛盾获得额外利益，也可能不必要地使自己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从而不仅无益甚至有损于自身国家利益。此外，由于波美合作背后所明显带有的“实用性”和“权宜性”色彩，“大西洋主义”完全有可能会给波兰带来与其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即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波兰在欧洲的处境，加重而非减轻了来自俄罗斯的安全隐患。怎样避免这一结局，对波兰外交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第二，如何解决“东方政策”面临的困境。如前所述，积极推动欧盟继续东扩是波兰提升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战略。对波兰来说，该战略的目标指向是明确的。不过，问题在于波兰缺乏推动这些目标得以实现的强有力的手段和能力。换言之，以上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其国内政治经济转型的现实走向以及北约和欧盟对于是否吸纳这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均非波兰外交

所能引导和把握。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波兰积极进取的“东方政策”，不仅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在以上东方国家以及欧盟内部也引起怀疑。

回顾 1989 年后波兰外交走过的历程，本文以为总体上“得”多于“失”。就其成功之处而言，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摆脱了剧变之初的身份和安全困境，通过融入欧洲一体化实现了回归欧洲的梦想，同时通过个性外交的塑造，使自己成为地区、欧洲以至世界舞台上一个颇受关注的力量。近两年波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方面的突出表现也大大增强了波兰在外交领域的自信。当然，其间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要予以克服，除需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战略、方针、目标等加以调整和平衡外，在本文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转变惯性思维，培育平和心态，尽可能放下历史包袱，通过真正发挥连通东西方桥梁的作用，化地缘困境为地缘优势。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ith transition both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Poland diplomacy has undergone dynamic changes. Generally speaking, this process not only shares characteristics with other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but also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anging background and trends of Poland diplomacy and further analyzes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jor neighbor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goals, problems of Poland diplomacy transi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this way, overall trait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Pol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practice c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grasping future trends of Poland diplomacy.

【Key Words】 Poland, Diplomacy, Transition, Europeanization, Atlanticism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два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наряду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ми Польша подверглась изменениям свое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целом,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имеет как общие черты с процессами,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так 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

свой о событиях поль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На основе более детальн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изменений фона и тенденций развит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Польши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этапах, начиная с 1989 года, и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анализ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Польшей и её основными соседями, проводится анализ целей, успехов и стоящих перед Польшей вопросов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её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связей с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ой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лучше понять 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общий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Польши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а также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будуще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льш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ьша, дипломат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европеизация, атлантизм

(责任编辑 封 帅)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的前身是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合办的上海市苏联东欧研究所于1981年6月开始出版的《今日苏联东欧》杂志。2000年12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俄罗斯研究》(季刊)，2007年，经批准改为双月刊。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多年来，《俄罗斯研究》杂志努力按照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要求进行建设和转型，形成了以下特色：

第一，坚持“国际化”方向，努力使所刊载论文的内容紧跟国际前沿。刊物以学术性、研究性的论文为优先选择，作者队伍扩展至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注意展示不同国家、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第二，编辑部采用“双向匿名”的方式审稿，坚持“学术性第一”和“质量第一”的原则。

第三，更加注意每篇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性，通常每期会就某个主题给读者带来尽可能系统和多方面的认识。

第四，《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的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如中东欧、高加索和中亚问题等与俄罗斯问题研究密切相关的地区和国家。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www.rus.org.cn，查阅《俄罗斯研究》杂志的相关内容。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173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 元